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

Saussure: The Authentic Feature And Its Tension

裴文 著



商务印书馆

6

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

Saussure: The Authentic Feature And Its Tension

裴 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裴文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743-3

I. 索… II. 裴… III. 索绪尔,F-语言学-研究 IV. 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2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UŎXÙĚR: BĚNZHĒN ZHUÀNGTÀI JÍQÍ ZHĀNGLÌ
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
裴 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743-3/H·946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索绪尔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是全球公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自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后，多次再版，并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他所创建的理论使语言学步入现代期。在他之后的语言学基本上是以《普通语言学教程》为参照点的，是对索绪尔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阐述、延伸、批评和发展。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造成的两个重大影响是尽人皆知的：首先，他提出了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向，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在他看来，语言是由单位和关系构成的系统。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分析这个系统，确定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之间的组合规则。这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公理，语言学界由此派生了描写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索绪尔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学支流，从根本上说，是对系统内部单位和关系的进一步研究与拓展。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其次，索绪尔明确界定了语言学的基本观念，如共时观与历时观、语言与言语以及系统中的横向组合与关联聚合关系，等等。基本观念的确定促成了语音学、音位学等分支学科的有效发展。比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就是促使音位的区别性概念成为音位学的核心部分。严格地说,现代语言学中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索绪尔提出的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而进行的。是因为索绪尔,语言学才表现出如此强势的亲和力。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观念问题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尽管索绪尔的名字在我国语言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并不陌生,也有不少语言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常常援引他的观点、他的术语,但是对这位大师的语言观和方法论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不仅如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学界都存在着两种相对的状态:一是对索绪尔理论缺少客观的批评,一味盲目地崇拜,表面上扮演着索绪尔理论辩护士的角色,而实际上却是对大师理论的僵化与亵渎;二是对索绪尔理论进行部分或全面的抨击,忽视索绪尔理论成长的环境,而对大师文本截断式的解读已经使大师的理论被深度扭曲。

20世纪中期,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一经抛出,索绪尔学说"行将就木"几乎成为世界,尤其是美国语言学界一致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姑且不论美国新老移民对欧洲语言学家全球性地位的心理上的拒斥,以及美国以外应和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仿效与夸大,索绪尔学说似乎早已被乔姆斯基的理论超越了,索绪尔的理论似乎不再适宜用来解释当今时代所面临的语言现实,《普通语言学教程》似乎已经过时了,而我的研究却表明,这些不过是令人不齿的且咄咄逼人的幻象,因为他们指认的索绪尔理论是早已畸变为忽略历史、割裂语言、捕捉虚无抽象的武断、荒唐的学说。所以,索绪尔的理论并没有因为种种批判、种种

歪曲、种种贬抑而寿终正寝，恰恰相反，索绪尔理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深刻的时代关怀、得当的现实论证。

在索绪尔遭遇冷落、打击之时，我想，我倒是应该保持一份学术的清醒，越是有人日甚一日地抨击索绪尔，呼吁超越索绪尔，我就越是要弄明白：他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反对的依据是什么？他们要超越索绪尔到底旨在解决什么问题？

随着新的考据成果以及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课堂笔记再度公诸于世，我们不禁要对近一个世纪的索绪尔研究提出疑问：索绪尔的理论思想究竟是怎样的？过去一个世纪研究的究竟是不是索绪尔的思想理论？它与索绪尔本真的思想理论是一致的吗？它与索绪尔本真思想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吗？《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学派新文献》、《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别何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索绪尔进行客观、实在的研究已是当今语言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不能不反复回到语言学最基本的问题上：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等等，因为我必须要在基本概念、基本思想清晰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完成对索绪尔理论的本体思考，所以，该项研究是从这些基本点切入而施展开来的。

《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将尽可能地实现解读视阈与文本语境的整合，以期呈现索绪尔语言观的本真状态。该项研究必须突破三个难点：(1)对文本进行充分的研究；(2)对文本语境进行深入的考证；(3)发现索绪尔语言观和方法论的本真状态及其张力。这些同时也是我的研究重点。该项研究是一个让我激动的课

题,不仅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填补国内学界此项研究的空白,而且还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索绪尔理论及其研究更有活力地存在着。

裴　文

2002 年 5 月

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和现代研究 …… 1
　第二节　语言定义的逻辑理路 …… 22
　第三节　语言学界说 …… 48

第二章　文本研究的基本语境 …… 60
　第一节　文本的结构 …… 60
　第二节　版本考证 …… 63
　第三节　索绪尔哲学思想的发育与成长 …… 74

第三章　索绪尔语言观的形成语境 …… 92
　第一节　概述 …… 92
　第二节　传统语言学的学理梳理 …… 94
　第三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文脉 …… 107
　第四节　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反思与批判 …… 119
　第五节　索绪尔与前人相关观点及话语比较 …… 124

第四章 索绪尔语言观:原始生态与现代形态 …………………… 139
第一节 概述……………………………………………………… 139
第二节 言语体系中的语言和言语……………………………… 141
第三节 共时与历时……………………………………………… 164
第四节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186
第五节 外部语言学中的时空观………………………………… 209

第五章 对曲解的质疑与分析………………………………………… 227

后记……………………………………………………………………… 244

附录一:人名索引 ……………………………………………………… 246
附录二:引用文献 ……………………………………………………… 267
附录三:主题索引 ……………………………………………………… 274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和现代研究

一、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语言起源的不解之谜。不断有学者推出各种各样的假说，诸如手势说、契约说、感叹说、本能说、摹声说、神授说、进化说、劳动说、嘴势说、约定俗成说、人类本源说，等等，等等。但是，由于所有这些假说都来自人类主观思辨的推论，而且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资料，既不可能找到任何语言“化石”作为直接证据，也不可能以人为材料进行共时态的实验，所以，各种假说总是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游移。然而，人们始终希望能有一种假说可以从根本上对语言的起源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发掘性阐述，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假说没有受到严肃的抨击和深刻的批判。

其实，如果要认识语言的起源，我们不妨首先明确语言起源这一隐匿性命题的内涵。而要明确这一命题的内涵，我们至少就会遇到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来认识这个研

究对象呢？研究对象的内涵往往是由我们认识研究对象的观点所决定的。倘若我们从哲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基本方面入手，我们就会得到这一命题的三大内涵：

第一，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第二，语言是缘何而来的？

第三，事物的名称是怎样确定的？

这时，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似乎显得有些许先天不足的各类假说，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拥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探索语言起源这一命题的，它们的哲学或语言学价值终因命题内涵的确定而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

1. 语言产生的条件

(1)感叹说

感叹说从人的情感表露方面出发，进而对语言产生的条件加以主观性推论。由于痛苦、愤怒、欣慰、欢乐或其他感情，人们总是会本能地发出声音，这就为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创建单纯快乐、友谊和隐居伦理哲学，他和他的门徒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曾指出，人类只是由于情感过剩才开始说话的，人们在情感冲动时，不说话是不行的。这一学派认为情感过剩是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比方，惊恐时，“啊呀”就会脱口而出；高兴时，自然免不了要“哈哈”一声。

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的始祖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完全接受这一假说,并试图论证它可能存在的合理性。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最后一部续篇《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中,他提出:最初的语言是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口腔姿势,是从口腔或鼻腔发出的噗(pooh)、呸(pish)的声音。只有人才能表露痛苦、焦虑、悲伤、绝望、欢乐、爱、忠心、恨、愤怒,等等感情。

在中国,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1021—1086)算是感叹说的首要支持者,他曾在《字说》中写道:

> 物生而有情,情发而为声,……人声为言,述以为字。①

同样主张感叹说的还有中国在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颇有造诣的刘师培(1884—1920),他写道:

> 盖有情然后有声,有声然后有言,……人为万物之灵,人生于世,不能不与事物相界。……身有所感,则心有所知。有知而后有情,有情而后有意,情动于中,则形于言。所以吐露其情感,发抒其意志,以表示他人者也。此即语言之源。②

百科全书派创立知识体系理论的第一人、法国哲学家孔狄亚

①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② 《中国文学教科书》,第1册,国学保存会版,1905年版,第1页。

克 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在《人类知识起源论》(*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1746)所提出的是感叹说最为经典的话语:是感觉的喊叫使心灵的力量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把观念与任意符号联系起来的习惯。

感叹说得出的结论是:激情的发声是语言产生的条件。

可是,依我看来,地球上的野生动物都有发出这类激情声音的本能,无论是海豚还是豺狼,无论是黄鹂还是苍鹰,它们都会发出宣泄情感的声音,然而,它们显然并没有因此而开始说话。那么,我们不妨对上述结论进行一点限定性的修正:激情的发声是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感叹说的语言学价值所在。

对感叹说的反驳可以归结为如下四条:

第一,语言中感叹词的数量很少,所以语言不可能来源于感叹;

第二,感叹表示情感,却没有提供表示情感的相应名称;

第三,就个体言说者而言,一个人无论有多少情感都不可能发明语言;

第四,语言不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2)契约说

18世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先后在他的《论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1753)、《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 1761)和《论语言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1782)等著作中推崇“契约说”,他认为人类是为了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是为了相互交际,才约定使用语言来作为交际工具的。[①] 受其影响,19 世纪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社会交际的需要是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卢梭对语言的产生作过这样一个诗意的描述:原始人围坐在会议桌旁,共同达成协议(即社会契约),规定某种声音代表某种意思,然后大家共同遵守这些协议。可以说,契约说是 18 世纪主导性假说之一。

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莫白迪(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1759)也是这一假说的热情推崇者之一。曾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731),柏林科学院院士(1741)及该院院长(1745—1753),他不仅著有《自然之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 1751)等专业论著,而且还撰写了论文《论人类表达思想的不同手段》(1754),对契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契约说的论点在于:

第一,语言是社会集团的规约;

第二,语言是由人类共同创造的。

反驳契约说的主要论点则是:

社会契约本身是一种理性活动,语言应该是这一活动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语言,要制定社会契约是绝对不可能的。

---

① 另请参阅: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劳动说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于1876年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

……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人类的眼界扩大了。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加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了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惟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

……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

髓。……①

恩格斯根据当时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性的假说，可以说，恩格斯是劳动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对劳动说的反驳基于动物比较学的研究成果：

第一，动物界也存在群体性的劳动，如蚂蚁、蜜蜂、猴子，等等；

第二，人的交际能力与其他动物的交际能力的基本特点是相似的，比方声—耳渠道，互换性，规约性，任意性，四散传播与定向接受，分离性，替代性，滋生力，传统性，专门化，等等。

(4)进化说

根据进化说的研究成果，人类的祖先在大约4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直立行走了。不再用手爬行，不再用嘴取物，手替代了曾经必须要由嘴巴来完成的一些事情，诸如搬运、搏斗、打理，等等，这样，人类的喉部和声道的结构就必然会发生变化，口腔逐渐有可能发出越来越复杂的信号，最终产生了语音。到了20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人脑在体积上大体增加了一倍，从而进化为已知的最为复杂、最为精密、最为有力的机制。大约在50万年前，人类控制了火，抵御寒冷的能力提高了，人口便不断增长，并开展有组织的狩猎、生活。这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20万年前的化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153页。

石则向人类展示了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证据:工具的制作者习惯于用右手。这恰恰反证了人类学家的推断:语言机制正好偏于左脑。人类意识过渡的最早证据则体现在5万年前的雕刻、彩绘、墓葬以及文饰,等等方面。进化说还不能够界定语言起源的时代,但是,这一假说断言:语言的起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是与人类进化相伴而行的过程,它的发展方式和演化速度受到人类文化发展、人口密度增长等诸多关键因素的影响。还有一点是肯定的,语言在大约一万年以前就已经成为接近现代语言的完整的系统了,换句话说,它与现代的语言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进化说的语言学价值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语言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

第二,社会集团是语言起源可能的和必要的条件;

第三,理性能力是语言所必需的基础。

对进化说的反驳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

第一,大约在10万年前,前语言和类语言的预先适应与大脑进化的关键的体积相一致,导致语言的突然发明;

第二,理性能力的出现是由于大脑组织的基本模式变化,而不是脑体积的增加;

第三,语言机制储存于整个大脑的每一个部分,而不局限于左脑。

2．语言的由来

(1)神授说

关于语言的由来，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历史古国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有将语言赐予人间的那布神（Nabû）；古埃及有创造语言的索斯神（Thoth）；日本则有创造语言的太阳女神天照（Amaterasu）；中国有把语言和说话能力赋予人类的天子；中国的苗族相信是山神指点“央”造人并且让人能够说话的。在印度，创世之主婆罗贺摩（Brahma）的妻子萨拉斯娃蒂（Sarasvati）将语言带到了人世间。在澳大利亚，人类因吞食恶神布鲁利（Bruley）的骨肉而开口说话。在古代欧洲和中东，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 耶和华神把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会怎样称呼它们。无论那人怎样称呼各样的活物，那都是它们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①]

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民族语呢？《圣经·创世记》在第11章中作了如下有益的解释：

---

① *The Bible*.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71. 2:18.

所以,天下只有一种语言,词语甚少。人类从东部迁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施那尔一地发现了一片平原,便定居下来。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来做砖块,把它们烧透了。"他们以砖块代石头,以石漆代灰泥。接着他们又说:"来吧!我们来给自己建造一座城市;城里有塔,高入云霄,好显扬我们自己的名,以免我们分散到全地去。"

于是耶和华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说:"看哪,他们成为一个民族,拥有完全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只是一个开头;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来吧,让我们下去,就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话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得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再建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天下人的语言,又使得人类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座城被称作巴别。①

神授说的一位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苏斯米希(J. P. Sussmilch, 1708—1767),1754年,他开始担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试证最早的语言并非源于人,它只能是上帝的发明》一书,此书于1766年在柏林出版。他的著名推论是:人类语言具有异常复杂的机理和精巧的组织,可以归简为大约20个符号(即字母),这样一种神奇的机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只有万能的上帝才有可能创制出它来。

① *The Bible*.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71. 11:1—9.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曾经表达过他的看法，他说:上帝曾经给宇宙万物命名，但是人们忘记了这种最初的、完善的语言。所以人们必须重新去寻找。

神授说的语言学价值在于它所呈现的三个命题:

第一，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同出一源;

第二，命名是任意的;

第三，社会集团可以因语言的分化而分化。

反驳神授说的论点是:

第一，没有人能证明上帝存在;

第二，语言和人类是同步产生的。

(2)人类本源说

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是人类本源说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0)获柏林皇家科学院论文奖，并于1772年由科学院指定出版。赫尔德强调，语言结构是人类本性的真实影像。上帝所创造的是人类的心智，而不是人类的语言。他著名的出发点是:神造就了人类的心灵，而人类的心灵则通过自身的作用不仅创造出语言，而且还不断地更新着语言。神的崇高本质映现在人类的心灵之中，使之藉助理性而成为语言的创造者。所以，只有承认语言来源于人类自身，才可以说，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神的作品。在赫尔德看来，没有必要从社会环境中寻找语言的起源，尽管他承认，语言始终是“社会集团的语言”，他坚持认为，

即便没有社会,没有舌头,人也必定会发明语言的,因为语言来源于人的心智。在语言思想史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之一就是赫尔德的:“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他把人的语言能力看作是一种天赋的认识倾向,一种对观念、印象进行区分和组织的自然秉性,一种天生的能力,一种与语言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悟性(Besonnenheit)。人类语言的最初发展是自然、自发、生动的过程。赫尔德的核心理论是:语言结构是人类本性的真实影像。任何语系的最早阶段都已显示出现代语言所具有的完全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事实上,《圣经》通过对动物的命名而把语言的创造归功于了人类。①

我赞成赫尔德的观点,我相信人类有语言、有理性,犹如飞鸟有喙、有翅膀,犹如玫瑰有花瓣、有芬芳。

人类本源说的语言学价值在于:

第一,嘴巴的构造与语言的发明没有直接的联系;

第二,语言是人类的自然发明。

反驳人类本源说的论点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点:

第一,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了发达的大脑和灵活的发音器官;

第二,社会性的劳动形成人类的语言能力。

---

① 参阅: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β. 1772.

3. 事物名称的由来

(1)摹声说

最早提出摹声说的是西方文明史册上最为卓越的一个哲学学派，即古希腊的斯多葛派(Stoicism)，而后，又得到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的大力推崇。德国语言学家施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强调摹声在语言产生中的作用。德国的又一位语言学家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认为，在有声语言的早期阶段，声音的摹仿是构成事物名称的主要手段。

持摹声说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事物的名称是人类摹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而逐步演化而成的，如风有"呼呼"声，水有"哗哗"声，而百鸟和动物又是自呼其名的，比方，青蛙叫"哇哇哇"，人们便称之为"蛙"，婴儿哭"哇哇哇"，人们便称之为"娃娃"。刘师培(1884—1920)在《小学发微补》中有这样一段言说：

> 羊字之音近于羊鸣，牛字之音近于牛鸣，雀字之音近于雀鸣，……此皆字音像动物之音也。
>
> 木字之音近于击木声，竹字之音近于击竹声，此皆字音像植物之音者也；铜字之音近于敲铜之声，析字之音近于击析之声，此皆字音像用物之音者也。……可知古人创造字音，皆在观察事物之后，故能效物音以制字音。[1]

[1]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方面成就卓然的章炳麟(1869—1936)在《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中写道:

> 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语皆有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睹矣。何以言雀?谓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鹊?谓其音错错也。何以言鸦?谓其音亚亚也。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①

摹声说的语言学价值在于:

第一,语言具有规定性;

第二,语言具有理智性;

第三,人类的理性能力是获得语言资源的基础。

对摹声说的反驳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仅仅从自然的角度考虑语言的产生而忽略了语言的社会性;

第二,绝大部分的客观事物根本就是无声可摹的;

第三,原始人的发音器官并不是灵活自如的,不可能以摹声来创造语言;

第四,如果语言来源于摹声,那么,世界各种语言中同一概念的摹声词应该具有相同的发音。而事实上,却是千差万

①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8 页。

别的。

(2)约定俗成说

古希腊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唯名论与自然论的辩论。唯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在宇宙原子论的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和具有博大精深知识体系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他们先后提出:事物的名称不是神授的,而是人们按照某种法则给事物规定的称呼,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习惯使然的,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可言。自然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和深受其思想影响的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他们认为:词语和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因果关系。持有折中观点的学者则主张:词语的产生是有原因可寻的,但一经产生就受到了习惯的制约。在中国,持约定俗成说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约前313—前230),他在《正名篇》中指出:

>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

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的约定俗成说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有两个新生儿孤立地生活在沙漠之中。他们会很自然地

---

① 荀况,《荀子》:耿芸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开始交往,而在交往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便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和思想联系起来,这样,最早的词的意义就约定俗成了。

约定俗成说的语言学价值在于:

第一,社会集团是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

第二,语言具有强制性;

第三,语言具有偶然性。

朴素的唯物主义约定俗成说是目前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假说,同时又是学者反复推敲并力图证明的课题。而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约定而不是那样的约定呢?究竟是什么在支配着这种或那种约定呢?

尽管语言起源的问题仍让学者们感到无比的困惑,至今也还没有最后的权威性结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影响我们对各类假说进行价值判断的理由。它们的存在使原本具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学更加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它们是我们认识语言起源的可能的和必要的阶梯。无论如何,有谁能否认它们是人类认识史中颇具华彩的篇章呢?

二、语言起源的现代研究

语言的起源问题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的困扰。18 世纪和 19 世纪是研究语言起源的高峰时代,学者们试图以当时盛行的比较语文学的方法来确定语言的起源。他们把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归结为偶然性或归因于平行发展的结果,这两种语言可以是某

种更早的语言派生出来的两个分支。他们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期找到一种原始语言形式，从而推断出语言的起源。然而，这种研究终因没有带来任何可信的结论而被视为徒劳无益、想入非非的行为。终于，在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制定了一项章程：本学会不接受任何关于语言起源的报告。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语言起源的问题遭遇贬抑，成为公认的不会有任何研究成果的课题。更有学者将这一问题视为没有任何价值的课题。丹麦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Wilhelm Ludvig Thomsen, 1842—1927)认为：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与语言学毫无关系，既无直接联系，又无间接联系。这种研究对语言学更不能有丝毫的推进作用。在汤姆逊看来，诸如此类的研究都是主观上的臆测，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研究者无论是对语言学经验主义还是对语言史以及语言的生命都无甚了解。

语言起源的问题一度成为语言学中的一大禁区，造成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直到1976年，美国纽约州科学院发起并主持了一次关于"语言和语音的起源与演变"的学术讨论会，这一语言学课题研究的僵局才终于得以打破。来自动物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1983年8月，一个研究语言和话语起源与演变的国际性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Speech, LOS)，即"语言起源学会"(Language Origins Society)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会员来自更为广泛的领域，有语言学家、语音学家、动物学家、运动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解剖学家、临

床学家、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该学会有意加强各个学科专家的合作,力图对语言起源与演变的过程作综合的、系统的研究。语言起源的研究由此获得复兴。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还不足以科学地阐明语言的起源,但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进展。主要的成果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动物语言研究。它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在远古时代,猿类,包括猩猩、黑猩猩、长臂猿等等与人类同宗。它主攻灵长目动物行为科学,以现生大猿类为对象,探索它们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试图以此揭示原始人类的语言状态。

第二,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它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即动物个体的历史与种系的历史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胚胎发育史,重演了整个动物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就有可能发现人类创造语言的过程。

第三,原始部落的语言研究。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原始部落的语言应该最接近原始语言。以词义抽象的程度以及语法范畴为主要研究课题,从而构拟原始语的一般状态。

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最终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它们的基础或出发点都存在着较为致命的弱点。

首先,在动物语言研究方面。19 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生物学先驱并以其获得性遗传观点而著称的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最先提出古猿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进而发现猿类与人类在体质构造、心理、意识和行为

等方面的种种相似之处。而新兴的分子生物学则根据蛋白分子的结构和进化的速度推断出：人类与现生灵长类有着较为密切的系统关系。早在20世纪初，当语言学界还在极力排斥语言起源问题研究的时候，动物学界的先驱们便已经对猿类的语言能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对黑猩猩掌握人类语言的教学实验工作，并对黑猩猩等猿类动物学习人类语言的能力进行周密而细致的观察。动物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猿类不可能掌握人类的有声语言。这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的：其一，猿类的发音器官与人类的不同。人类的声门部位较低，会厌和软腭之间相距有几十毫米。所以，人的口腔和咽就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气腔，两者配合起来便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而黑猩猩的喉部是直接突入口腔的，它只有一个气腔，因此，不可能发出人类语言的声音。其二，猿类的大脑构造与人类的不同。猿类的大脑相对于人类的大脑要低级得多，人类的话语与发达的大脑内部结构及复杂的大脑皮层密切相关，猿类的脑重量大大低于人类的，它们大脑皮层的沟回也相当的简单。倘若人类果真是由古猿进化而来，那么，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人类的祖先在脱离猿类状态之前一定是不具备语言能力的。这么看来，要以猿类的语言能力来探寻出人类语言产生的线索，从而证实猿类语言与人类语言一脉相承的联系，其前景倒不是那么令人乐观的。更何况，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现的古猿化石的年代都在800万年以上，20世纪末叶在埃塞俄比亚了不起地发现人类祖先化石，那也仅仅只是将人类的历史推进到400万年以前。这也就是说，就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祖先最早的化石，还没有超过400万年的，那么，动物语言研究又岂能凭

空跨越这400万年的断代而链接猿类语言和人类语言呢？如果猿类与人类是同宗的，那么，猿类与人类之间就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究竟是什么促使现生猿类与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上分离开来而产生了本质性的区别呢？此外，在不为人知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现生猿类和现代人类都已在各自演化的道路上走得无比遥远了，那么，现生猿类与古猿还能有多少相似之处呢？现生猿类还能够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人类祖先的化身吗？

其次，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方面。由于注意到婴儿与灵长目动物发生系统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便有学者开始从儿童语言习得入手，希望能从儿童语言发展，即语言的个体发生学中寻得人类语言起源的线索。20世纪初叶，通过对初生婴儿发音早期发展的一年追踪观察，学者们普遍认为，语言习得是一个模仿和强化的过程。但是，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追踪观察则表明：模仿不足以解释2—3岁儿童的语法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种新的理论产生，即婴儿有先天获得语言的能力，人类的大脑是为语言而准备的，当儿童处于语言环境之中时，某种显示或构成语言的一般性原理就会起作用，这就是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研究和观察表明，儿童语言习得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阶段：3—6个月是咿呀学语期，能理解面部表情和语调，能运用发音器官发出各种语音，但不会说出连贯的话语；6—9个月是幼儿语期，能对手势和简单的指令作出反应，在自身刺激的情况下不断地进行语音组合；12个月时为模仿期，能对外界作出积极的反应，说出最初的单词句，即一个词，同时又是一个句子，可以表达完整的意义；15个月时能对外界谈话的成分

加以整理和改编,形成自己的言语,能用双词短语进行交谈;两岁时则完全能够理解指令,开始用短语表达需求,但是,语言表达与成年人的逻辑表达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断层。四岁时就完全理解成年人的话语,掌握语法规律。在整个过程中,模仿和类比因素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婴儿出生之后就面临着有组织的语言系统,儿童是在语言交流的环境中习得语言的。那么,人类祖先能有现代儿童的语境吗?人类祖先的心理和生理机制能以现代儿童的心理和生理机制为可靠的参照系吗?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现代儿童的遗传信息和神经信息与人类祖先的还能有什么可比性吗?

最后,在原始部落的语言研究方面。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上肯定存在原始语使用者,他们的语言只是由简单的语法、少量的语音及数百个单词构成,他们没有抽象词语,常常要用手势来弥补语言本身的不足。人种史学者们和人类学研究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探访身居偏僻深山丛林之中的原始部落,收集、鉴定、研究原始部落的语言,大体将1000种语言分为三大语群:大奇布查语群(分布在中美洲、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等地)、热—帕诺—加勒比语群(分布在安第斯山脉以东、巴西亚马逊河流域)、安第斯—赤道语群(从中美洲到巴西南部)。研究者认为,可以说人类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是,迄今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语言也同样经历了进化的过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铜器时代"的语言,也没有什么"石器时代"的语言,所有现存的语言都有一个复杂的语法体系。的确,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语言自身的平等性,不以原始部落语言所表达的观念来判

断语言原始与否,而是就他们的语言系统本身来进行分析与评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原始部落语言并不原始,有时,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同样的繁杂、同样的严密,有时,也和我们的语言同样的简单、同样的明了。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于1921年指出:“在有关语言的一般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不过是它的普遍性。某个部落是否有足以称为宗教或艺术的东西,那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充分发展的语言。最落后的南非布须曼人(Bushman)用丰富的符号系统的形式言说,实质上,完全可以和有教养的法国人的言语相媲美。”①

总之,就目前的原始部落语言研究进展来看,要解决语言起源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其任重而道远。

近十年来的最新研究令人感到欣慰,随着神经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电子脑科学等等交叉学科的介入,语言起源的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有益的拓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能认识宇宙的人类在绘制出人类基因图之后已经开始走近人类语言起源之谜。

第二节　语言定义的逻辑理路

迄今,还没有一门科学像语言学这样不能提供研究对象的结论性定义。本节尝试对语言的定义进行学理梳理,回溯思想家们

---

① 引自:Edward Sapir.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1. P179.

对语言的基本追索路线，并以此为依托，直面当今多数语言学家惟恐避之而不及的语言本质问题，提出重新审视语言：只有对语言进行三维观照，才有可能本真地推导出语言这一语言学对象所特有的、本质的属性。

在语言学的视阈中，要研究语言，首先就得界定语言。给语言下结论性的定义是为了揭示反映在这一概念之中的对象所特有的、本质的属性。完备的定义必须遵守如下规则：

第一，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完全一致；

第二，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包括被定义项；

第三，定义项通常不能是否定的；

第四，定义项中不包含模糊的概念或语词。但是要给出语言的定义，还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明确语言的概念。

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至少包含三种意义：它可以指诸如汉语、英语、法语、日语等等某一社会集团内部的自然规约系统，可以指诸如蜜蜂语言、身势语言、画面语言、花卉语言等等具有引申意义或修辞性质的约定俗成的系统，还可以指诸如逻辑语言、数理语言、坐标语言、旗语等等非自然规约系统。而狭义的语言则是语言学的专门术语，是解构了言语体系之后的语言。这正是我们要界定的对象。

言语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言语和语言。言语是指个人说话的行为，是言语器官发出的一定声音与意义内容的结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活动。它是个性化的，又是暂时性的，所以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言语现象。但是，它不是纯粹创新的，因为

言语的无限多样性都是由相同符号的反复出现组成的。这种相同符号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是具象的,而且逐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制度,从而抽象化为语言。那么,语言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的言语现象了,而是有规律、有制度的语言系统。它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一种行为或者活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契约,是社会化的制度。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恰恰是这言语体系中的语言,即狭义的语言。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研究者们尝试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给出语言结论性的定义,遗憾的是,还没有一种定义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接受。有的注重语言的宽泛概念,有的则集中解释语言的某一个专业方面的特征;有的强调语言的功能,有的则关注语言与人类、动物、机器,等等的关系。而更多的著作或教材对语言的定义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代之以形式的描述、功能的认知以及特性的判断。有学者自我解嘲:语言本身是多元的,对语言的定义当然就应该是多元的了。而语言本身是复杂的,对语言的定义当然也就会是复杂的了。

界定语言的难度与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一、语言定义的学理梳理

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语言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们对语言都有过一番深刻的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在关于人类哲学的思考中对语言的体认、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关于语言哲学思考中对语言的思辨以及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és, 1875—1960)关于语言的社会心理学观点。

赫尔德对语言有如下思考：

* 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内容；确切地说，语言不仅是内容，而且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形式。
* 作为思维—认识的形式，语言是科学发展的首要前提；我们在语言中思维，在语言中构筑科学。
* 一个民族怎样言说，就会怎样思维，怎样思维，就会怎样言说，即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思维方式相对应。
* 人类的每一个知识领域都因一定的语言形式而形成独特的“色彩”和“界线”；语言的桎梏和轮廓赋予了全部人类知识。
* 应当建立一门符号学，以便通过语言诠释人类心灵的隐秘。①

赫尔德强调的是语言对思维和认识的能动作用，他的研究推动了思想界对语言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的思考，他的基本倾向是普遍语法。

洪堡对语言最为有力、最有深度的思辨表述如下：

* 语言就其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
* 语言绝对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

① Erich Heintel (Hrsg.).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60. P9—P88, P120—P140.

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

* 语言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整体上可以一览无余的或是可以拆散开来逐渐传递的质料,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永不停顿地自我创新的质料。

* 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

* 语言的规则和要素是有限的,运用规则和要素进行创造则是无限的。

* 语言中不存在任何零散的东西,每一个要素都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

* 在语言中,所有的成分都受到每一个成分的限定,每一个成分都受到所有成分的限定。

* 语言必然既属于主体,又属于客体,它是整个人类的财富。

* 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实在,这一实在尽管始终只能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思维行动中得以实现,但是它在整体上并不依赖于思维。这里提出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语言有别于心灵而独立存在和语言隶属于心灵而不能独立存在,实际上可以统一起来,进而说明语言的本质特性。[①]

洪堡的基本取向是:

第一,语言是体现在个体言语行为中的活动、一个不间断的创

① M. Böhler (Hrsg.).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73. P14—P124.

造过程。

第二,语言创造的规律即个体心理规律。

第三,语言创造是有意义的创造,好比创造性的艺术。

房德里耶斯在他的普通语言学著作《语言》(*Le Langage*)中系统地表述了他的观点:

> * 语言在社会中形成,从人类感到有交际需要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
> * 语言是最为典型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接触的结果。语言是维系社会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之一,语言的发展也是靠社会的结合。
> * 能够给语言下的最一般的定义是:它是符号系统。
> * 在符号和符号施指的事物之间,在语言形式和表象的内容之间,从来不存在自然的联系。
> *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助手。
> * 语言不可能存在于进行思维和说话的人之外,语言植根于个人意识的深处。
> *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1]

此外,我们不能不提到,在诸多经典著述中常常可以读到有关语言本质特性的精彩论断,其中不乏传世之说,这里不妨列举几

---

① Joseph Vendryés. *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 Histoire*. Paris: Renaissance du Livre. 1921. P26—P90.

例:

• 古代印度著名的语文学家潘尼尼(Pā ṇini,公元前 4 世纪—去世年代不详)认为:“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在具体场合讲出的话,即外显即时表达(dhvani),一种是抽象的语言原则,即内含永久实体(spnota)。”(《八章书》,A ṣṭādhyāyī,公元前 4 世纪)

•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主张:“语言是思想范畴诸经验的表现。语言形成于惯例,因为名称没有天然产生之理。”(《解释篇》, De interpretatione)

• 古希腊卓越的斯多葛派(Stoicism)认为:语言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声音或者材料,是一种象征或者符号;第二是语言的符号意义,即所说的内容;第三是符号所代表的外界事物。

• 中世纪以思辨语法而著称的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词形与词义之间没有天然的、内在的联系;自然界和语言结构都是有规律的,自然界和语言都有自己的系统,都是由有限的单位按有限的规则组成的。

• 19 世纪后期声名大振的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主张:语言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语言的变化受到机械运动的约束,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 崇尚理性主义观点而挑战新语法学派的新语言学派(Neolinguistics)这样看待语言问题:语言首先是个人的感情表达;语言变化主要是个人的事,同时也反映民族感情。

• 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说:“语言是说出来的、听得见的符号;人类社会的思想主要就是通过这种符号才得以表达。我们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制

度，正是许多类似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集团的文化。"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比较晚近的一些说法：

• 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认为："存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②

• 本书研究的对象、有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则说：

> 语言是心理现象或生理现象。语言起源于心理上的语象，语言的本质是心理的。
>
> ……语言是一个通过言语实践而贮藏于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宝库，是一个潜存于每个大脑之中的语法体系，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潜存于一群人大脑中的语法体系，因为语言在任何一个大脑中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群体中才得以完整存在。③

• 德国语言学家、比较语言学集大成者施来赫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认为：

---

① William Dwight Whitney. *Language and Language Study*. New York, 1867. P67.

②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 页。

③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 页。

语言不过是我们用耳朵听到的一种由脑、语言器官和它们的神经、骨头、筋肉等所构成的复合动作的结果。……语言是自然现象或个人现象。语言和生物一样,也要经历生、长、老、死的生物生命过程,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无关。”①

• 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则从另一种角度指出:

世界上只存在“个人的语言”,民族语言不过是“科学的虚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有多少人就应当有多少种语言,语言纯粹是个人现象。我们认为,尽管语言和人类的心理、生理、个人都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语言可以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人的发音器官密切联系,但是语言存在于个人的言语之中,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会给语言以一定的影响,等等。②

• 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将语言看作是一种心理禀赋,认为:“语言犹如大理石中的纹路,这些纹路原来虽然不大清楚,但是适宜于把它雕刻成什么样的东西,却早已由“天赋”的纹路决定了。”③

---

① August Schleicher. *Die Deutsche Sprache*. Stuttgart. 1869. P17.

② Hermann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Halle: Max Niemeyer, 1880. P44.

③ 参阅 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Neue Abhandlungen 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Hamburg: Felix Meiner. 1765.

毋庸赘言，语言学界还有很多关于语言本质的论述，有些也还是挺有意义的，不过，我的意图只是勾勒出主要的脉络，所以，就不在此一一罗列。

在追问语言本质的过程中，我们点击了语言研究道路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标识，结果，我发现，上述言论都是某一时期中颇为成熟的思想和观点，在历史上一度成为人们理解语言的主导性言说，同时，隐匿于它们身后的各种研究方法，诸如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动态的、系统的也因此得以彰显。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对语言研究出发点的描述，或许是精当而充分的，但是，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对语言之语言学意义上的结论性界定，那就显得多少有点过于笼统或宽泛了。然而，从客观上来说，大部分的言说并不是难以深入的，它们在学界形成了理论的激活点。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分别代表了对语言研究的渊源性的方法和视阈。

现在，我们不妨再进而回溯六个出自语言学名家之手的关于语言的定义。

(1)本哈迪：语言是人用来表达观念的分节音所构成的整体；语言源于智能，在时间中演化，直至形成；语言在此处是一种变化，在彼处则是一个系统。①

本哈迪所强调的是：

第一，语言具有哲学的特性；

第二，语言具有演变的特性；

第三，语言是一个系统。

① A. F. Bernhardi. *Sprachlehre*. Hildesheim. 1805. P48.

(2)萨丕尔:语言是一种通过意志力而产生的符号来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完全属于人类的、非本能的方法。……语言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①

萨丕尔突出强调的是:

第一,语言仅仅只是人类的活动方式;

第二,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手段;

第三,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理应被当作一个任意的习惯性符号系统来学习。

(3)特拉格:语言是一种任意(人为)的声音符号系统,社会集团的成员凭借它以自身全部的文化方式相互影响。②

特拉格更加注重的是:

第一,语言具有社会功能;

第二,语言是任意的;

第三,语言具有口语的本质特点。

(4)乔姆斯基:语言是一系列句子(有限的或无限的),每一个句子的长度有限,且由一组有限的要素构成。③

乔姆斯基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语言具有纯粹的结构属性;

第二,语言具有生成性。

---

① E. Sapir.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1. P14.

② G. L. Trager.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Norman, Okla.: Battenburg Press. 1949. P12.

③ A. N.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1957. P33.

(5)霍尔：语言是人类凭借惯常使用的口耳相传的任意符号来进行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一套规则。[1]

霍尔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语言是任意的；

第二，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三，语言具有交互性。

(6)许国璋：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2]

许国璋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语言具有多功能性；

第二，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

其他学科对语言的定义就更是错杂纷呈了，比方，文学家认为语言是艺术的媒介；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社会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哲学家认为语言是解释人类经验的工具；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都在试图给出语言的定义。后来的研究者们兼收并蓄，对所有的定义加以归并、整理，通过分析和比较，将已有的语言定义归纳为如下三大类，以便提供一般性的定义：

---

① R. A. Hall. *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Philadelphia & New York: Chilton. 1964. P5.

② 许国璋，《论语言和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 17 页。

(1)符号说: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

(2)思想说: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思想表达。

(3)工具说: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

二、界定语言的逻辑理路

就我个人的观点,要观察种子的生长,就得把种子放入土壤之中;要认识花朵的绽放,就得把花朵放在阳光之下、空气之中;要解读语言,就得把语言放在有机的整体社会交往之中。其实,无论从哪一种视角来观照语言,似乎都难免要面对语言的社会语境、心理语境和语言本体语境。为了能够合理地规避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的为定义而定义,我们不妨先从社会、心理、本体这三个源起性语境入手,寻找语言在三维语境中确定的坐标系,以实现在语境中解读语言本身特质的目标。而这恰恰又是语言定义的逻辑地平。

1. 社会语境中的语言

语言是社会事实。社会语境本身是富有蕴涵的实体,其中有众多的社会事实存在,语言便是这众多社会事实中的一种。

学界普遍接受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迪尔克姆、杜尔凯姆)对“社会事实”这一术语的规定性言说:首先,社会事实是独立于个人却又对个人有某种外部强制力的行动、思维和感觉的模式。其次,社会事实是集体的心智,是个人的集合,由相互的作用以及集合的表象所构成,换句话来说,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个人才可能表现出来,社会集团中每一个人都部

分地再现集体的模式。最后，社会事实是在特定社会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它的基础是社会，而不是个人。

首先，作为社会事实的语言，它的行为是言语。言语有外部制约，即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这种系统与所有社会规约一样，是社会集团全部成员所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这种系统不是社会集团成员自发得到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这使得每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无一例外地作出了共同的、惟一的选择。语言系统由此贮存于集体的心智之中。

语言作为社会事实的最重要的依据是：语言具有强制力。言语是个性化的，它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一种集合的表象，这是语言的基础所在，也就是说，没有言语就无所谓语言。但是，语言一经产生，就不仅仅是言语的产物了，它必然成为言语的工具，具体地存在于人们交流的言语之中，同时，它还反作用于言语，成为言语的规约。语言学家通过对言语的分析，抽象出全部言语所共有的、稳定的、直接可用的形式，即系统化的语言，其中包括语法规则、构词规律、语音制度以及语言内部的横向组合与关联聚合现象，并由此发现了语言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普遍存在于语言内部的规律与法则之中。所有的语言单位都不是孤立的，都存在于系统的关系之中，这个系统关系规定了每一个语言单位的功能，而每一个功能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解释语言强制力的正是这种系统、系统内部的关系以及这种内部关系所确认的语言单位的功能。就像天体的运行、季节的变换，语言也是由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着，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可以发现并描写语言的模式。比方，梵语动词的屈折变化、法语名词性及数的一致、汉语声调的规律，等等。再比

方,汉语有主语—谓语—宾语的句法结构,斯瓦希里语则有主语—宾语—谓语的句法结构,所以,汉语的"我吃饭","他喝水","我爱你"在斯瓦希里语中就变为:"我饭吃","他水喝","我你爱"等等之类的结构。我们试以"我爱你"进行分析比较如下:

汉语	斯瓦希里语
我爱你。	miminina kupenda.

mimi	ni-na	-ku	-penda.
[我	(现在时)	你	爱]

而法语则通常有主语—谓语—宾语的句法结构,只有当人称代词作宾语时,才会出现主语—宾语—谓语的句法结构,我们仍以"我爱你"进行分析比较:

汉语	法语
我爱你。	Je vous aime.

Je	vous	aime.
[我	你	爱(现在时)]

试比较:

Il	aime	le sport.
他	喜爱	体育

同时，语言规范与超规范、不规范概念的存在，约定俗成与违反规约概念的存在，都是语言作为社会事实的强化表现。其实，应该怎样言说，每一个言说者都遭遇着来自系统内部规律、法则等等的语言的强制力。例如，在英语中，polish the apple（讨好）是约定俗成的表达，而* brush the apple 则是违反规约的；在法语中，Elle a les yeux noirs.（她有一双黑眼睛。）是规范的，主语和谓语保持人称上的一致，复数名词和之后的形容词保持数量上的一致，而* Elle ai les yeux noir. 就没有保持人称及数量上的一致，因此是不规范的；在汉语中，“我正在晒太阳”这个语符列是符合汉语横向组合规律的，而*“我正在太阳晒。”就不是依照汉语的横向组合规律构造出的语符列了。再比方，法语中的限定词往往发生在被限定词之后，而汉语的限定词通常是发生在被限定词之前的。

试比较：

avoir le nez fin	有灵敏的嗅觉
obligation morale	道义上的责任
viande crue	生肉
banque de France	法兰西银行

其次，个性化的言语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再现普通的语言，同时又承受语言的强制力。语言在社会语境中的强制力是社会化的，也就是说，社会对语言有绝对的选择权，一经选择，语言就成为社会契约，每一个社会成员就必然要完全接受并服从这种语言，每一个言语所包含的要素与同一个社会集团中其他

一切言语所包含的要素是完全相同的,这种要素的同一性是整个社会集团成员所能理解的,社会语境强制性地要求言语要素的同一性,以确保一种语言的统一,社会共同语的存在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它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语言的强制力。《孟子》中所记录的一桩趣事即是佐证:

>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
> 曰:"使齐人傅之。"
>
>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所者,长幼卑尊皆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王何!"①

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如此。一个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于美国的中国人,从 5 岁开始就坚持每个周末上中文学校。在电话里,他与我却只能是用英语交谈。他时常给我寄信、寄贺卡,只是他的汉语语病连篇,错字百出。比方,*"祝您美力的愉快!",*"我非常反复的听汉语。"我戏称他是"白字老先生"。除了为"香蕉人"不谙汉语而感到有些许悲哀外,更多地是为社会集团语言的强

---

① 张文修(编著),《孟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05 页。另请参阅:吴乃恭,《孟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45 页。

制力而折服。

再者，语言的基础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语言并不是彻底地否认个性的独立创造或变更。倘若个性化的言语事实通过言语互动在社会语境中上升为语言事实，成为整个社会的契约，那么，个性化的因素就能够在语言事实中得以保留，反过来又规定言语。

综上所述，语言是从言语中超拔出来的神圣而不容置疑的一套有序的系统，它是由具有同一性的语言形式构成的稳定而不可撼动的规范。言说者只有服膺语言系统才可以在社会集团中言说，换句话说，语言，像其他社会事实一样，对任何人都是外在的，但是它制约着每一个人的言说，它是社会集团中每一个个体需要遵循的规范。这不仅仅验证了不同社会语境中特定语言的强制力，而且不同语言各自的系统性在此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彰显。

2. 心理语境中的语言

近代西方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提出：心理过程应当分为三种：（1）表象反映，即观念，是外部物体的表象，每种观念都有它的外部原型；（2）逻辑反映，即感情，是心灵对观念的反映，外物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是观念，在产生观念的同时，人们也产生对观念的主观反映。（3）意志，即努力或冲动。现代心理学将心理过程分为知、情、意，这与冯特的分类是一致的。而当我们观察心理语境中的语言时，我们发现，语言是不折不扣的心理实体。

首先，语言是双向的心理过程，即从听觉映象到概念，从概念

到听觉映象。概念与听觉映象在这样的双向交流中显示出心理意义上的符号特征,从而产生概念和听觉映象相结合的符号体系。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的开头部分就有过相关的描述:

> 有声的表达(声音)是心灵体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声音的符号。而且,正如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都并不相同,说话的声音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声音和文字)首先是符号,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心灵体验,而且,与这些体验的相应表现内容,对一切人来说也都是相同的。①

亚里士多德这一经典的言论让我们看到语言是作为符号而存在于心理语境之中的。

语言是符号,它自然就拥有一般符号所具有的共性。像服装、建筑、餐饮一样,语言是组合与系统的交叉统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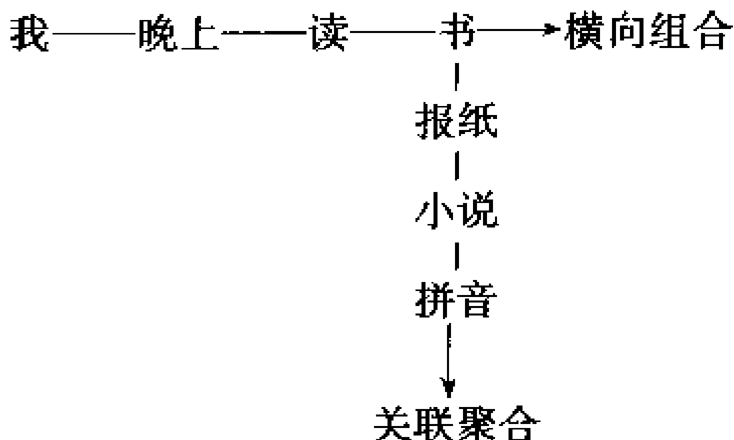
比方,一座建筑的同一组成部分的式样有可能发生变化,如不同形式的门厅、窗台、走廊、屋顶,等等,这表现为建筑的系统特征。而局部在建筑物整体之上的衔接就表现为建筑的组合特征。

语言也是这样,同一组成部分的形式有种种变化,而各个部分在语言整体之上的链接也各有不同。这些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关联聚合与横向组合。

比方:

---

① 参阅: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16a 3—9。



作为符号，语言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功能符号，后者总是有一个本体不在意指的表达实体，它们是由社会出于意指目的而加以衍义的使用物品，例如，钢笔用来写字，食物用来果腹，雨衣用来遮雨，等等。语言这个符号必然要反映出两个相关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着相关物之一的心理再现以及两个相关物之间的一种类比性。这样一来，语言符号显然就有了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分，前者是听觉映象、声音的心理映象，是用来承载各类事物意义或概念的；后者是意义或者概念，是被承载的内容。两者是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它们在心理语境中不分先后，协同作用，共同遭遇心理过程。这里特别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符号受指是意义或者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是具体事物的心理再现，具有心理性质，这正是索绪尔所称的"概念"。比方，"牛"这个符号的受指并不是牛这个动物，而是牛这个动物的心理形象。[①]

其次，语言这个符号是心理的必要组成部分。语言是心理的

① 参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以次。

外在表现，抽象化的概念即是佐证。语言有适应心理变化的潜能，可以对心理进行具体的、微观的、形象的外化，并产生可感知的听觉映象。它首先是从心理出发的，在对心理外化之后，又将回归心理，犹如叶落归根。它在出发、外化、回归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反作用于心理。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存在不可能不依赖于心理。正是在心理语境中，作为符号的语言才获得了生命和价值。因此，语言受制于心理，心理制约着语言，并成为解释语言的终极因素。语言和心理因此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语言是心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心理附着在语言之上，心理过程本身必然要有语言的介入，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知、情、意，就不可能有明晰的思维、实际的观念和确定的概念；另一方面，心理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必然要有心理作为支撑，否则语言就无异于天空和陆地，无异于水流的声音和火燃烧的声音。可见，赤裸裸的语言都是无根的，赤裸裸的心理都是无形的，两者彼此依赖，缺少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则将不复存在。此外，语言与心理过程是完全吻合的。难怪洪堡把语言看作是"思想的器官"。

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人类本性出发来彻底地解释语言与心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们还只是通过规定性的心理过程来体认心理语境中的语言，但是，就我们所能触及的角度和层面，我们已经发现语言与心理的本质共性。而藏匿于它们身后的且尚未被发掘出来的终极原因正是语言研究的迷人之处。

3．本体语境中的语言

语言就其本体来看，是一种声音和这种声音所负载的意义，是

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有意义的声音是语音，它是语言的形式，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有声音的意义是语义，它是语言的内容，是语言的内在物质。只有声音而没有意义，那就如同自然界的风声、雷声和雨声一样，不成其为语言；可只有意义而没有声音，那便不存在任何可感知的语言形式。语音和语义唇齿相依。

语音是人们用来表情达意的物理手段，它在本身制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间或发生表层的变化，尤其容易受到异族语音的影响；比方，古代藏语是没有声调的，但是现代藏语是有声调的；古代汉语是有弱音的，而到了现代汉语，弱音已基本消失。语义是概念的名称和言语接合的规律，是词汇和语法结合的抽象，它是言语体系中最经得起历史销蚀的部分。

可以说，语言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语音形式。语音和语义的结合贯穿整个言语体系。语音和语义彼此关照，互为条件，成为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同时，它们相互影响，彼此牵制，又是语言中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形式的选择提供意义要素，不同的语音具有不同的语义，不同的语义要求有不同的语音。换句话说，不同的物质外壳之下隐含着不同的物质内容，而不同的物质内在之上覆盖着不同的物质外在。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常规方面考察语音和语义之间密切的辩证关系，以进一步体认语音和语义的结合。

(1)变调

在一个语调单位中，如果某个音节发生调型变化，那就会相应产生意义上的改变。有时变化前后的意义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有时变化前后的意义是完全对立的。比方：

Bob didn't dance with John's wife last night.

a. 'Bob danced with John's wife last night. (John didn't.)

b. Bob 'danced with John's wife last night. (rather than hugging)

c. Bob danced with 'John's wife last night. (not his own wife)

d. Bob danced with John's 'wife last night. (not John's mother or sister)

e. Bob danced with John's wife 'last night. (not tonight)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声称:"In three weeks, England will have her neck wrung like a chicken."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随即对此作出强硬回答:"Some chicken, some neck!"据说他在广播中特别突出的音节是两个 some,他所表达的语义就发生了变化——小鸡不是好对付的,脖子也不是那么好拧的!

(2)重音

重音为语义提供区别性的特征,它一般分为三个级别:主要重音、次重音和三级重音。它们分别提供同形词语的词性语义要素、短语和复合词语的准确意义。比方:

'concert(名词)音乐会	con'cert(动词)商议
'digest(名词)摘要	di'gest(动词)消化
'present(名词)礼物	pre'sent(动词)提出
'produce(名词)农产品	pro'duce(动词)生产

ˈwhite ˈhouse 白色的房子	ˈWhite House 白宫
ˈhot dogs 最佳运动员	ˈhot ˈdogs 热狗

(3)停顿

停顿是语音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语义有非常强的承载力，犹如音乐中的停顿或休止一般极富表现力。比方，停顿消解歧义。(+表示停顿)

高级餐具+洗涤剂	高级+餐具洗涤剂
我看见+他很高兴。	我看见他+很高兴。
He hit the man + with the stick.	He hit + the man with the stick.
Nick + reports open forum.	Nick reports + open forum.
Peter saw that light house + keeper.	Peter saw that light + house keeper.

(4)语调

语调通常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平调、升调和降调，这三个基本调型往往交互式合作，形成诸如平升调、升降调、降升调等等多种复合调型，同样的一句话因调型的不同而产生语义上的差异。比方：

我们该走了。

a. 我们该走了(升调)。(现在还早呢!)

b．我们该走了(降调)。(我们现在就走。)

你起得真早!

a．你起得真早(平调)!(你起得这么早呵!)

b．你起得真早(升降升调)!(你睡懒觉了!)

难怪英国语音学家金敦(R．Kingdon)把语调看作是“语言的灵魂”(“Intonation Practice”，Pxiii)。一个简单句可以因语调的种种细微变化而承载诸多意义。例如：

他们正等着。

a．陈述

b．怀疑

c．提问

d．兴奋

e．诧异

f．勉强

g．命令

h．恐惧

i．讽刺

(5)音长

音长是指一个语音发音的长度。音的长度往往会因邻近音的影响而变化不一，也会受到整个篇章节奏的制约。但是，在连续的话语中，相对的音长是显而易见的。延长某个单词或某个单词中

的某个音节的语音可以表达特殊的语义。这个方面的经典例证是乔治·特拉格(George L. Trager, 1906—　)提供的:

Get out!

如果说得短促而有力,那就传达言说者的厌烦与愤怒;如果音拖得比较长,并伴随克制的音高,那就特别富有威胁性。

我们还有更多的例证,比方:

谢谢你的好意。

(拖长"好"音,那么,"好意"就不再表示"善良的心意",转而承载责备与愤懑的意义。)

成绩不错啊。

(一旦将"错"音拖长并用升调,言说者就不无戏谑的意思。)

以上五个常规方面的例证突出地强调了:语言是一个语音和语义结合的整体。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既定的,只有语音和语义全方位精密、巧妙的协同作用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言语体系。

通过对思想家哲学观点的回溯,通过对语言学家界说的再思考,通过对语言本质的三维观照,我便能够顺理成章地推出本真的语言定义,作为这篇论文的总结。希望这个定义可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贴近客观地描述语言所特有的、本质的特性:

语言是社会事实,是心理表征,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符号体

系。

第三节 语言学界说

一、语言学的遗憾

每当说起语言学,我们总是有一种莫名的遗憾。仔细想一想,不外乎三个原因。首先,语言学"出生"卑微。它来源于实用性极强的工具性学科。在中国,它曾是"小学",只是一门实学,是经学的工具,是经学的附庸。有小学,是因为要稽考古文献,分析古代语言,以便读懂经文。乾嘉时代,戴震的一段著名的论述便是佐证:

> 呜呼!经之所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①

在清代康熙中期刊行于世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知识归整的大分类。全书共计 10000 卷,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① 戴震,《戴震全集》(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78 页。

等六编，每一编之下又设有 4 至 8 典，每一典之下还分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部。可是在这浩大的类书中，我们却找不到小学典，只是在字学典的 24 个部里发现与小学大体一致的音义部，偏偏这个音义部又与书法、文房四宝、杂器等等同归一类，它显然被排斥在学术体系之外，不过是一种实用的工具而已。

在古罗马、古希腊、古印度，语言学曾是记录和描述具体语言事实的、考察有文字可证的语言历史的语文学，目的是要帮助人们理解宗教经文。比方，古印度用经验的方法编写了《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又称《潘尼尼经》），对梵语语法作了相当有益的讲解。用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它堪称是一部语法著作典范，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为了传播和解释古印度的宗教颂歌《吠陀经》而作的，其实，它所解释的语言现象全部都拘泥于《吠陀经》。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地道的经书。

在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我们发现，语言学从来就没有能够也不可能彻底地摆脱对文化史研究的依附。

毋庸置疑，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文，而不是语言。依我看来，对语言学的最初道路我们无从选择，就如同我们生来就不能够选择家庭一样。这是遗憾之一。

其次，与其他科学门类，如生物学、物理学等等比起来，语言学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原则，它不能坚强地而对语言本身实质性的问题。比方，生物学能够解释物种的起源，物理学能够解释原子的能量，而语言学却不能够解释语言的本源，不能够解释多种语言存在的原因，甚至不能够准确描述或钩稽一个因时代变迁而久晦不彰的具体的语言现象，即言语。以汉语的“华”字为例，

通人不华,穷民不怨。[1]

不以傲上华世。[2]

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3]

这些"华"字应当训为何种意义,分歧颇多。常有学者说,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而这门古老的科学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份权威,因为它把同样古老的根本性问题原封不动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是遗憾之二。

最后,语言学还存在归属问题。现行的科学分类定式多少让语言学有几分难堪。而归属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容不得轻视或怠慢。通常,一门科学的归属是研究对象的归属所决定的。比方,经济学研究经济,而经济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经济学就是一门社会的科学;文学研究的是人文现象,所以文学是人文的科学;植物学研究的是植物,植物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植物学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一门自然科学。可是我们的语言学呢?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是社会事实,是心理的表征,那么,语言学就应该是社会的科学;而与此同时,语言的语音现象却是物理事实,是自然现象,它牵涉到发音动作(生理现象)和语音特性(物理现象),所以语言学又理应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不仅如此,语言学总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比方,谱系树理论即来自生物学理论及方法的激励。再者,语言的交

① 《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四》,《四库全书》本。
② 同上。
③ 《荀子》卷十《子道篇》,《四库全书》本。

流又是一种人文的现象，是纯粹的人类创造，语言学似乎不能不属于人文的科学。面对这样的尴尬境地，不少学术著作对语言学归属的问题采取大而化之的态度，或空泛而谈，或只字不提。“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一说法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如此这般，语言学的合法性便遭遇严峻的挑战。我曾经认为，或许语言学最初是被归入自然科学领域的，因为从构词方面来看，英语用 linguistics(语言学)，法语用 linguistique(语言学)，德语用 Linguistik(语言学)，它们采用的后缀-ics，-ique，-ik 是自然科学名称的后缀，例如：英语的 mathematics(数学)，法语的 physique(物理学)，德语的 Botanik(植物学)。看来似乎有些理据，可是再一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倒是有不少这样的后缀呢，比方，英语的 classics(古典文学)，法语的 politique(政治学)，德语的 Epigraphik(碑铭学)。这看上去很有趣。也有学者提出，语言学是一门交叉科学。不过，交叉科学必定要拥有交叉科学的定义，它一定要有可靠的交叉点。

语言学的内部又何来交叉的支点！

这语言学的归属问题便是遗憾之三。

对语言学的出生和它的最初道路，我们都无能为力，而语言学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原则，这倒正是语言学的魅力所在，它给我们留下足够大的空间，让我们感到面对语言的一种快乐。我们面对语言的过程就是不断追问、不断发现的过程，没有定式标准答案，更没有束缚。而在此提出语言学归属问题，倒也不是要寻求一个简单而明了的答案或结论。我更愿意把语言学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过程，力求以观照基本面来研究具体课题。通过对这个

问题的发问,来触及语言最本质的状态,从而对语言学的内核及其外延进行系统、客观的科学研究。

二、语言学的界定

经过若干世纪的嬗变,语言学已经从小学或语文学中超拔出来,成为一门全新的科学。它有严整的概念和方法,有专门的研究对象,有发达、完整的理论系统,它是在语言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基本可以操作的、可以验证的、可以掌控的观察,对语言进行系统而有益的研究,研究的过程有基本的原则可循,研究的结果有客观的标准衡量。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它占有独立的地位。可以说,语言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假说、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总合。语言学是有关语言事实的科学,它既包括语言的社会事实,又包括语言的心理事实。这既是语言事实的标志,又是语言事实的标准。所以,语言学必须是要预先假定或包含一定分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语言学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界定:语言学是社会的科学、心理的科学和行为的科学。由此形成的三度空间组织可以确定人文语境中语言学的地位。或者说,三种不同的界定在概念上形成一个三轴果体,让语言在这个统一体中找到中心平面。遗漏任何一种,我们都不能建立一种能解释或描述语言现象的知识体系。

我们试图从以下五个基本方面来界定语言学:

1. 语言学的对象

语言学是语言的当然产物,语言学的对象无疑就是语言。可是,从科学前期的小学和语文学研究到科学时期的历史比较语言

学研究,研究者似乎并不是在努力寻找和发现语言学的对象。在科学前期,研究者只是出于对古文献考证的需要,将语法建立在逻辑之上,提供规则以区别正确的形式和错误的形式,而语法只不过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对语言本身缺乏科学、公正的观点。尽管如此,它还是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历史比较语言学把有关各个语言的或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各个不同阶段的语音、语法、词汇对应关系加以比较,开辟了新的语言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没有涉及或根本忽略了语言学的对象问题,致使它没有能够建立一门独立的语言科学。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语言学对象的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到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语言学的对象都是发生、发展机制。多亏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语言学的对象才最终得以确定,语言学从此在科学的总体中获得了独立的位置。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语言学对象,实际上是经历了诸多世纪的探索,得来不易。其他所有的科学都是在既定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在我们这个语言学领域也应该是这样。只有确定了语言学的对象,我们才能够进行有效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语言学对象的确定之时,正是语言学被激活之日。各种理论不断涌现,各种语言学流派相继产生,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发展阶段。我们不难看出,语言学的每一步推进都与对语言学对象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紧密相联的。

普通语言学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应用语言学,即索绪尔所谓言语的语言学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2. 语言学的目的与任务

语言学的目的在于阐明语言的本质及其规律,并解释和验证新的理论所提出的假设,提出关于语言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为了语言学的对象和目的,语言学必须要收集资料、检验假说、设计原形、构建理论,并对下列根本性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

* 语言的来源
* 语言的演变规律和结构规律
* 多种语言现象的复原
* 现存语言的运作规律

3. 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 系统性:语言是一个体系,应该作为一个体系来加以研究;要求从语言理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语言发展的结构与规律,并以此建立一整套假设和逻辑体系。寻找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关联和支配因素。必须遵循系统标准,在体系构架之内进行考据并建立学说。

* 客观性:语言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语言学在根本上不可能是规范性或主观性的科学。它必须通过客观的方法,即借助实验和各种参数,作定量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然而,它的客观性却是有限的,因为语言学牵涉到生理、心理、物理等现象,又与地理、数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等诸多方面紧密相联。作为语言学的基本原则之一的客观性只是相

对而言的。

4. 语言学的范围

* 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

外部语言学研究言语体系中言语的地理扩展和方言的分裂语境,不涉及语言的内部系统和规则。比方,交际的力量和乡土的观念,等等。它研究的对象包括民族语的历史、地理,普通语音学,词源学,等等,是一种异质的安排、鉴定与整理。

内部语言学研究言语体系中语言的组织以及语言的内在系统,比方,横向组合关系和关联聚合关系,等等。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严密的、同质的分类原则。

外部语言学是内部语言学的承载,内部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的前提。内部语言学涉及言语体系的恒定方面,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语言抽象的部分;外部语言学则观照语言的动态方面,受制于时间和空间,是言语体系的具象部分。

* 言语的语言学与语言的语言学

言语体系由言语和语言这两个方面构成。言语指个人说话的方面,是言语器官发出的一定声音与意义内容的结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活动。它是个性化的,又是暂时性的,所以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言语现象。但是它又不是纯粹创新的,因为言语的无限多样性都是由相同符号的反复出现组成的。这种相同符号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是具象的,而且逐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制度,从而抽象化为语言。那么,语言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的言语现象。它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一种行为或活动,而是一种集体

的契约,是社会化的制度。言语体系这两个方面决定了语言学的两个领域: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前者以语言为惟一研究对象,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且依赖于个体,语言的语言学是纯粹心理的。后者以言语体系的个人方面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言语,其中包括发音等物理现象,它是心理—物理的。

* 历时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种持续变化的实在,它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和结构变化,所有的民族语都随时间而演变,语言学家用比较的方法进行考察,发现同化、异化、语音交替、辅音音变现象及类比规律,等等。他们用类推的方法推导语法演变尤其是形态学方面的演变,构拟始祖语及语言的最早形式,以研究语言的谱系。

共时语言学则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现时的状态实体,它研究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的状态。通过收集语言资料,分析语言现象,确定语言状态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它研究语言中一切共存的现象。共时语言学是历时语言学的基础和必要前提。

* 理论语言学与描写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又称普通语言学,它研究所有存在的语言,提出理论概念和解释,并为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类型语言学提供一般理论框架,并建立普遍的原则。描写语言学则又称具体语言学,它是在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的影响下,通过对某一种语言系统的调查,依照这一种语言自身的语音、形态和意义模式,作出客观的

描写，并从客观的语言资料中提炼独立的语言单位，根据形式结构的区别来分析这一种语言。它有较为严格的描写、分析方法和程序，寻求发现某一种语言系统的论据，并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 类型语言学

类型语言学专门致力于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似与不同。通常依据语音、语法以及词汇的特征将语言分成不同的结构类型，目的是要发现语言的普遍特征。比方，所有的民族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有音段成分，如单个的 b，d，m，也有超音段成分，如重音，句调等。所有的民族语言都有词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有复合现象，如英语的 wall-paper（墙纸），法语的 petit-bois（窗棂），汉语的瓷器（瓷—器），也有派生现象，如英语的 king + dom ⟶ kingdom（王国），法语的 embarras + sant ⟶ embarrassant（棘手的），汉语的木 + 头⟶木头。所有的民族语言都有词汇更替的现象，有本义和转义，如英语的 mouth 本义是“嘴巴”，转义为“人”，“口状物”，“话”，等等。许多民族语言都用“舌头”表示“语言”，如汉语的“舌战”，英语的 tongue，法语的 langue，西班牙语的 lengua，匈牙利语的 nyelv，拉丁语的 lingua，芬兰语的 kieli，等等。类型语言学不仅进行类型特征的异同比较，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比较类型特征之间的蕴涵关系以及类型特征的历史顺序。以解释语言的来源、语言的演变规律和结构规律以及多种语言现象的复原。

5. 语言学的多学科领域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把语言学推向更为广阔的视阈，产生了

数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统计语言学、经济语言学、临床语言学,等等。比方,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数理语言学研究语言中数学的性质。最初,它运用数学的方法来统计音素、语素、词汇项目等等,现在已经从简单的词汇统计延展到语言代数模式的建立、语义分析、人工智能等等问题的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社会方面,各种不同的社会方言、双语现象、代码变换、社会地位与语言的相关影响等。心理语言学则是从心理学的观点研究言语和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像记忆力和注意力等方面的问题,语言习得、语言信息论、言语感知以及失语症等也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计算机语言学是在电子计算机发展到第四代的时候,约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的,它主要是借助计算机进行词汇、句法、文字识别、语音合成、文献风格、机助教学、机助翻译等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如何利用计算机来研究语言。在即将步入21世纪之时,又出现了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即计算心理语言学,这是一门介于心理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科学,它以现有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言语模拟,对言语理解和言语产生过程中句法处理与编码模式加以研究,并为人工智能中自然语言的运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语言学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这门独立的科学,播散性的视阈才相对得以存在,面当各分支学科逼视本体语言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语言学的许多分支已经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达到了一个需要高度综合的时期,需要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体系将语言学的各个分支统一起来,克服

逻辑理路上的前后抵牾，从而达到理论本原的彻底性。语言学应该由此获得有益的推进。

第二章　文本研究的基本语境

第一节　文本的结构

于87年前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仍是我们迄今研究索绪尔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文本，因为正是它推出了索绪尔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体系，构建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总体框架。它的正文结构如下：

1. 导论（附录：音位学原理）
2. 第一部分：一般原则
3. 第二部分：共时语言学
4. 第三部分：历时语言学
5. 第四部分：地理语言学
6. 第五部分：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

“导论”共分七章，概括性地阐述语言学史、语言学的内容与任务、语言学的对象、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语言的内部要

---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1916.

素和外部要素、文字对语言的表现、音位学，等等，并附有关于音位学原理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般原则"着重阐明语言符号的性质、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静态语言学和演变语言学。这个部分是索绪尔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共时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具体实体，对语言的同一性、实在性、价值以及语言内部的诸多关系，如横向组合关系和关联聚合关系，语言的机制，语法及其细部区分以及抽象实体在语法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是索绪尔内部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之本原。

"历时语言学"综述语音的变化及语音演变的语法后果，对类比进行了界定，并对类比与演变加以辩证的分析，对通俗词源学以及粘合、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实在性作了合理的界说，并附有关于方法论的研究。

"地理语言学"充分论证语言多样性、地理多样性的成因与复杂化，以及语言波的延伸，凸显了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体系中时空观的逻辑理念，构成索绪尔外部语言学的基石。

"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对历时语言学作了较为完整的归纳，对语言的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学中的语言证据作了理性的论证，对语系和语言的类型进行结论性的总结，呈现总体表述的理论线索。[①]

① 参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959年刊发在《索绪尔研究集刊》上的《索绪尔学派新文献》(Nouveaux Documents Saussuriens)[①]是我们当今研究索绪尔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文本,它是由戈德尔(Robert Godel, 1902—1984)根据索绪尔的学生孔斯唐丹(Emile Constantin)的课堂笔记编辑而成的。孔斯唐丹的笔记共有十一本,是迄今发现的索绪尔第三期课程最为完整的记录。数十年之后,孔斯唐丹的课堂笔记再度得到学者的关注,1993年,日本学者小松·英辅(Eisuke Komatsu)和英国学者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合作编译出版《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②]它收录了孔斯唐丹十一本笔记中的七本,其余四本因与《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有关历时语言学部分的内容大体一致而被编者略去了。正文结构如下:

1. 第一部分
2. 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对第一部分加以归纳,并冠以“外部语言学”之名,它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前三页)这三本课堂笔记,主要论述语言学历史、语言的差异、语言与地理、语言与文字以及音位学,较为客观地展示了索绪尔的语言观。

我们同样可以对第二部分加以归纳,并冠以“内部语言学”之

①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N°16. Paris. 1959. PP23—32.

② Eisuke Komatsu and Roy Harris (ed. & tr.). *F. de Saussur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Emile Constantin*. Oxford. New York. Seoul. Tokyo: Pergmon Press. 1993.

名，它包括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这四本课堂笔记，主要讨论语言的功能、语言符号的性质、语言的抽象性，其中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和线性原则、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共时研究方法和历时研究方法，等等。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之间作了有益的关联研究，突出强调共时研究。索绪尔的方法论得到了有效的指认。

第二节 版本考证

在语言学史上，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索绪尔本人因此被尊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然而，这部让索绪尔声名大震的著作并非出自他个人的手笔，它是由他的两位学生沙·巴依(Charles Bally，1865—1947)和阿·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1870—1946)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编辑整理而成的。巴依(在1895—1905年间)和薛施蔼(在1891—1893年间)都曾听过索绪尔的一些课程，但都没有听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在索绪尔开设这门课时，他们俩已经成为索绪尔的同事。尽管肩负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尽管没有找到索绪尔本人完整的讲稿，尽管只收集到一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但是，他们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竭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了编辑《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项艰巨的再创造工作。这部著作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一经问世，广为流传。

编辑出版这部著作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方面，索绪尔知识渊博，眼光敏锐，不断更新授课内容；另一方面，两位编辑者当时得到的索绪尔的备课提纲没有明显的体系性。巴依和薛施蔼最终决定

以第三期课程为主,充分利用阿·里德林热(Albert Riedlinger)提供的第一、二期授课内容,对三期课程的学生课堂笔记进行综合、对比和分析,进而阐述索绪尔的学术思想。客观地说,以这样的方式记录和传达学人的思想,疏漏与偏颇必定难免。但是,巴依和薛施蔼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版了一部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名著。这样的成就无与伦比!巴依和薛施蔼真正创造了奇迹!费尔堡(P. A. Verburg)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比作语言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①]事实上,索绪尔的影响和声望正是来自巴依和薛施蔼合作编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这部著作出版后近一个世纪,语言学家对索绪尔学术思想的研究,对索绪尔理论观点的评价,主要都是以这部著作为依据的,而对20世纪几代语言学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正是这部著作本身。语言学因它而步入现代期。

《普通语言学教程》经过多次再版、重印,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较早的译本有四种:日译本(1928)、德译本(1931)、俄译本(1933)、西班牙语译本(1945)。其他译本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英译本(1959)、波兰语译本(1961)、意大利语译本(1967)、匈牙利语译本(1967)、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1969)、瑞典语译本(1970)、葡萄牙语译本(1971)、越南语译本(1973)、朝鲜语译本(1973)、阿尔巴尼亚语译本(1977)、土耳其语译本(1976—1978)、汉语译本(1980)。

然而,随着研究的日益深人,语言学研究者越来越渴望认识索

① 详见: *Lingu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General Linguistics*. 2nd Issue. Amsterdam: North-Houand. 1950. P441.

绪尔本人的思想。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写方式和内容，学者们不断追问：编辑者是否有重大疏漏？编辑者是否作了错误的取舍？编辑者是否误解甚至歪曲了索绪尔的学术思想？《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索绪尔的理论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激发了学者对《普通语言学教程》进行考证的热情，考证工作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进入高潮期。的确，因为巴依和薛施蔼都没有亲耳聆听过索绪尔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加之索绪尔的学问博大精深，两位编辑者对课堂笔记内容的取舍以及对索绪尔学术思想的阐述不可能是无可挑剔的，而依照近半个世纪的考证，已经不难看出编辑者在结构安排和内容表述等方面与索绪尔原创理论体系的差异。参照以后发现的索绪尔的手稿和学生较为详尽的课堂笔记，研究者们总结出《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三大不足之处：

1. 编辑者改动了编排顺序，因而没有反映出索绪尔论点的潜在逻辑顺序。同时，编辑者改变章节主题及侧重点，因而没有完整地体现索绪尔的理论支柱和思想体系。例如，第一部分的《语言的地理差异》被挪至第四部分，且改题为《地理语言学》。而研究者认为索绪尔原本是要通过阐述语言和地理的关系说明时空对语言差异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为下一步区分语言和言语作铺垫。这种改变使索绪尔由外而内的完整统一荡然无存。
2. 编辑者删削了索绪尔理论的部分重点内容，尤其是关于符号系统。第一部分的《语言是符号系统》被改为《一般原

理》,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容因此被大量删削。而索绪尔学术思想上的普通语言学正是以语言共时符号系统为研究主体,即语言是符号系统。这种删削使索绪尔理论的纲领和主干线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另外,编辑者还删削了索绪尔在授课中援引的大量的印欧语系语言的例证。

3. 编辑者增加了部分章节内容,按照普通语言学涉及的部门分类,将《音位学原理》作为附录加入《导论》之中。这个部分的内容是编辑者从索绪尔 1897 年所作《音节理论》(Théorie de Syllabe)的演讲中辑录而成的,并非取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课程。这种添加内容的编辑使索绪尔意义上的普通语言学无可避免地落入俗套 。至于像"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①"语言学的惟一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是从语言本身也是为语言本身来考虑的语言"②等重要论点究竟是编辑者自己所加,还是来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课程或其他课程,就迄今为止的考证,仍不得而知。但权威研究者认为,它们都不是索绪尔的原话,他们的依据是:无论在索绪尔本人的手稿中还是在学生的笔记中都找不到这些话语。

那么,巴依和薛施蔼当初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呢? 他们有什么

① "La langue est une forme et non une substance."引自: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1949. P169.

② "La linguistique a pour unique et véritable objet la langue envisagée en elle-même et pour elle-même."引自: Ibid. . P317.

样的始发点呢？又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在颇为朴实的序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坦率而机智的针对性陈述：

> 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资料呢？首先得进行考证：虽然学生的笔记只是稍有索绪尔思想的端倪，且不尽一致，但是，对每一节课，对每一节课的细节内容，都要通过对照所有笔记来恢复索绪尔的思想。关于前两期课程的内容，我们得到了阿·里德林热先生的合作，他是最热衷于追随先生思想的学生之一，他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至于第三期课程，我们当中的一位，阿·薛施蔼也做了同样细致的核对和校订工作。
>
> 然后呢？口授的方式与著书的方式往往是相对立的，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而索绪尔又是一位不断创新的人，他的思想变化多端，当然从不会变得自相矛盾。将一切照原样发表是不可能的。在自由论述中不可避免的重复、交迭和多变的表达方式都会使这样印出的书显得杂乱无章。仅仅出版一期课程的内容——那么采用哪一期呢？——这本书会因为失去两期课程中丰富的内容而变得贫乏，即使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三期，单单这么一期是不能够呈现出索绪尔理论和方法论的全部思想的。
>
> 有人建议我们把独特创见的部分照原样刊印，这个想法起初倒是挺适合我们的心愿，但我们随即明显看出这样会有损于先生的思想，因为它只展现一座建筑的局部，而这座建筑的价值只能够在整体中得以凸现。

我们最终采取了最为大胆的但又是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法:以第三期课程为基础,利用我们手头所有的材料,包括索绪尔的个人札记,进行重组和综合。这无异于一种再创造,越是要全面客观,就越是困难。对每一个论点都应该力图找到它确定的形式,深入每一相关思想的深处,以整个系统为指导,将它从变化、不定的口授中提取出来,然后再将它置于它的自然语境中去,所有的部分都是按照作者的意图来编排顺序的,诚然,这个意图不是显露出来的,而是被推测出来的。

我们诚惶诚恐地将这本通过比较和重组而诞生的书交与学术界和所有语言学界的朋友们。

我们旨在建立一个无所疏漏的完整的有机体,……①

在考证工作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标志性人物有四位:戈德尔(Robert Godel, 1902—1984)、恩格勒(Rudolf Engler, 1930—)、毛罗(T. de Mauro)和斯留萨列娃(H. A. Слюсарева, 1918—)。

戈德尔是巴依的学生,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他继巴依之后主持日内瓦学派的工作。索绪尔的两个儿子雅克(Jacques)和雷蒙(Raymond)将索绪尔手稿札记捐赠给日内瓦对公众开放的大学图书馆,戈德尔对此加以充分利用,于1954年编辑出版了《索绪尔未刊札记》(*Notes inédites de F. de Saussure*),刊登在日内瓦学派于1941年创办的《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 de Saussure)第12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期上。1957年，时值索绪尔诞辰100周年，戈德尔出版了一部融版本考证和评注于一体的著作：《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溯源》，[①]该书结构如下：

1．编订《索绪尔稿本溯源》时所用的手稿清单

2．第一章：普通语言学在索绪尔学术生涯中的地位

3．第二章：手稿分析

4．第三章：编订者所做的工作

5．第四章：从手稿看索绪尔的基本观点

6．索绪尔语言学术语索引

据戈德尔本人陈述，此书是他将自己历年收集到的索绪尔原稿以及当初没有被巴依和薛施蔼利用的学生课堂笔记、资料等汇编而成的，其中包括：索绪尔本人的十九种札记，七位学生的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课堂笔记，六位学生的梵语、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的课堂笔记，里德林热的索绪尔关于静态语言学的讲话记录，戈蒂耶（Léopold Gautier）的索绪尔四次谈话记录，索绪尔给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的七封信，等等。戈德尔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普通语言学在索绪尔学术生涯中的地位，考证并注释《普通语言学教程》和索绪尔的手稿，理清索绪尔手稿和通行版本之间的关系，并对两位编辑者的工作加以客观的评论，澄清索绪尔的主要学术论点和哲学思想精髓。

同年，他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第15期上刊发《普通语言学教

① Robert Godel.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 Genève: Librairie E. Droz. 1957.

程,1908—1909,导论》(*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8—1909, *Introduction*)。

1959年,戈德尔的考证工作又进一步深入,他整理并编写了索绪尔的学生孔斯唐丹(Emile Constantin)的第三期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课堂笔记,以《索绪尔学派新文献》(Nouveaux documents saussuriens)为题,刊发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的第16期上。这是戈德尔发现的最为详尽的课堂笔记,而且之前并没有被巴依和薛施蔼收集或利用。1960年,戈德尔根据索绪尔亲笔撰写的回忆录,编辑整理出《索绪尔手稿汇编》(*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de F. d. S. remis à la bibliothèque publ. et univ. de Genève*),此文刊发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第17期(PP12—32)上。1969年,勤奋的戈德尔编辑出版了《日内瓦学派语言学读本》。[①]

戈德尔在语言学界被誉为《普通语言学教程》版本考证第一人,是索绪尔版本学研究的创始者。

推进版本考证工作的又一位学者是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恩格勒(Rudolf Engler, 1930—),他是戈德尔的学生,日内瓦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对索绪尔的研究始于1959年,以后写有多篇功底深厚的论文,如:《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理论与批评》(*Théorie et critique d'un principe saussurien: l'arbitraire du signe*)、《再论任意性》(*Compléments à l'arbitraire*)、《索绪尔体系及术语评注》(*Remarques sur S., son système et sa terminologie*),等等。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都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索绪尔研

① Robert Godel. *A Geneva School Reader in Linguistics*. Bloomington. 1969.

究集刊》上。他根据戈德尔的建议，以《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等资料为基础，编辑成一部以专家为受众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 Critique par R. Engler*），由德国威斯巴登公司出版。这部著作分为两卷：第1卷的1、2分册于1967年出版，第3分册于1968年出版；第2卷，即第4分册，于1974年出版。第1卷3个分册的页码以1—515统排，第2卷页码另起。第1卷的3个分册将《普通语言学教程》通行本的全部行文原样照排，同时附上有关的资料。版面设计颇为别致，整版分为6栏，Ⅰ栏按通行版本原样照排；Ⅱ、Ⅲ、Ⅳ栏分别是1、2、3期课程学生课堂笔记中相应的词句，是巴依和薛施蔼当初利用了的材料，Ⅴ、Ⅵ栏分别是孔斯唐丹的课堂笔记和索绪尔的札记原文，是《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后获得的材料。恩格勒不加任何评论，客观地将相关资料和盘托出。第2卷第4分册是索绪尔所有手稿汇编。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版本考证，虽然只印行了880份，流传范围相当有限，但是，它在语言学界，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毛罗是著名的意大利语言学家，著有《语义学导论》[①]《微观语义哲学》[②]等书，他从1964年开始研究索绪尔，并得到恩格勒的全力帮助。他将《普通语言学教程》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引用索绪尔的手稿，对照《普通语言学教程》，综合学术界对版本的考证和评

---

① Tullio de Mauro. *Introduzione alla semantica*. Bari: Laterza. 1964.

② Tullio de Mauro. *Miniisemantica: dei Linguaggi non verbali e delle lingue*. Bari: Laterza. 1990.

论,陈述自己的观点,于1967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就索绪尔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是对近五十年间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综述。这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于1972年被译成法文出版,[①]此书曾多次重印,流传甚广。

这部著作包括以下内容:

1. 《序言》(Introduction),概述索绪尔的学术成就;
2.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正文,以第三版为准原样照排;
3. 《索绪尔评传》(Notes Biographiques et Critiques sur F. de Saussure),对索绪尔的生平和各个时期的生活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并对版本的理论体系及其影响进行广泛考证和评述;
4. 《附录》(Appendice)和《补编》(Addenda)分析索绪尔语言理论与其他语言学家和流派的承接与异同;
5. 《注释》(Notes),详细注释《普通语言学教程》,共计305条;参考书目,约450种;
6. 索引。

版本考证工作不断深入,学者的考证研究也开始超越《普通语言学教程》本身。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俄国语言学研究者斯留萨列娃。她根据恩格勒的评注本编写出俄文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Соссюр ф. де. *Заметки по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Пер. с

① Tullio de Mauro.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 critique. Paris: Payothèque édition française. 1972.

франц. П. Нарумова, общая ред. Н. А. Слюсаревой. М. : Прогресс, 1990, 275 стр.)。这部著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索绪尔在各个时期的讲稿、文稿和笔记;第二部分是索绪尔1903年写的一篇回忆录(1960年由戈德尔首次编辑出版);第三部分收入索绪尔于1889年写的三封信,信的内容与立陶宛语有关,其中一封是写给立陶宛学者姚纽斯(K. Jaunius, 1849—1908)的,两封是写给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的。这部著作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印行了一万册。至此,索绪尔如此多的原稿汇总在一起出版,尚属首次。它是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版本的进一步考证和补充,它试图理清索绪尔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为进一步深入考证与研究提供了相当珍贵、可靠的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法英对照)(*F. de Saussur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Emile Constantin.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1911,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isuke Komatsu & Roy Harris, Oxford: Pergamon Press.)于1993年出版,编译者小松·英辅和罗伊·哈里斯根据索绪尔的学生孔斯唐丹的第三期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课堂笔记加以编辑,并译成英文。《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三本课堂笔记手稿,论及语言学研究的历史,语言与地理,语言与文字以及音位学,等等诸多外部语言学问题;第二部分包括四本课堂笔记手稿,论及语言符号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如任意性原则、线性原则,共时研究方法和历时研究方法,等等诸多内

部语言学问题,但历时研究方法未作详细笔录。

有研究者认为,在《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普通语言学教程》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对原版本的考证工作可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过,我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索绪尔本真学术理论与《普通语言学教程》之间的差别,还是编写者版本与课堂笔记版本之间的差别呢?毕竟,课堂笔记也是笔录者参与构造了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我认为,比较而言,《普通语言学教程》推崇一种简单的思考,一种理性的思辨,由此而闪耀的学术理论的魅力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光彩夺目。我将它看作是现代语言学的一本《圣经》,它鞭辟入里的分析、简约灵动的叙述、大处落墨的风范都让这部不可多得的大作常读常新。

第三节 索绪尔哲学思想的发育与成长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于1857年11月26日诞生于日内瓦(Genève)一个殷实而又有威望的家庭。他的祖父尼古-泰奥多尔(Nicolas-Théodore,1767—1845)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博物学家,在日内瓦大学任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他的父亲亨利(Henri, 1829—1905)是一位优秀的自然科学家。亨利秉承父业,研究地质学,在25岁至27岁之间,便完成了对安德列斯、墨西哥、美国的地质考察,并收集了珍贵的矿物资料和昆虫标本,他集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于一身,成果颇丰,在吉桑(Giessen)荣获博士学位,随后又成为日内瓦名誉博士(honoris

causa)。索绪尔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科学、勤于研究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索绪尔祖父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克戴特(Adolph Pictet)是语言古生物学(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的创始人,也是 19 世纪中叶日内瓦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索绪尔很小的时候,他就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帮助他掌握了希腊语、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等等多种语言。他的著作《印欧语系的起源》[1]和两卷文集《语言古生物学》[2]对索绪尔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索绪尔最初是在皮克戴特的母校霍夫威尔中学(collège de Hofwyl)就读,课余时间常与皮克戴特谈论语言古生物学和词源学(étymologie)等方面的问题。1870 年,索绪尔进人马迪纳专科学校(l'Institut Martine),师从米勒内(Millenet)教授,从哈斯(Haas)的希腊语法(Grammaire du grec)人手,开始学习希腊语。在学习希腊语的过程中,他发现在两个辅音之间的 n 可以与 a 交替,于是,他推断出 n = a 这一等式。经过近三年时间的思索和大量的语音实验,他得出这样的一个推断性结论:在一定的条件下,n 在词语中的某些位置可以导致 n 变成 a。有了这么一个发现,他便决心尝试制订出“语音的普遍系统”。1872 年,他写成《语言论》(*Essai sur les langues*),其主要论点是:只要假设 p = b = f = v, k = g = ch, t = d = th,就可以断言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词语都起源于由两个或三个基本辅音构成的系统。索绪尔当时找到了不少具体的语言

① Adolph Pictet. *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 Genève. 1856.

② Adolph Pictet. *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 2 vols. . Genève. 1859—1863.

证据,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把这篇论文寄给皮克戴特,很快就得到回信。皮克戴特给予他热忱的鼓励,并因势利导,一方面希望他继续深入研究语言,另一方面告诫他尽量避免偏激、武断的结论。索绪尔的这篇论文后来以《试论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语可归结为数量不多的词根》为题,收录到《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 de Saussure)第 32 期(1978)上。

由于皮克戴特的建议,索绪尔于 1874 年开始自学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又研读了库尔蒂乌斯(G. Curtius)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üge der Griechischen Etymologie*),他敏锐地发现两位学者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日内瓦大学拉丁语言文学教授保罗·奥尔特拉马雷(Paul Oltramare),并得到许多有益的指导。

1875 年,正值 18 岁的索绪尔便顺利进入日内瓦大学学习。按照父母的意愿和家庭的传统,他专修物理和化学,但他同时选修哲学、历史、艺术、语言学等课程。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和研究,他确信自己将来的事业只能是语言研究。1876 年春季,他便写信给当时享有盛誉的法国语言学家阿·伯尔盖纳(A. Bergaine),申请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学会(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并寄去论文《论后缀-T-》(*Le suffixe -T-*),又经他的朋友莱奥波德·富尔(Léopold Faure)的鼎力推荐,1876 年 5 月 13 日,他被接纳入会。

1876 年 10 月,征得家人的同意,索绪尔转学到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那时正值新语法学派发轫之际,也是诸多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辩论得最为激烈的时候,而莱比锡大学恰恰又

是新语法学家的学术中心。以莱斯琴(S. August Leskien, 1841—1916)、奥斯特霍夫(H. Osthoff, 1842—1907)和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9)等人为首的新语法学派(néogrammairienne)明确宣称:所有作为机械过程的音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不允许同一方言内有任何例外(ausnahmslose Lautgesetze),同样环境下的相同的音永远以同一的方式发展;但作为词汇或语法实体的一些特定词语所据以产生的类比构成和再组合,也同样是历史和史前一切时期的语言变化的普遍成分。[①]他们宣告这些见解是历史语言学所不可或缺的,并欣然接受带有嘲讽意义的绰号"青年语法学者"(Junggrammatiker,初出茅庐的语法学者)。索绪尔在这批当时最富创造精神的语言学家们的指导下,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此外,他还研修了以下语言课程:莱斯琴教授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胡布斯曼(H. Hübschmann)教授的古波斯语,温迪希(E. Windisch)教授的凯尔特语,奥斯特霍夫教授的梵语导论,布劳纳(W. Braune)教授的德语史以及库尔蒂乌斯教授的比较语法。

值得一提的是,布鲁格曼既是莱比锡大学任教的最为杰出的德国语言学家,又是个人心理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他撰写论文《论印度—日耳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提出"鼻音共振"(nasalis sonans)规律,这与索绪尔在几年前就总结出来的 n = a 不谋而合。这就更增添了索绪尔研究语言的信心。

---

① 参见:R. Jakobson,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Phonologie*. T. C. L. P. 4, 1931, P247—P267.(《历史音位学原理》)

1878 年 12 月,年仅 21 岁的索绪尔发表了震惊语言学界的论文《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Le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es*),他把印欧语系语言的元音和响音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归结为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替公式,推翻了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语言学家所借鉴的古印度语法学家的"增长理论",奠定了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系统新学说的基础,对以后的语言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篇论文是索绪尔的声誉所在,它标志着索绪尔一生事业中最为光辉的阶段,是索绪尔典型的科学精神的体现。这篇论文于 1887 年在巴黎重印。

尽管当时有学者指责索绪尔有剽窃之嫌,也有学者对索绪尔本人和这篇论文大加贬责,但是,这篇论文最终还是无可辩驳地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索绪尔的学术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与当时学界潮流相反,索绪尔不是在空想令人费解的历史理论问题,而是在寻求语言学这一科学的真正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是武断的,是不能确定的。"这是近百年来学术界引用的最频繁的一句话。

此后,索绪尔转入柏林大学,不久又回到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880 年 2 月完成博士论文《论梵语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énitif absolu en sanscrit*),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过去这篇论文一直被看作是单纯技术性的平庸之作,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却获得了全新的评价,并逐渐得到世界各国语言学家的认可:

第一,填补了当时语言学界的学术空白。论文选择句法作研究、探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当时被各大语言学派所忽略;

第二，高屋建瓴，创立理论新视角。论文根据与绝对处所格的关系论证了属格的价值，确定了它的区别特征。

毛罗对这篇论文做出了得当而又积极的评价："索绪尔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①

索绪尔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便离开了莱比锡，迁往法国巴黎。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学说和在欧洲学术界掀起的"格士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ie），即完形心理学对索绪尔产生了无可避免的深刻的影响。他常与好友费朗西斯·德·克律（Francis de Crue）等探讨语言学、心理学，等等诸多问题，旁听米歇尔·布勒阿尔（Michel Bréal）的课程，同时在高等研究学院（l'Ecole des Hautes Etude）教授梵语、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1887 年起，又开设了印欧语文学概况。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新颖，得到校方和学生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索绪尔积极参加巴黎语言学学会的活动，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负责该学会会刊的编辑出版，在 1881 年至 1891 年这整整 10 年间，他培养了诸如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格拉蒙（Maurice Grammont，1866—1946）等一批法国优秀的语言学家，建成法兰西学派，对法国青年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索绪尔也因此与法国语言学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法国国家档案馆至今仍保留着关于索绪尔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得荣誉勋位（la légion d'honneur）的说明材料。

然而，这样的荣誉并没有能够让索绪尔留居巴黎，人们想像不

① Tullio de Mauro.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 Critique. Paris: Payothèque édition française. 1972. P331.

出是什么原因使学术核心地带成长起来的且为之踌躇满志的索绪尔接受了日内瓦大学为他提供的教授职位,那里的学生不多,水平也不高。从现有资料来分析,我认为索绪尔终究不堪忍受来自少数且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无休止的诋毁与排斥,恰恰是非学术的纷争让索绪尔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总之,索绪尔厌倦了。于1891年离开了他奋斗了10年的法国,回到他的故乡。当年冬季便开始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回国后,他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立陶宛语和中世纪德国传说,以及拉丁诗人的专有名词字谜。不久,他便结婚,有了两个儿子,很少出游,更少与外界交流。索绪尔在自己的国度寻得了生活的自在与学术的安宁。

他多年从事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并开设此类课程。根据戈德尔书中所列的学生笔记,他讲授过如下课程:

日耳曼比较语法 (1881)

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1887)

立陶宛语 (1888)

印欧语言比较 (1891)

梵语 (1892—1894)

希腊语与拉丁语语音学 (1892)

印欧语言的动词 (1892)

希腊语与拉丁语语源学研究 (1893)

希腊语动词 (1893)

古希腊碑文选读 (1894)

希腊语的名词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4)

波斯诸王碑文　(1895)

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　(1895)

荷马史诗的语源与语法研究　(1895)

希腊文学作品的方言　(1896—1903)

欧洲地理语言学(古代与近代)　(1902—1903)

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4—1905)

日耳曼历史语言学　(1906)

古英语　(1906)

古高地德语　(1906)

由此可见,索绪尔已经把整个印欧语系的主要语言作为授课内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教语法、语音、方言、古代形式和近代形式,而且还从比较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地理分布的观点去进行分析、讲解。他从大处着眼潜心研究语言学,对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形成极为深刻的认识,他发现这两门学科都是建立在对过去语言的重建与猜测之上,而轻视了语言本身的分析。索绪尔从未轻言放弃,一直在努力摆脱 19 世纪的历史主义,同时,对新语法学派的理论也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1906 年,时逢一位老教授约瑟夫·魏尔特海默(Joseph Wertheimer)退休,学校请他负责普通语言学的教学。从那时起,索绪尔隔年授课,1906—1907,1908—1909,1910—1911。他因此得以宣传共时研究和系统研究,创立新的理论,改革语言研究。当然,他并没有彻底地舍弃历史比较语言学。1909 年,他被评选为丹麦科学院会员,1910 年,被授予法国研究院通讯院士。遗憾的是,1912 年夏天,蓄势待发的索绪尔便罹患重病,不幸于 1913 年 2 月

辞世,终年56岁。生前,他没有将他的革命性理论编写成书,他讲课的内容后来由他的学生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于191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1922年再版,到1949年出了第五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语(1931)、西班牙语(1945)、俄语(1933)、英语(1959、1974)、日语(1928、1935、1972)、汉语(1980、2002)等等,这使得索绪尔的独到见解名闻遐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在索绪尔之前,无论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还是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语言研究的对象都是语言的发生、发展机制,语言对当时的研究者来说就是历史考察的对象。索绪尔则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天地,进入了语言的静态世界和语言的体系结构。他认为,静态的认识应该先于动态的认识。语言首先是社会的表现手段、交际工具。语言学必须研究作为表现手段的符号的性质。语言学由此便在科学的总体中获得了确定的位置。《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了三个最主要的原则:

第一,语言是一个体系,应该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

第二,语言体系的研究在语言存在的一定时期内不应以语言历史的研究取而代之;

第三,语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语言而不是其他任何事物。

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方法论探讨的基础,它不仅确定了语言科学发展的方向,而且还标志着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开端。归结起来,索绪尔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区分了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前者把语言学当作某一特定时间内一个自足的交际系统,后者则集中研究语言在较

长历史时期中所经历的变化。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均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原则，都是完整的语言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在历时语言学较为成熟的语境之下，索绪尔强调在当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共时研究应优于历时研究。

第二，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前者指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是相对稳定的本质部分，是语言集团言语的总模式，它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而后者则是语言的投射和体现，是在某种情况下个人的说话，即说话者可能说或理解的全部内容。语言系统是一个由形式构成的系统；而言语是实际的讲话，是依赖于语言系统的一种行为。索绪尔区分语言与言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语言研究的对象从混沌体中分离出来并得以凸现。这为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分辨研究的原则。

第三，索绪尔提出必须从共时的角度把任何一种语言都看成是一个由互相关联的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等成分构成的系统。他发现了两种最本质的语言关系：一种是意识二项对立，这种关系产生互有区别又可以彼此交替的形式，比方，浊音与清音相对（如 b 与 p），单数与复数相对（如 woman 与 women）。这种关系自然而经济地反映语言自身的性质。另一种是构成语符列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即横向组合与关联聚合。横向组合关系确定横向组合的可能性，即可能组成一个语符列的那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关联聚合则是可以在一个结构中占据某个相同位置的形式之间的联合关系，即能够互相替换的成分之间的对立。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两个无可替代的重大影响：

第一，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

他认为语言是由单位和关系构成的系统。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这个系统,确定语言单位,确定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之间的横向组合规则。这一点已经成为公认的语言学研究定义,并由此产生了描写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索绪尔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学支流,从根本上说,是对系统内部单位和关系的性质所作的进一步研究和拓展。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第二,他明确界定语言学的具体基本观念,诸如共时观与历时观、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以及系统中的诸多关系。基本观念的确定促成了语音学、音位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音位的区别性概念成为音位学的核心内容。严格地说,现代语言学中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而进行的。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观念问题实实在在地启动和推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后不久,欧洲就出版了以研究共时语言学为主的学术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叶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 1860—1943)的《语言:本质、发展及其缘起》、[1]加德纳(A. H. Gardiner)的《话语与语言的理论》[2]以及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的《普通语法的原理》[3]。《普通语言学教程》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在欧洲乃至全

---

① 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Allen & Unwin. 1922.

② Allan H. Gardiner. *The Theor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London. 1932.

③ Louis Hjelmslev. *Principes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Copenhagen. 1928.

世界得以传播和继承，其中，直接传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理论的有布拉格的音位学派、哥本哈根的语符学派和以马丁内（A. Martinet, 1908—　）为首的功能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起，三派在欧洲形成了空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现在，我们通常认为索绪尔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囊括现代语言学中所有的主要学派：布拉格学派（Pràgue School）、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美国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以及转换语法（transformation）。有些研究者认为，最后这个学派从根本上改变了索绪尔留传下来的语言学观念。他们坚信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的转换生成语法问世之后，索绪尔所确定的横向组合与关联聚合因素的重要性即被削弱，因为乔姆斯基用不同于索绪尔的另一种形式来说明语言内部结构的问题，在其理论上使用了不同的聚合类，这些聚合类是在句法规则中使用的，是有效地运用句法规则所必须的。但是，在我看来，只稍作推理或探究，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索绪尔将其横向组合关系与关联聚合关系理论加以合理扩展，使之可以应用于句法方面的话，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规则恰恰体现了索绪尔所提出的语符列原则。说得明白一些，乔姆斯基有效地应用并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念，我看辞项组合与句法组合之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关系区别。乔姆斯基声称其理论来源于《普遍唯理语法》，[①]而实际上是对索绪尔的直接传承，只遗憾乔姆斯基没有自始至终坦言对索绪尔理论的借贷。

---

① Antoine Arnauld & Claude Lancelot.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Paris: Republications Paulet. repr. 1969.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是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语言学派。该学派始创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整个30年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维伦·马泰休斯(Vilém Mathesius, 1882—1945)、俄国语言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Prince Nikolai Sergeyevich Trubetzkoy, 1890—1938)、俄国出生的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自1928年起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并刊行《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他们强调需要用功能的(functional)方法去进行语言分析,认为语言是一个互相之间有联系的单位系统。在音系学(Phonology)这个平面,布拉格学派用索绪尔的理论来阐述音位概念。音素属于 parole(言语),音位则属于 language(语言)。他们根据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来确定音位与音位之间的不同,如/d/是"齿龈音"+"塞音"+"浊音"。音位单位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休现,在连贯的话语中,语音单位的语法功能是重要的,比方,可以作为词语的界标(boundary signal)。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①是布拉格学派的重要学术著作。此外,布拉格语言学派也强调语言的非语言特点,考虑说话者的社会背景、交际的主题、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他许多语言的外部因素。他们反对哥本哈根学派那种将语言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脱离符号的实体去研究纯粹的关系等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语言既然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研究这个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

---

① N. S. Trubetzkoy.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Prague. 1939.

现实的联系,不能抛开实体去研究语言结构中的纯粹关系。

布拉格学派所擅长的是对语言的当代形式的共时研究而不是历时研究。具体地说,布拉格学派追随索绪尔的学术思想,对语言进行共时分析,在索绪尔的言语体系和语言结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学说。他们广泛探讨标准语、语言修养、功能语体、修辞学、文艺学、诗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对修辞学和语体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重视语义标准,主张采用对立论,他们扩大了语言的比较范围,提出了"分析比较"的原则和语言联盟的思想,这对类型语言学和地域语言学的研究是一个不小的促进。为了强调自己的特长,布拉格学派曾明确表示应该把自己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拉格学派传承并发扬了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他们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系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多领域中居于先锋地位。1976 年,法国成立了以马丁内为首的国际功能语言学会,旨在发展布拉格学派的基本思想。

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又称新索绪尔语言学(Neo-Saussurean Linguistics),这个学派的产生以 1931 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于 1939 年创办《语言学文献》(*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该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丹麦语言学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教授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他创建了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即语符学(glossematics)。像其他追随索绪尔的学者一样,他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是某一时期内一个独立配套的自足体系,而不是语文事实的混合物。这样,语言学就是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内在性的"

学科,它有自己的方法论和术语体系。他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①,并认为语言是价值的系统,语言学家应该从完整的语言材料出发,在形式(内部语法关系)、实体(外部物体范畴)、表达(词语或文字中介)和内容(意义)的框架内,按照组合成分的关联聚合(Paradigmatic)关系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关系对话语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和半代数的程序,目的在于得出基本不变的单位语符(glosseme)。

叶尔姆斯列夫强调:形式的定义是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形式与实体是对立的。他发展这些论点,主张内容的分析不能依赖语言之外的存在标准,而表达的分析(音位学)也不能依赖语音标准。一门科学的对象是成分之间的各种关系,而不是这些成分本身。只有自始至终完全严格地坚持这一点,才有可能建立索绪尔所设想的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科学而独立自主的语言学。形式与实体都可以分析成最终成分,换句话说,这两种形式各有自己的最小要素,即成素。例如,boy 在语音形式方面可以分析成:/b-ɔ-i/或者b-o-y,在内容实体方面可以分析成:男性—人—年幼的。最终成分是不同形的,在单个的音位或字母与最小的内容成分之间还不能找到某种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两个方面是对等的,应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完全体现了索绪尔的思想。

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中区分"序列"和"系统"。"序列"是词、短语、句子等形式结构。符号的序列包含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两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 1916. P169. 中译本,2002 年版,第 135 页。

者都由系统中的要素构成。序列的成分之间,系统的大类、小类、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语言归根到底是一套形式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

哥本哈根学派试图通过构成要素和关系来说明语言的内在结构,揭示语言在表达平面上和内容平面上以及这两大平面之间各个形式要素的依存关系的网络。他们认为,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描写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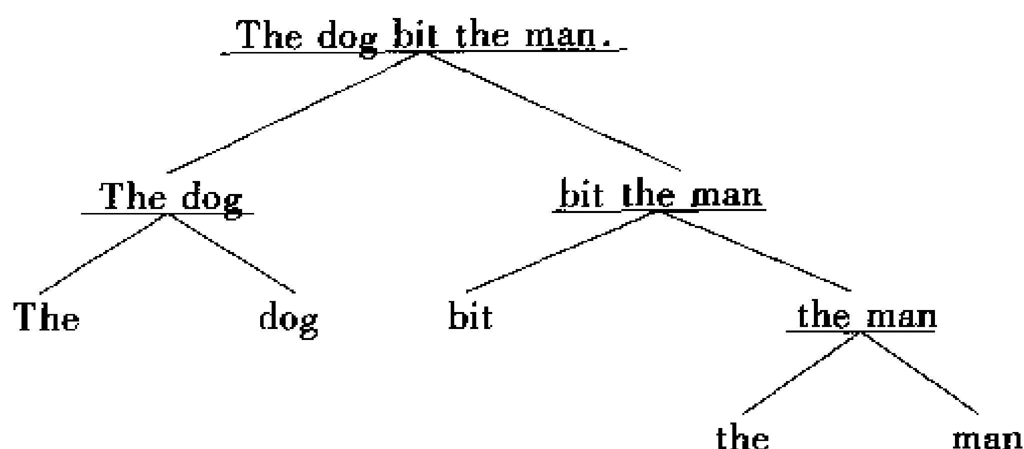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American Structuralists),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American descriptivists)。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语言学经历了兴起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形成学派,以注重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面著称。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是伦纳德·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他于1924年创建美国语言学学会,并于同年创刊《语言》(*Language*),这本刊物一举成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重阵。布隆菲尔德曾于1913年至1914年到德国来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进修语言学,受业于莱斯琴(S. August Leskien, 1840—1916)和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9)等新语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学习新语法学派的历史语言学,他高度评价并严格遵循“格里木定律”(Grimm's Law)。[①] 他在早期所写对萨丕尔(E. Sapir)《语言论》的评论(*Classical Weekly*, 1922, P142—143)中指出:索绪尔给语言

① 即在第一音变(First Sound Shift)和第二音变(Second Sound Shift)中的辅音变化,借助这种辅音变化,可以将日耳曼诸语言和其他印欧语分开,把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分开。此定律以德国著名的语法学家雅各布·格里木(Jacob Grimm, 1785—1863)的名字命名。

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布隆菲尔德的著作《语言》(*Language*, 1933)最先系统地表述了语言学分析的综合理论和实践,这部著作为美国结构主义奠定了描写方法的理论基础,其语言学理论在美国的权威地位保持了长达20年之久,激活了各派语法及语音学的描写研究。他以索绪尔理论为指导,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又有别于其他主要学派。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语言结构的功能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学派重视结构之间的关系,美国结构主义则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主张运用一些便于客观地进行语言描写的操作性较强的方法和概念,把重点放在形式分析之上。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这是因为美洲印第安语基本上没有文字和历史材料,这一学派从一开始就只能从口语着手进行共时的形式分析。在作形式分析时,不考虑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只研究语言本身,在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形式的对立能决定意义的不同。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确定和划分句子结构的成分,尤其是直接成分分析法,将句子按层次区分出它的组成成分。例如:The dog bit the man.(狗咬人。)这个句子首先分成 the dog(狗)和 bit the man(咬人),然后,再将 the dog 分成 the 和 dog, bit the man 分成 bit 和 the man,最后再将 the man 分成 the 和 man。至此,这句话的组成成分是:the - dog - bit - the - man,请看直接成分分析图解: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描写中的两个基本单位是音位和语素。音位的概念后来被扩展到包括一切具有音位那样区别作用的语音现象，建立"语素音位"，这是语法和语音结合而成的单位。例如，语素音位/f/是/waif/中的/f/(wife 妻子，单数)和/waivz/中的/v/(wives 妻子，复数)的总括。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结构分析方法已经卓有成效地广泛应用于各种有悠久传统的语言，它对世界各地的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由此可见，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研究都是以索绪尔为参照点，是对索绪尔所提出的理论和思想的阐述、延伸和发展，尽管我们不能说现代语言学的每一个时期的学术特点都可以直接追溯到索绪尔的学术理论上去。

第三章　索绪尔语言观的形成语境

第一节　概述

索绪尔的语言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一直接受着传统语言学理论的熏陶，是伴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地成长起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位在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造诣都非常深的学者。事实上，索绪尔曾是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倡导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索绪尔批判与创新的出发点，正是在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土地上，索绪尔构筑了自己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家园。可以说，索绪尔是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伟大继承者、批判者和扬弃者。那么，是怎样的传统语言学激活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又是怎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催生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念？是怎样的学术语境让索绪尔对自己从前的语言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索绪尔开创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缘起性语境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都知道，索绪尔语言观的形成不是突发性的或线性的，也不是同质的文本独白，而是索绪尔在传承前辈思想家哲学精神的同时不断与当代人产生思想上的交流、抵触、冲突等等过程中逐渐

地、一点一滴地形成的。在我看来，要研究索绪尔就必须回到索绪尔理论的原始生态，回到索绪尔思想的历史语境中去，应当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寻得文本的时间与空间结构，才能够给予索绪尔以同情的理解。换句话说，只有呈现研究对象原初的语境，还原研究对象本真的状态，确定研究对象寄生的母体，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历史渊源，才能够触及它的根本精神，才能够发现它的创新价值，才能够剖析它的发生性结构。这正是我们获取一种全新解读方式的途径。其实，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脚踏实地走进令人神往的索绪尔的理论家园。

在本章的以下四节中，我将分别呈现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情况，展示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反思与批判，对索绪尔与前人的相关观点及话语进行对比，避免将庸俗的解读或贬低强加于索绪尔及其前人，以期呈现真实的思想和科学水平。我更愿意呈现没有经过乔装打扮的本真发展语境，这样做倒不是要对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索绪尔的前人进行简单、大体的介绍，而是要将它们作为更恢弘画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把索绪尔置入现代语言学的史前文化氛围进行考察，比方，索绪尔并不是提出历时态与共时态区分的第一人，也不是提出符号问题的第一人，那么，在历史主义作为惟一解释模式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索绪尔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了现代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呢？为什么偏偏是索绪尔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了“现代语言学之父”呢？

第二节　传统语言学的学理梳理

从全世界的语言研究来看,潘尼尼(Pā ṇini,公元前 4 世纪—去世年代不详)首先创立了印度梵语语法研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前 322)、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 428—前 348)以及亚里士塔尔库斯(Aristarchus)、盛诺多图斯(Znodotus)、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则首先利用逻辑学原理研究句子成分和词类,创建了希腊语语法研究,之后罗马人汲取希腊语语法传统,发展了系统化的拉丁语语法研究。

依照传统划分,文艺复兴是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开端,当代历史的大部分特点都是在那时出现的,并持续地保持到了现在。这种观点在历史学领域是否精当、客观,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从语言学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介乎古代和新时期之间的"黑暗而不光彩"的中世纪(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 15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恰恰对现代语言学乃至当代语言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学术活动与成果直接影响着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轨迹,一直到今天。

拉丁语是中世纪欧洲教堂和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共同语。当时的各类语言研究都与拉丁语紧密相连,并且首先仿效拉丁语语法(Latinate grammar)体例,拉丁语语法被用作规定性的语言教学工具。语言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以教学为目的,同时推进语言的规范化。这种实用性的语言研究加速了语言科学的成长和发展。比方,《圣经》的拉丁语文本的译者圣哲罗姆写有一封长信,专门讨

论翻译理论的问题,并论证翻译应该是意义对应(意译)而不是逐字对译(直译)。中世纪的教育是建立在"自由七艺"基础之上的,分"三才"(tiīvium)和"四技"(quadrīvium)两个部分,前者包括语法、雄辩术(逻辑)和修辞学,后者包括音乐、美术、几何、天文。这样,语法就成了中世纪学术的基础,它既是七艺之首,又是拉丁语正确阅读和写作的必备知识。

在语言学史上,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后半期,即经院(scholastic)哲学时期,从 1100 年左右至中世纪结束,语言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语言描写方面取得了诸多技术性的成就。尽管它仍以单纯的教学为目的,以识字、通俗文学和教育规范为目的,但是,它派生出语言学描写。最为突出的例证是《第一篇语法论文》(*First Grammatical Treatise*),作者是 12 世纪冰岛的一位佚名学者。他(她)倡导改革拼写法,以期完善从拉丁字母表演化而来的冰岛语字母表的用法。他(她)提出音位是一个复杂的、由音素来体现的音系单位,每个音位都是由若干个独立的区别性特征所组成,每一个区别性特征都表明作为语言实体的音位的特征。这一理论比布拉格学派的音位概念还要早 800 年呢!他(她)还将音位概念作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应用。

此后不久,善于对事物特有性质进行周密考虑的哲学家们提出了"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即"表义的方式"(de modīs significandī)的论述。他们率先突破纯教学需求,拒斥对语言现象的表面说明和描写,刻意探索语言内部的规律和理论,现在看来,这着实使得语言学理论渐入佳境,从而走进一个明确而独特的发展阶段。他们崇尚的原则是:所有语言具有共同的语言结构。他

们的研究兴趣并不在于狭义的语言科学,而是在于构成语法基础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难怪当时盛行这么一句名言:发现语法的不是语法学家而是哲学家。

第一位提出语言普遍现象问题的是古罗马晚期哲学家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480—524)。他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所以,存在着各种语言都有的概念,即概念具有共性,语义因此具有了普遍性。

13世纪时,彼得鲁斯·西思班努斯(Petrus Hispanus)在他的《逻辑学概要》(*Summulae Logicales*)一书中重新确定人们一再提出但解释各异的significātiō与suppositiō之间的区别,并将其称为词的"分立而有联系的语义特性":significātiō可译作"词义",指"符号或词语跟符号受指事物之间的关系",而suppositiō可译作"替代",指"某一特定符号可以替代或被理解为符号受指事物"。"词义"先于"替代",换句话说,在同一语言结构中,连用的各种词义(significātiōnēs)越多,替代的范围越小。比方,homō意为"人",而homō albus仅指"白人"。此前,有学者采用二元对立的概念,如意义和施指,内化和外化,内涵和外延,等等。西思班努斯的《逻辑学概要》堪称学界不朽之作,先后印刷了上百次,成为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其影响渗透了几代学人。

更有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作了明确的划分,强调形式与物质对立,即形式替代和物质替代的对立。前者用于对象语言或第一级语言之中,后者用于元语言或第二级语言中。两种替代的典型例证分别是:

1. 戴安娜是王妃。

2. 戴安娜是个名字。

当时注重思辨语法研究的经院语法学家，即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也普遍接受这一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区分。普里斯基安论及语音(vox)与词(dictiō)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的特性。

一位早期的摩迪斯泰学者马尔白的米歇尔则认为：一个词本身包含了作为其物质的声音和作为其形式的意义。

而摩迪斯泰学派的主要成就不是语义关系的概念理论，也不是词汇和语音之间的区别，而是句子分析中的细心推敲，即句法描写理论，如介词的功能、语法可接受性的形式标准、从属、支配和及物性等概念。

在摩迪斯泰语法体系中，事物作为存在物具有各种特性或存在方式(modī essendī)。人的意识是以主动理解方式(modī intelligendi actīvī)而存在的，被意识所领会的事物的性质或存在方式则是被动理解方式(modī intelligendī passīvī)。在语言中，意识赋予语音(vōcēs)以意义，语音便成为各种词(dictiōnēs)；同时，意识又赋予语音以各种主动表意方式(modī significandī actīvī)，语音便成为各种词类，表示着各种事物的性质，这些性质是有各种被动表意方式(modī significandī passīvī)，即由词语施指的各种事物的性质来表示的。用摩迪斯泰学派的术语来说，意识将存在方式从事物中抽象出来，并将其视为理解方式，语言则使这种抽象概念通过表意方式传达出来。事实上，理解方式产生了表意方式，但是，前者本身在历史进程中也是受到表意方式及其具体表达形式影响的。

不仅如此,摹迪斯泰语法体系还揭示了语言构造赖以形成的基础——一切事物所共有的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持久存在的方式(modus entis),一种是变动存在方式(modus esse, modus fluxūs, modus fierī, modus mōtūs);前者指事物在时间上永久或持续的特性,后者则指事物变化和承接的特性。

表意方式是摹迪斯泰语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一种词类的区分取决于特定意义范畴的归类,每一种词类都用一种特殊的表意方式来下定义,以区别于其他词类,这样,就给各类词所表现出来的每一种形式差异归结为一种独特而明确的意义范畴。不过,摹迪斯泰学派作出的最大创新和最有意义的发展则是在句法方面。他们将语法研究的重心从词法转向句法,他们所提出的句法理论以及许多基本概念、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摹迪斯泰学派理论有如下最具代表性的句法论述:

一个可接受的句子(Sermō congruous et perfectus)是从以下四条原则中产生的:

第一,物质上:词作为语法类别(constructibilia)的成员;

第二,形式上:词在各种不同结构中的结合;

第三,效能上:以屈折形式(modī significandī)表现出不同词类间的语法关系,这些关系是结构所要求的,是说话者的意识所决定的;

第四,结局上: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

可接受性有如下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句子中的词类必须是能够组成句法结构的,如名词+动

词；

第二，词必须表示出恰当的屈折范畴（modī significandī accidentālēs），比方，vox－vōcēs；

第三，词作为单独的词项必须是可组配的，如 cappa nigra（黑帽子），但* cappa categorica（范畴帽子）是不可组配的。

名词与动词的结构（compositiō）是句法的根本。摹迪斯泰学派提出用主语（suppositum）和谓语（appositum）这两个术语来指基本句内两个部分的句法功能。名词和动词的基本表意方式就包含在主语和谓语的相互关系之中。其余的部分或与主语有关，或与谓语有关。他们提供的经典例证是：

Sōcratēs albus currit bene.

（白头发的苏格拉底擅长跑步。）

分析得出：

主要结构——主语（Sōcratēs）＋谓语（currit）

从属成分与中心成分——albus－Sōcratēs，bene－currit

从属成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albus // bene

摹迪斯泰学派还有更为先进的理论，他们认为：结构中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依存或被依存的关系。他们根据依存关系的实现来分析句法关系。例如：

依存	被依存	例证
动词(谓语)	主格名词(主语)	Sōcratēs currit (苏格拉底跑步)
动词	间接格名词(宾语)	legit librum (读书)
形容词	名词	Sōcratēs albus (白头发的苏格拉底)
副词	动词	currit bene (跑得好,擅长跑步)
名词	属格动词	filius Socratis (苏格拉底的儿子)

这一理论的价值是:透过词形变化一致的表层关系,认识句子结构内部的句法关系。此外,摹迪斯泰学派还提出了"及物结构"(constructiō transitīva)和"不及物结构"(constructiō intransitīva)来指句子组成部分和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某些句法关系。他们就一个词的范畴是否与其他的范畴直接联系,区分了"有联系方式"(modī respectīvī)和"独立方式"(modī absolūtī);前者被定义为"句子结构的基础"(principia constructīonis)。

摹迪斯泰学派建立的句法体系使他们能对某些词类的基本功能进行更为清楚的观察,而各种关系和各种范畴的体系的划分显示出语法学家对句法观察的显著进步以及术语和理论的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摹迪斯泰学派理论研究基于以下两点共识:

其一,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词形与词义之间没有天然的、内在的联系;

其二，自然界和语言结构都是有规律的，自然界和语言都有自己的系统，都是由有限的单位按有限的规则组成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摩迪斯泰学派得出了一种关于语言结构，包括词语结构和句法分析的明确而前后一贯的理论。

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世纪思辨语法学家的语言学思想是如何从当时的学术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中世纪的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一种知识体系，希望各个分支、各个学科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知识体系中接受同一哲学原则和宗教原则，而语法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创建了语言科学体系。这一语言科学体系是现代语言学成长和发展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可以说，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世纪传统语言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有中世纪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观照，我们才具备探讨现代语言理论和语言分析的基础和条件。

伴随着文艺复兴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再认识和再发现使语言研究领域出现了变革，加之人文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政治的兴起，以及欧洲各国的海外扩张，这些都给语言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语言学因此而显示出它从未有过的活力。一方面，从希腊语、拉丁语的研究成果入手，吸收思辨语法学家的理论；另一方面，博采众长，运用和发展来自非洲、亚洲的语言学材料和语言学传统。欧洲语言，特别是日耳曼语族得到了更为系统、深人的研究。

第一部西班牙语语法在 15 世纪问世；最早的法语和意大利语本族语语法则是在 16 世纪初出版的。波兰语语法和古教会斯拉夫语语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语言科学的观点从此迅速传播并

得到广泛运用。

希伯来语(Hebraicis)由于在《圣经》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而倍受关注。对希伯来语的研究随着《圣经》日益广泛流传,并深入发展。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罗伊希林(J. Reuchlin)是一位精通古典文化的伟大学者,他撰写了《基础希伯来语》,[①]对希伯来语的语法传统和拉丁语的语法传统加以分类比较,从而将名词进一步分为名词、代词、分词,把小品词再细分为副词、连词、介词和叹词。这部著作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欧洲的语言学家开始学习、了解非印欧语系语言研究,研究视野得到了有益的拓展。拉丁语从此不再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语言。随即出现了欧洲各语言的语言学著作,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波兰语、斯拉夫语,等等。

文艺复兴时期最为杰出的是法国的皮埃尔·拉梅(P. Ramée, 1515—1572),他既是哲学家,又是语法学家,他以当时的结构主义先驱而著称。他积极倡导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讲授古典语言。在《语法流派》(*Scholae grammaticae*)一书中,他详尽地阐述自己的语法理论,强调对古代语言必须遵循古典作家所保持的习惯用法,而现代语言必须遵照操本族语的人所保持的习惯用法。他传承中世纪语法理论,依据一致和支配这两个句法关系范畴,以词是否有数的词形变化为基础,对语法进行人木三分的描写和严格的逻辑分类,从而构建了他的句法体系。拉梅还著有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等语法著作。对经院哲学实施了较为深刻的反动。

---

① J. Reuchlin.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Pforzheim. 1506.

中世纪时期在语言描写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技术性成就以后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继承和发扬。在16、17、18世纪，或许是受到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启迪，哲学界致力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两派思想家的观点对怎样看待语言问题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经验主义的兴起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公认观点的一种挑战。经验主义哲学观首先来自英国。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他强调一切知识始于观察。重视归纳法，反对演绎法。经验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外部的感觉印象，再经过抽象和概括等思维活动而形成。由于经验主义哲学观的影响，英语语言研究开始对英语的每一个音作系统语音描写，即正音法；对英语语法作形式分析，即正字法；并以此开创了语言研究中的语音学和音位学。在这个方面最有成就的首推霍尔德（W. Holder）。他的著作《言语要素》于1669年由皇家学会出版。他制定了发音的一般理论，认为辅音的差异导源于一个器官与另一个器官之间闭合程度的差异，塞音为全部闭合，而擦音和持续发音为部分闭合。在他看来，元音的差异是开张度的差异，他对前舌和后舌的提高以及圆唇等作了进一步的区分。霍尔德对语音发音的描写极其细致、简洁、明确。他认为言语"取决于闭合度和开张度的交替"，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现代色彩，换句话说，他的观点已成为现代语言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

在语法研究中提出重大改变理论的则是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和库珀（David Cooper）。他们从语义角度出发，把词类分为全义词和小品词两大类，前者本身具有明确的意义，后者则只能伴随地表示意义，即说明或修饰全义词的意义。这种语法分类体

系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语言学之中。[1]

由此可见,经验主义的观点有利于描写语音学和语法形式及其结构。

与此同时,法国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理性主义也在影响着语言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宗教兼教育机构的波尔－罗瓦雅尔(Port-Royal)学派的哲理语法著作。理性主义语法从多方面继承了中世纪的经院语法,但他们并不是创造新的交流系统,而是通过拉丁语和法语之类的语言来阐述语法的一般理论。他们所遵循的普遍主义基础是人类的理智和思想,他们不涉及外部世界的存在方式和思维中用以观察、解释的理解方式之间复杂的关系。波尔—罗瓦雅尔学派的语法学家的研究证明:普遍语法隐含于各种语言的实际特性之中,而不是表现为一种语言。他们编写了一部普通语法著作,从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欧洲各种语言中摘引大量实际例证,力图证明所有这些语言都具有语言的普遍特征,从而揭示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语法,以及所有语言在思想表达上的一致性。

波尔—罗瓦雅尔学派有一项具体的理论成果:他们从语义角度出发对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九种词类——名词、代词、冠词、分词、介词、副词、动词、连词、感叹词——加以分析,并将它们归并为两大类:

---

① 请参阅:David Cooper.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London. 1972.

1. 对象——名词、代词、冠词、分词、介词、副词

2. 形式——动词、连词、感叹词

从此，语言学家们不再是依据表层结构来指认词类，而是从表层结构的内涵来解释词语的特殊性质。他们对关系代词的经典分析即是证明：[1]

Dieu invisible a créé le monde visible.

（不可见的上帝创造了可见的世界。）

这个句子包含了三个独立的命题或思维判断：

1. Dieu est invisible.（上帝是不可见的。）

2. Il a créé le monde.（他创造了世界。）

3. Le monde est visible.（世界是可见的。）

在这三个独立的命题中，第二个命题是核心的部分，构成句子的主体，第一个和第三个则是从属的，仅仅构成句子的附属，这个附属部分通常潜存于人类的思维之中，而只有通过关系代词才能将它明晰地表达出来：

Dieu,　qui est invisible,　a créé le monde,　qui est visible.
上帝（上帝）是不可见的　创造了世界　（世界）是可见的

（不可见的上帝创造了可见的世界。）

---

① 详见：Antoine Arnauld & Claude Lancelot.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Paris: Republications Paulet. 1969.

18世纪普遍语法哲学理论在英国的杰出代表是詹姆士·哈里斯(James Harris, 1709—1780)。他的《交流技艺之神赫耳墨斯,即语言和普遍语法的哲学研究》[1]于1751年出版。像所有普遍主义语法家一样,哈里斯对具体语言不同的结构特性和所有语言都必不可少的共同原则加以严格区分,哈里斯的语法体系要求有两类"主要词":一类是名词(包括代词),或称"实体词",即"具有实体意义的词";另一类是动词,或称"修饰词",即"具有修饰意义的词"。动词包括在形式上可以区分为诸如动词本身、分词和形容词等等的词。他认为词与受指实体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词是有意义的声音,句子则是有意义的声音的复合体。他将自己的理论建筑在普遍现象之上,但是,他更加重视语言的个性,强调每一种具体语言各自的特点都是有意义的,揭示语言与民族历史和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文艺复兴以后,经验主义者重视具体语言的个别变异,强调必须根据观察来调整范畴和分类,而理性主义者仍在探索所有语言在表面差异之下所存在的共同特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有关语言研究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研究方法的差异:前者以观察到的用法为基础,从外部对语言进行调查性研究;后者则从人类语言内部进行探索性研究,把语言看作是人的天赋,看作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我看来,他们各有各的价值,没有必要对立,也不必选择其

---

① James Harris. *Hermes: o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Menston: Scholar Press. 1751. repr. 1968.

一，后人得益于他们理论的整合，这在以后的论述中将得到有力的印证。

文艺复兴时期广泛的语言研究使19世纪初期语言学研究学术成果得到空前的展现。

第三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文脉

19世纪被认为是语言的历史比较时期，尽管此前不乏历史比较研究，比方，佛罗伦萨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俗语论》（De Vulgari Eloquentia）论述了方言变体并涉及不同语言的同源问题。但丁分辨了三种严格属于欧洲的语系：北方的日耳曼语系、南方的拉丁语系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及其比邻的亚洲部分的希腊语系。他把当时的拉丁语地区分成三种有明显区别的地方语言，这些地方语言都是从语法学家所记载下来的拉丁语演化而来的，它们拥有大量完全相同的词，而这些词又都能追溯到拉丁语，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的共同起源。

著名学者斯卡利格（J. J. Scaliger，1540—1609）则把当时世界上已知的语言划分为十一个语系，四个大语系，七个小语系。其中的四个大语系相当于现在的罗曼语系、希腊语系、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也是语言同源论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遵循《圣经》的学说，认为从希伯来语发展出两大语族，一个是凯尔特赛西亚语（Kelto - Sythian），另一个是阿拉米语（Aramain）。莱布尼茨极力主张研究词源，在他看来，词形和词汇是探

索语言之间历史关系的重要依据。在莱布尼茨的积极倡导和游说下,诞生了相当可观的多种语言比较资料汇编,诸如词表、词典、读本,等等。最为著名的是俄国女皇卡捷琳娜二世授意编纂的《全球语言比较词汇》(*Glossarium Comparativum Linguarum Totias Orbis*),它包括200种语言或方言的词汇,于1780—1787年间初版,1791年再版时,已收入272种语言或方言。而西班牙传教士赫尔伐士的《语言目录》(*Catalogo de Las Lenguas*)则特别提供了有关美洲语言的新资料,研究欧洲、亚洲、美洲的语言近300种。

印度语言学在历史早期就达到了它的古典时期,到了19世纪,印度的语言学研究者们已经确立了不同的学派及其独特的理论,同时还有公认的文本和原始资料,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评注和诠释。语义学、语法学、音韵学和语音学等现代描写语言学所涉及的主题理论,在印度语言学传统中都已经得到较为详尽、深刻的探讨和研究。

19世纪初期,第一本英文版梵语语法著作问世。此后,印度的梵文古典文献陆续被译成欧洲各种语言。欧洲人对梵语语言学研究的极大兴趣和高涨的热情给欧洲的学术界带来了双重的结果:首先,梵语与欧洲各个语言的比较形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系统发展的最初阶段;其次,印度语言学传统的优势在欧洲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对当时欧洲语言学的若干分支学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比较语言学因此具有了发生、发展的两个必备条件:

1. 世界语言材料的广泛收集;
2. 认识梵语。

学者们致力于把有关各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在历史发展中各个不同阶段之间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等对应关系加以比较。有必要指出，19 世纪的语言学主要集中在印欧语系的诸多语言的历史比较上。这一研究在方法和理论方面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梵语的研究成果，而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中有多位梵语专家，像阿·施勒格尔(A. W. von Schlegel, 1767—1845)、弗·施勒格尔(F. von Schlegel, 1772—1829)、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 1802—1887)等等。

1808 年，弗·施勒格尔发表了论文《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为建立古文化学而作》(Uber die Sprache und die Weisheit der Indier. 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humskunde.)，他强调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即形态)的重要性，因为这有助于搞清楚语言的谱系关系。通过对语言内部结构的深入思考，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靠词形本身的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另一类则是靠词语的顺序表示语法关系的。1816 年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变位系统比较》。1833 年，波特出版了《印度—日耳曼语言领域内的词源研究》。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较为古老的形式以及各亲属语言里的形式来确定某一个语言形式的词源，亲属语言是同一母语形式的变体。这一理论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梵语研究的成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欧洲语言相似性的发现促使一大批语言学研究者们兴奋地追索语言历史演变的轨迹，在相似性中指认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从而发现所有

语言的共同原始语。而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辩证法又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者提供了语言演变的观点。

19世纪初,语言科学界最著名的四位学者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 1787—1832)、德国杰出学者格里木(Jacob Grimm, 1785—1863)、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严格地说,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是从拉斯克和格里木开始的。这两位语言学家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拉斯克于1814年向丹麦科学院提交了一篇题为《论斯堪的纳维亚语即冰岛语的起源》(*Undersö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拉斯克对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作了精彩而周密的论述,他的理论要点有三:

第一,必须全面而有条理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框架,从而发现这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类似之处。应避免从一种语言中挑选若干细节或词语来与另一种语言相比,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普遍意义的。

第二,对语言亲属关系的判断不应该仅仅以词汇的统一性为基础,而应该以语法的一致性为基础。因为不同语言词汇的统一性可能是彼此借用的结果,而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则相对封闭,很少受到另一种语言的影响。

第三,如果能从不同语言的词汇中发现共同的语音变换规则、

有规律的形式对应关系以及大量相同的屈折变化和语言结构，那么，就可以确定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拉斯克是如此明确地提出比较语言学方法论的第一人。此外，拉斯克还撰写了古北欧和古英语的最早的两部语法著作《冰岛语，即古挪威语导论》①和《盎格鲁—萨克逊语语法》。②

格里木则是当时德国最令人瞩目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于 1819 年出版的《德语语法》③被誉为日耳曼语言学的基石。在呈现日耳曼语言发展史的过程中，他对日耳曼语言的语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和细致的阐释。在当时学界还没有确定的字母与语音区别性概念的时候，他强调字母与语音的本质区别，以及语音在历史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他首先发现了在日耳曼语族；诸如英语、德语、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等等和印欧语系其他语族语言；诸如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吐火罗语，等等之间，存在着一般语音的对应规律，比方，f 与 p，k 与 h，p 与 b，t 与 d，等等。请看下列对照表：

英语	德语	拉丁语	西班牙语	
fish	Fisch	piscis	pescado	（鱼）
foot	Fuβ	pēs	pie	（脚）

① R. K. Rask. *Vejledning til det islandske eller gamle nordiske sprog*. Copenhagen. 1811.

② R. K. Rask. *A Grammar of the Anglo-Saxon Tongue*. tr. by B. Thorpe. Copenhagen. 1830.

③ Jacob Grimm. *Deutsche Grammatik*. Berlin. 1819.

hound	Jagdhund	canis	caza	(猎〈狗〉)
two	Zwei	duo	dos	(二)
lip	Lippe	labium	labios	(唇)

1822 年,《德语语法》再版,格里木系统地论述了日耳曼语族与印欧语系其他语族之间辅音的一致性问题。这样,他提出了语音规律,即众所周知的"格里木定律",借助在第一音变和第二音变中的辅音变化就可以把日耳曼语族诸语言和印欧语系其他语族区分开来,同样可以对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进行有效区分。这一定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框架和支柱。格里木的成就源于他对语言悉心的观察。他有一句名言:语言科学的灵魂在于对语言的观察。而格里木定律与拉斯克的方法论又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格里木传承并发扬了拉斯克的理论。他对后人有着不可替代的昭示作用,他赋予后代学者的理念是:语音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语音不同的变化是语音在复杂变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后的学者以此为始发点,探寻音变规则和语言内在规律。事实上,格里木是语言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之人。

葆朴撰写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Uber das K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 - Sprache*, 1816),构拟某种原始语法结构,这种语法结构的逐步解体产生了印欧语系各种实际存在的语言。葆朴在他后来的著作《比较语法》(1820)中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性的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形式的起源。

洪堡是 19 世纪普通语言学问题方面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因而被语言学界奉为"普通语言学之父"。首先,他的语言理论强调

所有说话人心智中固有的语言创造力。由于语言是一种创造力(Energeia, Tätigkeit, Erzeugung),而不是一种产物(Werk, Erzeugtes),语言才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适应环境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说话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将可供他们使用的有限语言手段作无限的使用。其次,洪堡宣称说话的发音基础是人类所共有的,但语音只是语言的形式构成或语言结构(inere Sprachform——内部语言结构)的消极材料。洪堡所谓的"内部语言形式"是一种语言的语义和语法结构,表现在言语材料的各种成分、模式和规则等方面;与之相对的是每种语言所特有的"语言形式"。这一点对19世纪后期的语言学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有的学者试图将它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二分法中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中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洪堡的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推出语言类型三分法,即按照作为语法单位的词的主要结构,把语言分成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一个词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这就是孤立语;用不变的根词和不同的词序表示语法关系,而不用词尾屈折变化表示语法关系,比方汉语和萨摩亚语,等等。单个的词素组成复合词,而单个词素的形式和意义都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语法关系和词的结构是用词素的自由组合来表示的,比方土耳其语就是粘着语。通过词尾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的便是屈折语,其中词缀和词基或词根的结合十分密切,构成词语的必要部分,拉丁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语言。比方,在拉丁语中,"墙"的主格形式是 murus,所有格形式是 muri,与格形式是 muro,宾格形式是 murum,如此等等。现在看来,这样的类型分类对以后语言本质的研究产生了积极而不

可替代的作用。

19 世纪中叶,语言学界最富历史意义的人物应该是施来赫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他致力于古印欧语的重建,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语法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施来赫尔对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科学的归纳与总结,为语言种类学的独立创建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施来赫尔因此在学界被誉为集大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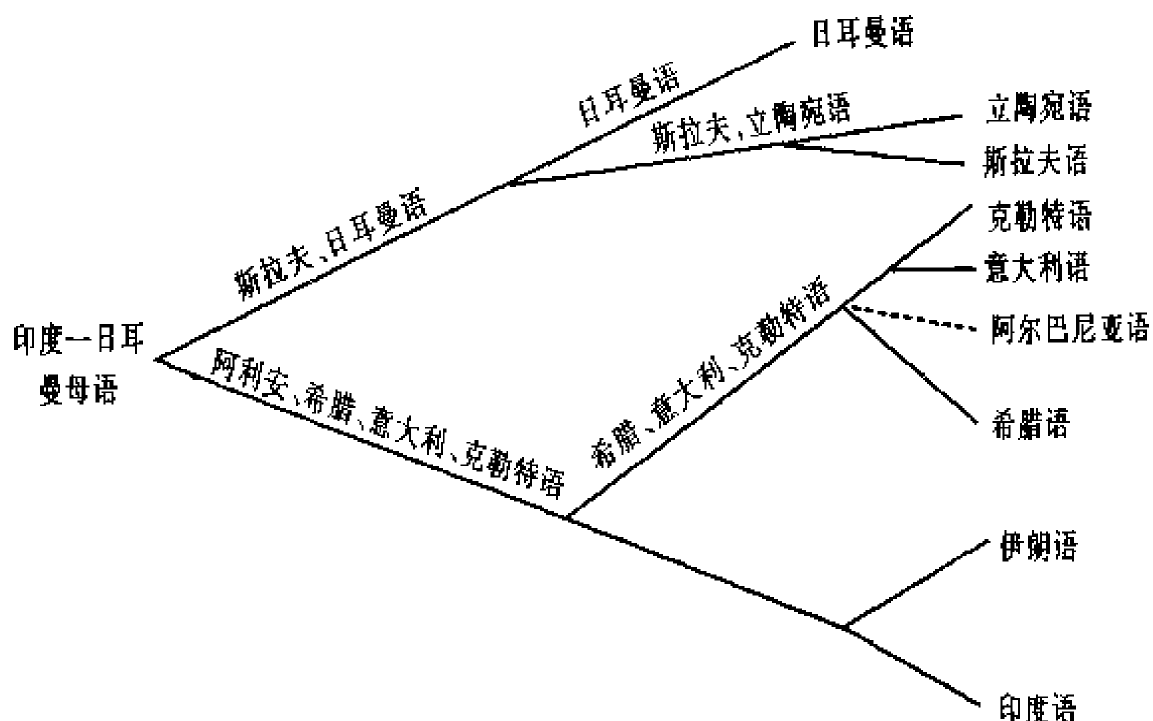
在他看来,语言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受到相同的功能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支配,所以,可以把自然科学中所制定的精确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发展过程和分类的研究。他的语言历史理论显然受到当时盛极一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19 世纪初期的成就在于制定历史上相关的语系概念,而施来赫尔则以"谱系树模式说"(Stammbaumtheorie)确立印欧语系原始源语和已知的各种派生语言或子语言之间的关系,请看下图:

显而易见,他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观察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他把当时几乎所有已知语言按照一定的特点来进行分类,比方,语音的变化规律,词汇的一致性,等等,从谱系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语系、语族、语支的演变和历史关系。换句话说,各种语言最基本的共同规律是谱系图绘制的基础。

谱系树模式说又称施来赫尔的谱系模式,是印欧语的历史语

---

① August Schleicher. *K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 Kurzer Abriß einer Laut - und Formenlehre der indogermainischen Ursprache*. Weimar. 1861.



言学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成果。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比较语言研究都是参照或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此外，施来赫尔对洪堡所提出的三种语言类型作了修正性的界定。孤立语是语法形式对意义没有任何影响的语言；粘着语则是语言单位既包括形式又包括意义的语言，组成成分明确而稳定；屈折语就是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综合在一起，词根有自己的内部变化，而且还可以附加词缀，如前缀、后缀或中缀，等等，词缀引起意义和语法关系的变化。

施来赫尔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遭遇来自新语法学派，即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颇具冲击力的挑战。当时，新语法学派特立独行，其学说成为语言学界的主流。这一学派摒弃施来赫尔的“语言是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这一观点，而把语言看作是人类言语体系的精神产物。语音规律和类比规则是他们解释和描

述语言的两大标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活的语言。这一学派的原理及其含义激发了学者们对前人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的多维思考与研究,其研究成果渗透到普通语言学理论,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理论之中,并直接为当代的语言学家所运用,这使得当代的一些语言学家们乐在其中,他们自称:我们现在都成了新语法学家了。

新语法学派的理论要旨是:所有作为机械过程的音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不允许同一方言内有任何例外(ausnahmslose Lautgesetze),同样环境下的相同的音永远以同一的方式发展;但作为词汇或语法实体的一些特定词所据以产生的类比结构和再组合,也同样是历史和史前一切时期的语言变化的普遍成分。

这种观点早年也有学者提出过,但是,直到奥斯特霍夫(Hermann Osthoff, 1842—1907)、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9)、莱斯琴(A. Leskien, 1840—1916)、德尔布拉克(B. Delbruck, 1842—1922)、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的时代,这一理论纲领才得到正式、明确地阐述,他们欣然接受"新语法学者"作为正式的称号。

新语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因为语音变化是机械的,所以每一个语音变化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并且毫无例外。也就是说,在一个语言集团的所有的人当中,如果不分裂出新的方言,音变的方向总是一致的。受音变支配的语音在相同的关系中出现时,每个含有这样语音的词都无一例外地受音变的影响。

说得通俗一点:如果能非常精确地总结出音变发生的语音环境,就可以看出,语音变化是很有规律的。

在对语音演变的规律、形态演变的类型以及语义演变的模式

进行观察和研究之后，新语法学派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语音变化的绝对性产生于符号的任意性。[①] 既然符号是任意的，语音变化就没有理由不体现在每一个含有这个音的词语之中。音变规律没有例外，因为既然符号及其语音实现是任意的，变化就并不直接体现在符号本身，而是体现在语音上，更确切地说，体现在具体环境中的某个单音上。所有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由实际发音系统的一种变化引起的。

新语法学派关注资料以及支配资料的法则，依据生理学（在语音学范畴内）和心理学来研究语音变化和类比再组合或保守现象，他们极其讲求实际，而忽略了对洪堡提出的语言结构观点（特别是他在“内部语言形式”学说中所倡导的观点）的认识和理解。语音学和方言学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领域。

诚然，描写语音学的历史在欧洲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新语法学派着重现行的语言，并强调“不再为人所用的语言”的不足之处，比方，字母不能体现发音（即不能表音）。此外，口语方言始终是语言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由于新语法学派的理论研究，口语方言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方言研究和方言调查蓬勃兴起，方言地区分布图陆续出版。此外，新语法学派一反传统语法学派，提出只有从历史方面研究语法才合乎科学原理，而传统语法只研究语言的共时状态，而不研究历史演变，这是传统语法的根本弱点所在。

新语法学派有三大建树：

---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第一,确定语言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

第二,语言的材料数据是第一位的,理论构建是第二位的;

第三,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现存语言和方言。

新语法学派因此创立了独到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它预示着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完全的独立性。

也有学者认为新语法学派的原理并非创新,它仅仅是把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所有成果加以客观陈述而已。的确,新语法学派大量吸收公认理论,然而,他们同时又将这些理论与谬论加以区别,从而澄清了语言学所依据的原理。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贡献,正如科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任何整理工作都是可贵的贡献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确立了从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出发研究语言的方法论,这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与新语法学派在理论上针锋相对的是"新语言学派"(Neo-linguists),主要由德国和意大利学者组成,其代表人物是德国语言学家浮斯勒(Karl Vossler, 1872—1949)。他们反对"机械过程"一说,强调说话主体的语言创造力。

毋庸置疑,新语法学派所有关于语言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的论述,关于材料数据第一、理论构建第二的主张,以及重视考察当代语言和方言的做法,都得到结构主义的传承与发展。

新语法学派把比较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历史的发展,他们从现行的语言推测古代语言的字形和发音,深入研究类比,追索并分析语言的历史演变。他们的口号是:惟有研究语言历史的语言学才是真正的科学。

至此,我们便可以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概括为:语言是一个系

统，其中的成分完全是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所确定的。不仅如此，语言系统在结构上还有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的成分不但互相形成对比，而且同其他成分结合，形成更高层次的单位。从根本上说，在各个层次上，结构的原理都是相同的。

19世纪出现的一批杰出学者对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第一手语言资料，并加以有效对比，他们提出了人类语言的演变过程假说以及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理论，为以后的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可靠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学术语境必然要产生一位或一批语言科学的革命者。

第四节　索绪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反思与批判

索绪尔真正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尤其是新语法学派的训练之下成长起来的。他在理论和方法上明显受到新语法学派的启发和影响。新语法学派最重要的一部理论和方法论著作是理论家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的《语言史原理》，[①]这也是对索绪尔影响最大的名作之一。有学者认为，这部著作算得上是普通语言学的前身。[②] 语言学史家科尔纳(Konrad Koerner)在"赫尔曼·

---

① Hermann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Halle: Max Niemeyer. 1880.

② 参阅：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9页。

保罗与共时语言学”(*Toward a Historiography of Linguistic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V. 19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1978, PP73—106)一节中指出:保罗在《语言史原理》一书中的有关论述是索绪尔共时观的直接来源。保罗将语言的“一般原理科学”(allgemeine Prinzipienwissenschaft)分为两类:历史语法和描写语法。前者研究一种或数种语言在语法方面的短期变化和长期演变。后者则对在一个特定时刻某一语言集体内所通用的语法形式及关系的总和进行研究。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保罗主张优先考虑历史语法研究,在他看来,只有历史的研究才能把握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揭示语言活动的因果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索绪尔的系统观来源于葆朴的《论梵语动词的变位系统》(*Uber das K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 - Sprache*, 1816)和施来赫尔的《欧洲语言系统概观》(*Die Sprachen Europas in systematischer Ubersicht*, 1850)等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的著作。其实,语言系统观可以明确地追溯到洪堡的语言哲学著作(*Werke in Fünf Bänden. Band III,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Herausgegeben von Andeas Flitner und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洪堡指出:语言系统的每一个成分都依赖于其他成分而存在(前引版,第3页)。此外,洪堡强调系统构成成分的独立性,但他并没有像索绪尔那样把系统决然分离出来。

事实上,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尤其是新语法学派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促使索绪尔这一代学者开始思考符号问题,从而进一步思考语言形式及其功能本质等问题。索绪尔则是从以下几个方

面对历史比较语言学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请看索绪尔的陈述：

首要的错误，即一切错误的根源就是在比较语法的研究之中，而且是仅限于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之中，从不追问它所作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具有什么意义。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比较是所有历史复原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作比较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而且比较语言学家越是像博物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生长那样去考虑两种语言的发展，就越是得不出结论。以施来赫尔为例。他总是要我们从印欧语系出发，这么看来他还真像是做历史研究的。他毫不犹豫地说，希腊语的 e 和 o 是元音系统的两个"级别"(Stufen)，正是因为梵语有元音交替系统，人们才想到了级别的概念。就像同类植物彼此独立地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一样，每种语言必定分别、平行地经历了这两个级别，以此为前提，施来赫尔把希腊语中的 o 看作是 e 的加强级，同样，他把梵语中的 a 看作 ă 的加强级。事实上，这涉及到在希腊语和梵语中以不同方式显示的印欧语系的一种交替，它在一种或另一种语言中所展示的语法效果却毫无必然的相似之处(参阅第 179 页以次)。[1]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 页。

首先,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积累了可贵而丰富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没有得到科学的抽象,而现行的学术专门术语又没有能力对它们统一加以概念化的有效分类,索绪尔由此思考语言学的理论概念问题以及语言学的整体构架及其核心问题。

其次,在研究语言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忽略甚至误解语言的功能问题,不能区分语言中功能性的和非功能性的作用,更不能准确地从关系上来认识语言单位。那么,索绪尔认定,分析语言就是分析社会事实;语言是一种关系的系统,而社会给予这些关系以意义;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这些社会惯例的系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根本就不可能得出恰当、得体的语言描述结果。

最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是重建印欧语,与当时的自然科学一样,崇尚实证主义。但重建只能是一种假设性地推断,未必能够被证明是现实。索绪尔并没有否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术价值,只是发现,他们重视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却将共时的研究排斥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外;他们忙于对孤立事件进行细致入微的解释,以"实体"为研究核心,忽略了语言现象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结构本质,没有触及语言及其形式的本质问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盛名之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表现得有些软弱、无力,因为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支柱性理论。此外,对诸如语言究竟是什么,语言究竟是怎样运作的,等等本质问题,历史比较语言学都无从作答。索绪尔的观点是:只有从考据中超拔出来,语言学的总课题才有可能成立。这一观点触发了索绪尔超越具体语言和语言亲属关系,对语言学研究范围进行重新指认。

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索绪尔真正是特立独行的离经叛道者。

尽管索绪尔深受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但是，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事实上，他只是重新提起18世纪语言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传统语言学关注语言共时态研究表示认同。然而，他的思考更深刻，表述更明确，研究更系统。比方，他提出语言研究不能仅仅像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以考证获得的书面语为分析对象，还应该切实注重活的语言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对语言采取原子主义的态度，而且还应该以宏大的视阈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或系统；语言不仅仅是演变的过程，而且还是一种状态；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的价值不是由语言要素本身来体现的，而是由同时存在的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来体现，因此，语言共时态事实与语言历时态事实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他运用科学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吸收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新的水平上，以新的方法，即自然科学中结构主义的方法重新阐述语言学原理，从而超越一些原始的语言学概念或自然的传统观念，推出一种普遍的结构和纲领。索绪尔极富创见地将语言和思维的联系分开，专门研究语言本身的问题，最为了不起的是，这种从结构上专门研究语言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是整个现代语言学的思想基础，是语言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依据。索绪尔精彩的哲学思辨在二元对立中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索绪尔之前，语言学是幽远而深重的，因为它始终有历史的考证伴随左右。索绪尔则打开了新的视窗，让人们看到大片的绿地——静态的世界。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者们突然发现，语言学

的空间原来是这样的广阔!

此外,近百年来索绪尔的语言学术语日久弥新,而无数其他学科术语则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第五节 索绪尔与前人相关观点及话语比较

索绪尔	潘尼尼
语言和言语是言语体系的两个方面。言语是指个人说话的行为,是个性化的,是显性的,也是暂时的,所以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言语事实。但是它不是纯粹的创新,因为言语的无限多样性都是由相同符号的反复出现组成的。这种相同符号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是具象的,而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制度,从而抽象化为语言,语言是有规律、有制度的语言事实,它是潜性的,是一种集体的契约,是社会化的制度。(参阅: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10—19页,第	语言中应有外显即时表达(dhvani)和内隐永久实体(sphota)。(Pā ṇini)(《八章书》,A ṣṭādhyāyī,出处详见本章后"观点及话语出处")

86页以次)

哈里斯

在词语中,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词语与其他一切区分开来的声音差别,因为负载意义的恰恰是声音的差别。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第130页)

语言是连在一起的有意义的语音系统。
(*Hermes: o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P6)

亚里士多德

语言的符号并不因其以心理性为主而成为抽象的概念;由集体同意而认可的种种联结都是存在于大脑之中的实体,而且这种种联结的整体构成了语言。此外,可以说,这些语言符号都是有形的;文字可以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之中,……
(前引版,第16页)

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知识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1990年,第49页,16a 3—9)

把一个简单的辞项看作是某种声音和某种概念的结合,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觉。这样界定,它将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人们以为可以从这些辞项入手,把它们积累起来,便可构成系统。而与此相反,只有从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才能够通过分析获得整体中所包容的要素。

(前引版,第126页)

名词是因约定俗成而具有了某种意义,它是与时间无关的有意义的声音,名词的任何部分一旦与整体分离,便不再表示什么意义。

(前引版,1990:49,16a 20—24)

应该立即用自然的声音替代人工的符号;但是,只要人们还没有研究语言的声音,这一点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脱离了书写符号,语言的声音就仅仅只代表模糊的概念,而且人们还倾向于文字的支持,即便这只是欺人之举。早先的语言学家对发音生理学一无所知,他们不时落入圈套;一旦抛开字母,那他们就不知所措了;而对于我们来说,这却是走向

句子是一连串有意义的声音,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其独立的意思,但只是作为表达,而不是作为肯定命题或否定命题。我的意思是说,比如"人"表示某事物,但它并不表示人是否存在。但如若增加某些成分,它就会成为肯定命题或否定命题的一个部分。"人"的单个音节根本不能表示任何东西,如mus(老鼠)一词中的us就不能表示任何东西,它只是

真实的第一步；因为正是对声音本身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所寻求的帮助。现代的语言学家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重新利用他人（生理学家、歌唱理论家，等等）开创的研究，使语言学拥有一门能够让它摆脱书写词语的辅助性科学。
（前引版，第36页）

一种声音。而在复合词里，音节就具有某种意义，但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它自身并不是独立的。
（前引版，1990：51—52，16b 26—33）

人们发出的音节是耳朵能够接受到的音响印象，而声音则是依赖于发音器官而存在的，像一个 n 的音只因为有这两个方面的对应而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将语音归结为声音，也不能将声音与口腔发音分开；反之亦然，如果我们不考虑音响印象也就不能确定发音器官的运动。
（前引版，第9页）

"声音"与"声响"互不相同，而"言语"则是它们之外的第三种东西。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四卷，1996：135，535a 29—30）

……无论怎样，发音必须就要有内破裂音和破裂发音的

音节是由哑音和具有声音的字母结合而成的、没有意义

接续交替,而这正是分音节的基本条件。
(前引版,第 67 页)

的语音。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1994 年,第 671 页,1456a 35—37)

胎生的四足动物能发出另外一种声音,但没有言语能力。实际上,言语惟独属于人类;凡能言语者自能发出声音,而能发出声音者却未必全都能言语。那些生来耳聋者必定全都是哑巴;他们确实可以发出声音,但根本不能进行言谈。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四卷,1996: 137—138, 536a 33—536b 1—3)

赫尔德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前引版,第 135 页)

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内容;确切地说,语言不仅仅是内容,而且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形式。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

ten, P91)

我们因此可以设想一门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符号生命的科学;它会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我们称之为符号学(sémiologie, 来自希腊语sēmeion〈符号〉)。它让我们了解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由什么规律支配的。
(前引版,第 17 页)

应当建立一门符号学(Semiotik),以便通过语言来诠释人类心灵的隐秘。
(Ibid. ,P102)

伐特

……将来语言学发现的规律可以用于语言学,这样,语言学就将是属于整个人文事实中完全确定的一个领域了。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各门学科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位置,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将它归入到符号学范畴。
(前引版,第 18 页)

关于符号问题,应用逻辑学在它的一门分支(符号学,也即有关符号的学说)里面作了一般性的探讨,这类探讨的结果也应该适用于作为符号的语声,……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lehre*, P140)

语言是一个通过言语实践而贮藏于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宝库,是一个潜存于每个大脑之中的语法体系,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潜存于一群人大脑中的语法体系,因为语言在任何一个大脑中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群体中才得以完整存在。

(前引版,第 15 页)

语言是用于表达全部思想的指义声音的总和,是传达手段的总和;说话行为即传达,也是指称和叙述。

(Ibid., P136)

本哈迪

音节比构成音节的音更为直接地呈现出来。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原始文字已标注有音节单位;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了字母体系。

(前引版,第 55 页)

语言是用来表达观念的分节音所构成的整体。

(*Sprachlehre. I Reine Sprachlehre*, P1)

时间确保着语言的延续性,它还有另一种效果,这种效果从表面上看来与前者相矛盾:即让语言的符号或快或慢

语言源于智能,在时间中演变,直至形成。

(Ibid., P4)

地发生改变的效果，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可以同时谈论符号的不可变性和可变性。
(前引版，第 83 页)

言语体系既有稳定的制度，又有发展变化。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法规，是往昔的产物。
(前引版，第 10 页)

语言在此处是一种变化，在彼处则是一个系统。
(Ibid., P11)

达尔文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任何共时事实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它们没有任何强制的性质；相反，历时事实则规定语言，且不具有任何一般性。

一句话，而且这正是我们想要得出的结论，两个范畴的事物都不受上文所界定的规律的支配，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谈论语言的规律的话，语言规律

语言是自然有机体，其产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语言根据确定的规律成长起来，不断发展，逐渐衰老，最终走向死亡。我们通常所称的"生命"的一系列现象，也见于语言之中。
(*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P7)

这一术语将因运用范畴的不同而包含完全不同的意义。
(前引版,第 105 页)

施坦塔尔

言语体系的研究因而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主要的部分,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且依赖于个体;这种研究是纯粹心理的;另一个是次要的部分,以言语体系的个人方面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言语,其中包括发音,它是心理—物理的。
(前引版,第 21 页)

语言本质上属于精神,是一种精神产物。
(*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P379)

洪堡

语言是一个系统,可以而且应该从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对其所有组成部分加以考虑。
(前引版,第 96 页)

每一个成分都依赖于其他成分而存在,所有成分都依赖于一种通贯整体的力量而存在。
(*Werke in Fünf Bänden*.

Band III, *Schriften zur Sprach philosophie*, P3)

既然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所有的辞项都有连带关系,而其中一个辞项的价值只不过就是另一个辞项同时存在的结果。
(前引版,第127页)

语言中没有任何零散的东西,它的每一要素都只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Ibid., P10)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
(前引版,第136页)

每个具体的音都是根据它与其他音的关系而构成的。
(Ibid., P442)

一方面,语言既处于社会大众之中,又处于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作任何的改变。而另一方面,符号的任意性从理论上带动了在声音物质和观念之间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度。结果,这两个结合在符号中的要素以绝无仅有的程度保持着各自固有的活力,而且语言在所有能够触及到声音或意义的

人类语言一方面具有统一性,另一方又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Ibid., P5)

因素影响下改变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着。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幸免。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总是能够指认明显的转移。
(前引版,第 85 页)

语言的规则和要素是有限的,运用规则和要素进行的创造则是无限的,等等。
(Ibid., P11)

格里木

所有与语言学静态方面相关的都是共时的,所有与演变相关的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史态分别指称语言的一种状态和演变的一个阶段。
(前引版,第 90 页)

语言研究同时也是历史研究,越是往我们民族历史的远古时期追溯,就越是需要并且只能依靠语言来提供佐证。
(*Kleinere Schriften*, P574)

惠特尼

符号施指和符号受指之间

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词与

的联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用符号是想指认从符号施指到符号受指的联合所产生的整体，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前引版，第76页）

我们确信，与作为系统的语言有关的一切都要求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即限制任意性几乎没有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达是再好不过的基础。事实上，整个语言的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荒谬的原则为基础的，这一原则不加限制地使用，终将导致极度的复杂性；但是，我们的头脑成功地将序列原则和规律性原则介入到符号整体的某些部分之中，这正是相对可论证性的作用。如果语言机制是完全合理的，人们便可以就其本身来加以研究；但是，由于它只是对原本毫无秩序的系统的

观念之间都不存在任何内在、根本的关联。人的交际手段和其他动物的传达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本能的，而前者则是任意的、约定的。只消举出一个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对象客体而言，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个名称。甚至在拟声或模仿成分最为明显的情况下，如cuckoo（布谷鸟）这个词，除了方便之外，其中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存在着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这种必然性应该同样可以推及到其他的动物和声音，乃至所有的语言。事实上，在其他情况下，人们是用完全不同的名称来表达这些观念的。

（*Language and Language Study*, New York, 1867, P282）

一种局部修正,所以,在研究这种限制任意性的机制时,人们采取由语言本质所规定的观点。

(前引版,第 148 页)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从古至今,学者们所思考和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亚里士多德曾经对语言或符号的问题作过一番严肃的思考,就否认索绪尔的符号观;我们同样不能因为马萨瑞克(Tomas G. Masaryk, 1850—1937)最先提出共时研究方法的概念、洪堡有关于共时研究的精彩思辨,就轻视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作为有机构成的共时观;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最早认识到“相等关系”问题,就否定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开创的更为广泛的语言哲学研究一样。毕竟,出发点不同,终极目标不同,观念所依托的语境不同,导致的学术理念和研究结论就迥然有别。

通过索绪尔与前人相关观点及话语比较,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发点不同,视角不同,学术结论就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索绪尔是思想界、语言学界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对前人的传承不是绝对线性的,更不是功能上的并行,而是垄断性的创新;

第三,是索绪尔将学者们关注的语言、符号、关系等问题纳人

语言科学体系,并使它们成为语言学中具有严格区别意义的有机部分。

• **观点及话语出处:**

1. Bernhardi, August Ferdinand. 1801. *Sprachlehre. I. Reine Sprachlehre; II Angewandte Sprachlehre*. Berlin.

2. Bernhardi, August Ferdinand. 1805. *Sprachlehre*. Hildesheim.

3. Humboldt, Wilhelm von. 1963. *Werke in Fünf Bänden. Band III,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Herausgegeben von Andeas Flitner und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4. Heintel, Erich (Hrsg.). 1964.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5. Müllenhoff, Karl/Ippel, Eduard (Hrsg.). 1864—1890. *Jacob Grimm. Kleinere Schriften*. Bde. 1—8. Berlin.

6. Steinthal, Heymann. 1855. *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Ihre Prinzipi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einander. Berlin.

7. Schleicher, August. 1873(1863). *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Weimar: Hermann Böehlau.

8. Vater, Johann Severin. 1801.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lehre*. Halle: Max Niemeyer.

9.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0 年版。

10.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11.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1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第四章　索绪尔语言观：原始生态与现代形态

第一节　概述

索绪尔的哲学堪称现代语言学的灵魂，它最为突出的品格就是不断包容思想创新、繁衍分支理论。它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已经内化到现实的语言体系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之中，已经而且将继续全方位地深刻影响与人类须臾不可分离的语言本质的精神、语言研究的方法，这恰恰又是它存在的理由，是它的不朽生命力所在。

然而，在语言学界，总有一些研究者趋于急功近利，他们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者拒斥总体背景知识和索绪尔理论的内在文本学理，似乎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认真、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索绪尔的著作，如此这般，他们显然就难以完整地领悟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而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一种令人遗憾的结果，即对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停留在道听途说的简单化的理解或教条化的分析之上，歧解《普通语言学教程》。由于偏离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根本精神，我们不时能听到有人在学界表示出危机与恐慌，尽管这

危机是无根性的,尽管这恐慌是无理性的。我们甚至常常听到有人呼吁索绪尔已经过时了,声称索绪尔给现代语言学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及严重后果只能留在20世纪,决不能让它进入21世纪。必须要超越或摆脱索绪尔,否则21世纪的语言学仍将是千疮百孔,不能脱离"人文其外、理学其中的畸形"学科的命运。而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这其实都是无源求水、无本求末、无的放矢。

我们的确是应当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进程来不断地实施超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在没有充分理解索绪尔哲学思想之时提出超越或摆脱索绪尔。所以,恰恰相反,在索绪尔的语言观时常被不自觉地割裂成条条块块之时,在索绪尔原本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各理论概念之间的界限被绝对地硬化之时,如果我们必须要超越或摆脱,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确必须要被封存的、必须要被超越的、乃至必须要被摆脱的究竟为何物,从而革除对于索绪尔语言哲学的错误解释和肤浅解读。

解析索绪尔有两个方法论上的基本向度:一方面,回溯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原始生态;另一方面,确立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当代形态。前者是解悟索绪尔语言观的基本保证,后者则是索绪尔理论获得当代社会文化的基础;前者与后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们所依托的是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科学背景。这两个基本向度是我们客观、合理、真实地认识索绪尔并使之获得最充分和最广泛的时代性思想内容的根本。这两个基本向度有区别,但在实际方法论的运作过程中,它们彼此依存,相辅相成。我提出"解析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的理论命题,一方面旨在消除传统解释框架对索绪尔文本僵化的预设性强制,从而使之成

为开放性文本;另一方面,旨在充分彰现索绪尔理论的原初背景,从而实现解读与本真理论的整合。无论是形而上的肤浅的给定性认识还是形而下的琐碎的无定性解读,对索绪尔文本无疑都强加了亵渎性的扭曲,我们对此要实施一种彻底的反动。我们要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学习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踏踏实实地阅读索绪尔的文本,以期读通、读懂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思想体系。现在,我们的视野因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获得了很大的拓展,研究的范式也因此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更新,可是,从构建索绪尔语言哲学完整形态的视角来看,还有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的差距。

总之,本章各节必须在索绪尔共时态语境的照耀下,在当代科学文化背景的映衬下,探寻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内在统一的脉络意义。通过对《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索绪尔学派新文献》(1959)以及《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1993)等主导性文本的本真认知,追索文本与语境逐渐积淀并形成思想体系的深层结构和本质内涵,为索绪尔语言哲学理论研究奠定全新的思考起点和创新依托。

第二节　言语体系中的语言和言语

在索绪尔语言观的成长时代,历史比较语言学成果颇丰,声势浩大,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之中,天性敏锐、思想严谨、态度冷静、训练有素的索绪尔发现了当时语言学的致命弱点:语言学研究对象杂芜、观照范围混沌、普通理论匮乏。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对象问题必须要得到明确的指认,否则,语言学永远也摆脱不了依附于

其他学科的状态。《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应当在言语体系这个人类全部语言表现形式的内部区分语言和言语。在索绪尔看来,这是首要的,是创立言语体系理论的"第一个岔路口"。[1]

索绪尔提出,在言语体系内部,与言语剥离开来的语言才是"语言学既完整又具体的对象"。[2]

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全新的严格界定:

> 语言是一个通过言语实践而贮藏于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宝库,是一个潜存于每个大脑之中的语法体系,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潜存于一群人大脑中的语法体系,因为语言在任何一个大脑中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群体中才得以完整存在。
>
> 言语则相反,它是个人意志和智力行为,从中作如下区分为宜:(1)说话主体藉以利用语言规则以表达他个人思想的手段;(2)使他能够显示出这些手段的心理-物理机制。[3]

有关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功能和意义,我们在《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中可以找到非常清晰的论辩: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15页。

这样将语言从言语体系官能中剥离出来,我们便发现可以给语言冠以"产品"之名,它是"社会产品",是从声音器官活动这一永久行为中超拔出来的。我们可以用某种非常合理的方式来再现这一产品——可以说是让语言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想一想是什么潜存于一群人(同属一个社会集团)的大脑中,甚至他们的睡眠之中。我们可以说,这些头脑个个都贮藏了所谓语言这个产品。我们可以说,研究对象即沉积于每一个大脑中的宝库,而这个宝库在任何单个的大脑中或许都不会是绝对完备的。可以说,言语体系总是通过某种语言来彰显的,没有语言,便没有言语体系的存在。语言则完全独立于个人,它不会是个人的创造,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并以集体为前提。最后,它惟一的本质特性是声音和概念的音响形象的结合。(音响形象即留给我们的印象〈潜存于大脑中的印象〉)。它(〈语言〉)并不是随时必须说出来才会显现的。[①]

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区分理论的思考是多方位、多视角的。

语言和言语是在言语体系这一总体之下的解析,这本身就决定了它们之间彼此依存的关系。所以,索绪尔强调了语言与言语的相互关系,他对黑格尔辩证哲学的传承在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中得到了富有意义的表现。

① Eisuke Komatsu & Roy Harris. (ed. & tr.). *F. de Saussur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3. PP7—8.

有关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辩证关系,索绪尔有相当精彩的思辨:

毫无疑问,这两种研究对象是彼此紧密相联的,而且还是互为前提的:言语要能让人理解并产生它的所有效果,那语言则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创建语言,言语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上来看,言语事实总是领先的。倘若人们不是首先在言语行为中意外发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结合,人们又怎么能够想到这种结合呢?另外,由于听到了别人说话,我们才学会了自己的本国语;它要在数次的感受之后才能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之中。最后,是言语推进了语言:是听到别人说话时所获得的印象改变了我们的语言习惯。语言和言语因而是彼此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①

由此可见,索绪尔从来就没有把语言和言语作为两个独立而不可调和的领域。事实上,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使当时的以及以后的语言学从根本上得到了合理而科学的修正。那么,索绪尔为什么要在言语体系的总体之中分析出语言和言语呢?我的理解是,只有在言语体系中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才有可能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也就是说,这一区分是索绪尔构建的语言学理论一系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列原则与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它既是索绪尔理论完善的前提条件,又是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索绪尔在言语体系内部区分语言和言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对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加以准确的指认。他区分语言与言语的同时就辨别了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偶然的。

现在,我们不妨从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原始生态入手,对《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施以前瞻性的追索。

在新语法学派同时代的研究者中,有不少人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呼吁:科学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一种共时的、描写的、静态的语言学作为历时的、发生学的、历史的、词源的语言学的对应。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马萨瑞克(Tomas G. Masaryk, 1850—1937)著有《具体逻辑研究:科学的分类和组织》(*Versuch einer Koncreten Logik: Klassification und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en*, 1887),他首先提出应当从功能和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学的成分。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认为: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必须先于对该对象历史的研究,因为要真正了解变化,就必须知道经历变化的是什么。持共同见解的还有波兰语言学者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瑞典语专家阿道夫·诺伦(Adolf Noreen)、瑞士语言哲学家安东·马蒂(Anton Marty),而这其中,只有索绪尔最为充分地、系统地从功能和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更为了不起的是,索绪尔论证:只有在分析了研究的对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研究语言学的历史。他的论断实际上是宣告从前语言学作为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语言学

的非科学性,因为从前的语言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社会环境中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过程中的语言问题,主要采用实证主义和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结果,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语言的碎片(disiecta membra),是文化中具体的语言现象,而不是语言本身。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将语言作为整体来进行一般性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索绪尔的确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扬弃者。但是,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伟大时代伟大思想的伟大实践者。

请看索绪尔的陈述:

> 其他的科学都是在既定对象的基础上进行的,然后再从不同的观点加以观察。而我们的领域,没有一点诸如此类的特征。有人发法语词 nu(裸体的)的音,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也会试图从中看出一个具体的语言学对象,可是对它更加认真的观察会使人们先后从中找到三、四个决然不同的事实:它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一个思想观念的表达,还可以是一个跟拉丁语 nūdum 相对应的词语,如此等等,这要看人们对它进行观察的方法了。不但对象不是先于观点,而且还会有人说是观点创造了对象,再者,对所谈事实进行观察的种种方法,哪一种是首选的、优越的,我们事先根本无从预言。①

索绪尔开始追寻语言学的对象。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现代理性主义之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有一句学界尽人皆知的名言:把我们研究的难题尽可能地按照需要的那样进行分解,以便更好地加以解决。巴黎文学院比较语法教授亨利(Victor Henry, 1850—1907)在《语言的悖论》(Antinomies Linguistiques, 1896)一书中对笛卡儿的话语推崇备至,而亨利对语言矛盾性的发问、对语言不完善性的思考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可以说,索绪尔在接受了亨利式思辨的同时也接受了笛卡儿的方法论。索绪尔就是通过分解来解决语言学的对象问题的。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接受笛卡儿思想的,不止索绪尔一个人。

比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 Baudoin de Courtenay, 1845—1929)早就已经奉行笛卡儿的分解论了,他于1870年就在《语言学与语言综述》(Some General Remarks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中提出:作为一切语言总合的人类语言应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汇集了所有个人特征的语言,它是潜在的;另一类是人们相互之间交往的语言,它是显在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没有对自己具有独到创见的哲学性观念进行深入、系统的阐述,因而他的思想,尽管深刻,却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只沦落为缺乏学术魅力的一般性话语。索绪尔则不同,他传承分解论,并对自己的语言学分解思想进行准确的界说、深刻的论证、系统的阐述,这样,他的理论当然最引人瞩目、最令人信服,最有可发扬、光大的基础。

在《费迪南·德·索绪尔研究集刊》(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第12期(1954)上,索绪尔有这样一段具有相当冲击力的

言说:我不赞成任何人不作任何界定就来建立一套理论,尽管从前的学者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没有任何的异议。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就提出:语言(Sprache)这个词应当包含两种关联意义:一种是人类的语言(die Sprache),另一种是具体的、个别的、民族的语言(die Sprachen)。人类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而相对于人类语言或民族语言,个人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则是个别的,个人对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人类语言本质的表现,也是民族语言本质的表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时代的辩证之风深刻地影响了洪堡的哲学观,洪堡因此对语言作出了积极而辩证的解释。洪堡天才地构想了两种语言科学,一种是以人类的语言为对象的语言科学,即普通语言学,另一种是以个别、具体语言为对象的语言科学。然而,这位普通语言学之父却没有能够建立独立的语言学理论。在我看来,这里存在着两个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洪堡有超前的普通语言学的理念,对语言学有哲学上的宏观掌控,然而,他的思路或方法论是滞后的,他认为只有充分的具体语言研究,才足以建立普通语言学理论。他终究没有能够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具体的语言研究中超拔出来。这多少让人有点儿遗憾。另一方面,洪堡的出发点是民族精神,他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本性,无论是民族语言还是个人语言运用,在洪堡的思想里,那些都是人类本质的表现,他思考语言的问题,但语言只作为现象,而不是本质。所以,他总是将语言放置在民族文化语境中加以观察的,他是

要通过对语言现象的思辨达到对人类精神本质的认识。

索绪尔则不同,他将前人强加于语言乃致遮蔽语言的人文因素以及其他附着物全部排除在语言学之外,并为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系寻得了最得体的方法论上的依托。

在分析的过程中,索绪尔从异质里发现了同质——语言,并将其确定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研究语言内部结构成了以后结构主义的首要原则。

请看索绪尔关于语言特征的概括:

(1)它是言语体系事实不规则整体中的一个完全确定的对象。我们可以将它定位在交流中听觉形象与概念相结合的一定的部分。它是言语体系的社会部分,是个体以外的事物。单独的个体既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语言只是依照在社会集团成员中普遍接受的规约而存在。另一方面,个体需要经过一个见习的过程才能熟悉语言的规则;儿童则只有逐步地对它加以掌握。它是一个极其明确的事物,即便是一个丧失言语使用能力的人,只要他能听懂声音符号,他也能维持语言。

(2)语言与言语不同,它是人们能够加以分别研究的一个对象。我们不再说死亡的语言,但是我们能够彻底地掌握它们的语言组织。语言科学不仅可以不考虑言语体系其他要素,而且也只有当其他要素不予介入时,这门科学才有可能存在。

(3)言语体系是异质的,而如此规定下来的语言则是同质

的:它是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最为重要;在这个系统中,符号的两个方面都是心理的。

(4)和言语一样,语言也是一个具体性质的对象,这对研究极为有利。语言的符号并不因其以心理性为主而成为抽象的概念;由集体同意而认可的种种联结都是存在于大脑之中的实体,而且这种种联结的整体构成了语言。

……①

语言的心理观是由来已久的学界的共识,而语言的社会观则是见仁见智的了。

与同时代的杰出学者,诸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等等一样,索绪尔并不认为语言是由语音构成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总和,也不仅仅是精神的偶然表现,它是实体,而且是第一性的。倘若要研究人的行为,就必须承认社会这个实体的存在。是社会这个实体使个人的行为成为可能。而从社会中产生的个人行为必须要通过社会来解释。但是,只有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更加深刻地论证了这一观点:发出的声音本身不是社会现象,但说出的一个话语却是社会现象。能产生这个社会现象的原因是人与人之间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惯例规则系统,即语言。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此外,语音只是思想的工具,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不具备任何独立存在的价值。语音不构成语言,一如思想不构成语言。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组声音或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都不是语言。语言具有社会本质。

而当时学界的主导潮流是个性主义,认为个人的语言是惟一的语言现实,社会的语言是学者的抽象,没有现实的存在,不具备实在性。执此观点的有目光敏锐的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1838—1917),有波兰语言学者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等等。实证主义者拒绝指认孤立的个人语言事实之外的任何事实,在这种强势理念之下,索绪尔仍然顽强地申说自己的语言观,提出言语体系内部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即语言是一套社会惯例规约,是某一社会强制性规范的系统。

客观地说,最先强调语言社会学因素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多次谈到的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惠特尼出生耶鲁大学,是梵语和比较语言学教授,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将语言与其他社会惯例联系起来并加以卓有成效的研究。惠特尼把语言看作是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的一种社会制度。他认为人类利用发音器官作为语言工具,只是出于方便。尽管索绪尔认为惠特尼的这一断言有过于绝对之谬,但是仍然充分地肯定了他的基本观点,并坦言自己从惠特尼的《言语体系的生命》(La Vie du Langage, 1875)中获得了激励。惠特尼强调语言的惯例性是建立在社会常规之上的,但是,他坚持语言学必须是历史的科学,它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语言发生学的问题。现在看来,索绪尔之所以能够从一批杰出的同代人中脱颖而出,其根本就

在于他的出发点:他要寻找语言研究的确切对象,而这个对象必须是惟一的。他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

另外,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与索绪尔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不仅是社会学的创始人,还是法国语言学派的精神领袖。当时的涂尔干与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 1843—1904)之间有一场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前者强调社会意识,后者强调个人意识。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社会学是领袖的科学。涂尔干提出把社会科学范畴之内的所有学科都纳入社会学的范畴,并对诸如"社会事实"等一系列的社会学概念作了学理上的界定。塔尔德则公开声称:我的观点是,社会学特别容易用来解释语言和语言结构的变化。几乎与此同时,索绪尔主张在社会事实中指认语言,他提出:"言语体系是社会事实。"[1] 这究竟是索绪尔汲取了涂尔干和塔尔德的社会学思想呢,还是他们作为同时代的人共同地继承了法国社会学鼻祖、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75)的思想呢?

还是让我们先来对他们的原则进行一番对照:

涂尔干	索绪尔
社会事实是在个人之外的,它对于个人具有一种外部制约力。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存	语言是个体以外的事物,它依照在社会集团成员中普遍接受的规约而具有普遍意义。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在。

社会事实是个人的集合,是通过个人而表现出来的;但是社会事实的基础是社会,不是个人;个人是间断的,社会是延续的。	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且依赖于个体。语言以许许多多的储存在每一个大脑中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合之中。言语中没有集合,它的表现是个人的,暂时的。
社会事实包含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第一性的,社会存在则是第二性的。(Emile Durkheim. *Methodology of Sociology*. P7, P42, P77.)[①]	言语体系包含语言和言语。语言是第一性的,言语是第二性的。(前引版:第16、21、90页)

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涂尔干、塔尔德、索绪尔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学人拥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索绪尔在传承前人、与同时代人共同思考的过程中构建了他全新的语言与言语区分理论体系。

最能体现索绪尔语言社会本质论的话语是:

---

① Emile Durkheim. *Methodology of Sociology*. London: Allen & Unwin. 1895.

语言“既是言语体系官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主体为了让个人能够运用这一官能而采用的必要规约的总和。”[1]

我们可以提供以下例证来加以阐释:

以中国社会集团为例,只有当个体成员运用语言规约,诸如词、词语、词序、音位、音调,等等方面的一组规约,他才能够实现语言能力。比方:

(1) 颜色很好记。

试比较:

果然很好记。(词性,词序)

贝贝很好奇。(音位,音调)

米饭很好吃。(词语,词序、音位、音调)

钥匙很好开。(音位、音调)

贝贝很好笑。(词语,音位、音调)

词语的属性与词序是一种社会惯例规约,音位与音调同样也是。

而在形态较为丰满的拉丁语族语言或日耳曼语族语言中,个体得以运用的语言规约则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先后以法语、英语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为例:

(1) La femme professeur aime beaucoup les enfants.

(这位女教师很喜欢这些孩子。)

试比较:

La femme professeur aima beaucoup les enfants.(音位,词法,句法)

(这位女教师曾经很喜欢这些孩子。)

Les enfants aiment beaucoup la femme professeur.(词序,音位,词法,句法)

(孩子们很喜欢这位女教师。)

(2) This is easy to remember.

(这很容易记住。)

试比较:

These are easy to remember.(词法,音位)

(这些很容易记住。)

It is easy to remember these.(词序,句法,音位)

(记住这些很容易。)

这里,有词序价值规约的比较,有句法价值规约的比较,也有音值价值规约的比较。而这些比较的基础正是社会惯例规约。

那么,后人对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通常是怎样诠释的呢?

在中国传播、研究索绪尔的第一人当属方光焘先生(1898—

1964)。他曾留学法国,师从索绪尔的学生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和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és, 1875—1960),对《普通语言学教程》有很深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运用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区分理论来确定汉语语法研究对象,提出言语事实中的广义形态。他对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与言语的理论有较为权威的认识:[1]

语言:潜在的,贮藏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脑子里。

言语:显在的,把潜存于大脑中的语言表达出来。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没有潜在的,便不可能有显在的。没有显在的预定,潜在的便无作用可言。

语言与言语的特性:

1.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言语是个人行为的产物。

2. 语言有约束力,言语则是自由的。

3. 语言是记忆的映象,言语是实际的运用。

4. 语言是过去的产物,言语是当前的现实。

5. 语言与言语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是互为条件的。

6. 语言是同一的,相对稳定的;言语是多变的,缺乏同一性。

从我的研究结果来看,至少可以下四个层面来认知言语体系内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理论:

---

① 参见: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39—541页。

首先,言语是指个人说话的行为,是言语器官发出一定声音与意义内容的结合,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组合活动。它是个性化的,又是暂时性的,所以,它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言语事实。但是它又不是纯粹的创新,因为言语的无限多样性都是由相同符号的反复出现组成的。这种相同符号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是具象的,而且逐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制度,从而抽象化为语言。那么,语言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的言语事实了,而是有规律、有制度的语言事实。它不是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一种行为或活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契约,是社会化的制度。

其次,语言是言语的基础,没有语言便无从谈起言语。而言语又是语言的基础,没有言语就无所谓语言。但是,语言一经产生,它就不仅仅是言语的产物了,它必然成为言语的工具,具体地存在于人们交流过程的言语之中。同时,它还反作用于言语,成为言语所必须的契约。一方面,社会集团负责将普通语言的惯例强加在个体的身上,个体从集体规范中选择,不过,语言在任何一个使用语言的个体的大脑里都不是完整的;另一个方面,个体也有个体的习惯,比方,对某些规约形式表示偏爱,因而常常反复加以使用,而对另一些规约形式表示厌恶,便极少加以使用,或者使用有悖于集团规约形式的意义。这种个体习惯也会或早或迟地以渗透的方式强加给社会集团。语言与言语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转化的可能,这样看来,言语受制于语言,语言同样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制于言语。

再者,在言语体系的内部,语言与言语真正是处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的。它们有规律地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实

现各自独有意义的过程中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便是言语体系,言语体系是言语与语言辩证与统一的表征,它因为语言和言语各自的特性和功能而具有了多样性和混杂性。用索绪尔的话来说,"言语体系既有稳定的制度,又有发展变化。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法规,是往昔的产物。"① "它形式多样,规则无定,同时横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若干领域。它既属于个人的范畴,又属于社会的范畴。"②

最后,每一个个体都是社会中的人,所体现的必定是社会意义,在社会这个大的范畴之下,无论是语言还是言语都具有社会性。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经过个人的结合而产生的,就已经是社会的了,不再是个人的了。更何况,言语是说话主体之间的现象,正如《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3页上的图画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双向的行为,言语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对言语狭义的理解是从发音到传送,而索绪尔将言语放在了更加广泛的语境之中:先发音,后传送,而接收,即听觉映象,他注意到了主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由此推断,语言与言语是言语体系内部的分析结果,两者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并存则是一种必然,他们彼此包容,互为条件。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共性中寻求个性以示区别的时候,我们便进入了第二个层面的概念分析,我们无疑会指认:语言具有社会性,言语具有个体性。不过,有必要说明,这样的指认是相对的。也就是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第11页。

说,相对于语言,言语的区别性特征是个体的,而相对于言语,语言的区别性特征是社会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

有一点值得关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以后 87 年的岁月中遭遇 20 世纪语言学界最强劲也是最无奈的批判,甚至还有来自索绪尔学生的反动。华沙的语言学者多罗车斯基(Witold Doroszewsi, 1899—1976)便是强硬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就连巴黎的梅耶、日内瓦的巴依(Charles Bally, 1865—1947)也在他的抨击对象之列。他以肤浅的经验主义哲学教条为指导,撰写了一系列的批评性论文。他的论点早已成为旗帜性的招牌,散见于各路反对索绪尔语言观的批判性文章之中。现在看来,他只不过是在用狭隘的特殊性批评宏大的普遍性。而梅耶最忠实的学生与合作者科恩(Marcel Cohen, 1884—1974)认为: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是"语言学研究并不需要的构架。"德国语言学家浮士勒(Karl Vossler, 1872—1949)崇尚唯心主义的新语文学,严格的个性主观主义促使他极力推行他根深蒂固的主张:在语言中只有个性的创造力,而不存在任何抽象结构的系统概念。瑞士语言学研究者鲁莱(E. Roulet)写道:"……这种区分所带来的结果是,言语体系的研究迅速发展,但同时产生了一个不幸的后果,它导致语言学家脱离对语言使用的研究。"[①]固守实证主义或原子主义的学者崇尚一种典型的反对观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是无谓的,没有纯粹属于个人的言语,也没

① E. Roulet. *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Descrip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Translated by C. N. Candlin. Longman. 1976. P76.

有纯粹属于社会的语言。

然而,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不可撼动的:通过区分言语体系内部的语言和言语,索绪尔最终将全球语言学界的目光集中了起来,或是赞同,或是反对,或者是褒奖,或者是贬抑。换句话说,索绪尔造就了现代语言学的多个同心圆。对索绪尔的批判不仅没有摧毁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系,反而将它映衬得更加深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价值也因此更加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事实上,我们愉快地看到,在20世纪初叶,语言学的思想因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与言语的严格界定而亢奋无比,并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语言学界的热情,活力彰显,成就激增。现在看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大洋洲,新生语言学派富有创见的贡献、现代语言学各个学科卓有成效的拓展,无一不是来自索绪尔哲学思想体系的激励。

比方,布拉格学派的杰出代表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特鲁别茨柯依(Nikolai Trubetzkoy, 1890—1938),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功能派语言学家马丁内(A. Martinet, 1908—),描写学派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还有以语言与言语区分作为研究起点的心理语言学家威尔斯(Marshall Wales),等等。不仅仅如此,更令人振奋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恩惠并不囿于现代语言学,现代思想界对它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传承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将索绪尔理论引人哲学界的是哲学家蓬蒂(M. Ponty),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拉康(Jacques Lacan, 1901—)、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 1908—　),等等。德里达在符号学的领域开拓符号及书写符号研究,[①]拉康在精神分析领域得出有益的结论:“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极其相似”,而“梦幻则拥有言语的结构”[②]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则依据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区分概念来研究人类亲属关系、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等,创建了结构人类学。他努力在混沌、零乱的现象之中寻找本质上类似于语言与言语的结构体系。受益于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不能把文化中任何一项看成独立、自足的实体,而应在各项的相互关系中确定其价值。他将语言与言语的二项对立关系卓有成效地导入结构人类学。[③]

此外,在文艺批评界,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于1957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著作《神话论》(*Mythologies*, 1957),他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理论积极、有效地运用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他的依据是: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语言的性质,语言不仅仅可以用作人类的工具,而且它还从结构上形成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内容,那么,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便可以毫无疑问地用于文化和文学研究。巴尔特将社会体系解释为准语言和言语模式系统和区分差异的关系系统。

布拉格学派则以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为依据,成功地建立了音

① 参阅:Jacque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② Jacques Lacan. *Ecrits*. Paris. 1966. P594. P267.

③ 参阅:Claude Lé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E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位学。特鲁别茨柯伊的标志性成果是《音位学原理》,[1]它被认为是运用索绪尔语言与言语区分理论来解决音位与语音问题的典范之作。它对音位学和语音学作了严格的学理界定:语音学是研究言语过程中声音的科学,而音位学是研究某种语言语音系统的科学;语音学是关于语音的纯现象的研究,往往不需要与某一种语言联系在一起,它包括言语解剖学、言语神经病学、言语病理学,以及语音的发音、分类和感知。而音位学则是关于某种语言的语音和该语言语音系统中语音的语言学功能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又在布拉格学派音位理论的基础之上推进了区别特征理论,建立了生成音系学。索绪尔的理论得到有益而积极的发展。但是,该学派更强调语言的功能和目的。结构主义发起人之一雅柯布逊是20世纪符号学家,他推进了语言功能和结构的概念,从多方面探索语言符号的功能以及语言关系的连贯性和简单性,并积极修正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和言语的个体性。他认为,语言和言语共同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

哥本哈根学派以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为研究之本,并将它发展到了极致。叶尔姆斯列夫的纲领性著作《语言理论导论》(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aeggelse, 1943)借助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这一基础理论,创建语符学的理论体系,索绪尔理论得到极端的光大和丰富。但是,该学派拒斥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论。不过,这并不影响叶尔姆斯列夫声称自己是索绪尔惟一真正的继

---

① N. S. Trubetzkoy.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T. C. L. P. Prague. 1939.

承者。

以梅耶、格拉蒙(Maurice Grammont, 1866—1946)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则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的观点,进而对语言现象加以社会的和心理的解释。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直接来源是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理论,但是,他似乎没有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的抽象概念,而是采纳了洪堡有关语言生成过程基本能力的观点,进而提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本质的,它指社会集团成员理解和生成句子的能力,是指被一个人内化了的语言规则,对这种能力的发挥和使用则是语言运用。他强调语言理论应当解释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运用,因此,语言能力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学的任务是重建个人内化语言规则的逻辑结构。乔姆斯基排斥语言运用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受制于过多的诸如心理、环境等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然而,乔姆斯基有关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关系理论与索绪尔有关语言与言语的关系理论倒显得十分相似。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运用的基础,语言运用反映语言能力,但未必是直接、确切的反映。

其实,在索绪尔以后,无论是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语用学的创立(1938),还是德国语言学家瓦恩里希(H. Weinrich)话语语言学的建构(1967),归根结底,还是以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为基础的,更确切地说,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学研究者是在努力完成索绪尔未尽的事业——言语的语言学。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是在对索绪尔所确立的语言与言语区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理论,现代语言学乃至其他学术领域的结构主义认识论研究成果真的是难以想像的。

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区分理论一直就是这样在不平静中平静地成长、发展着。

这位日内瓦大师令人折服!

第三节 共时与历时

索绪尔提出共时观与历时观并存理论之时正值学界崇尚历史研究。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历史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而语言学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新语法学派思想大师保罗(Hermann Paul, 1846—1921)的言说推崇备至,即"一切原理都是语言史的原理。"[①]根据他的观点,在历史的语言学之外,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语言的历史成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极端的历史主义倾向并不意味着保罗没有看到语言的静态性。在他看来,静态的语法描写只涉及语言事实的抽象关系,而这种非现实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显性的稳定状态和潜性的非稳定状态,很难构建科学的研究。他因此断言像语法描写这样的静态研究没有科学的依据,不具备科学的价值。他有静态的意识,却拒绝了静态观,是因为静态研究难以深入而历史研究易于把握,还是因为当时历史研究根深蒂固的科学基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

① Hermann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Halle: Max Niemeyer. 1880. P1.

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当时保罗及保罗的追随者们一致否认 19 世纪之前有真正的语言学存在。

在 19 世纪,一般的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看到了语言所固有的历时性,这种历时性贯穿了整个语言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参与发起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索绪尔透过语言的历时性,看到了与历时性处于绝对的对立面的共时性,没有共时与历时的区分便不能够建立自足的科学体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比一般学者更深刻。

按照索绪尔的推论,在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之后,语言学势必要及时作出另一项区分,即共时与历时。索绪尔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言说:

> 先是必须在语言和言语之间进行选择;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①]

索绪尔对传统语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进行了分析与批判,[②]评述不多,但很到位。针对语言本身呈现出的绝对变化状态和相对静止状态,索绪尔得出这样的一个有效结论:共时与历时不可以混为一谈,两者相互依存,但彼此又是对立的,由此产生的共时观和历时观同样也是对立的。他提出了共时与历时的相对概念,从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8 页。

② 同上,第 90—92 页。

而区分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前者是同时并存的事实,是语言的系统,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后者是先后接替的事实,是语言的变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由此必然生成两种彼此截然对立的语言学,即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前者是断代研究,后者是历代研究。前者研究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状态,也就是,语言的状态关系;后者研究语言在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前者注重同一时期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忽略时间的作用;后者则着重时间作用之下语言的演变,以时间作用为主要的因素。

关于共时与历时的不同,索绪尔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比喻:

> 在一盘国际象棋中,任何一种已定棋势都具有从以前的棋势中超拔出来的独有的特征;人们是通过一种还是另一种方式达到这种棋势的,那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旁观整盘棋事的人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关键时刻前来观战的好奇者有任何的优势:要描写这种棋势,根本不用去回想十秒钟之前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同样适用于语言,而且更能指认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根本区别。①

早在1870年,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an Baudoin de Courtenay,1845—1929)就提出应当区分语言的静态思想和动态思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想，[1]不过，他并没有像索绪尔这样把共时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有机地对应起来。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很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强调语言的外部历史与内部历史的相互作用。而索绪尔则以语言为本质核心，把静态与动态的思想介入到语言学系统研究的框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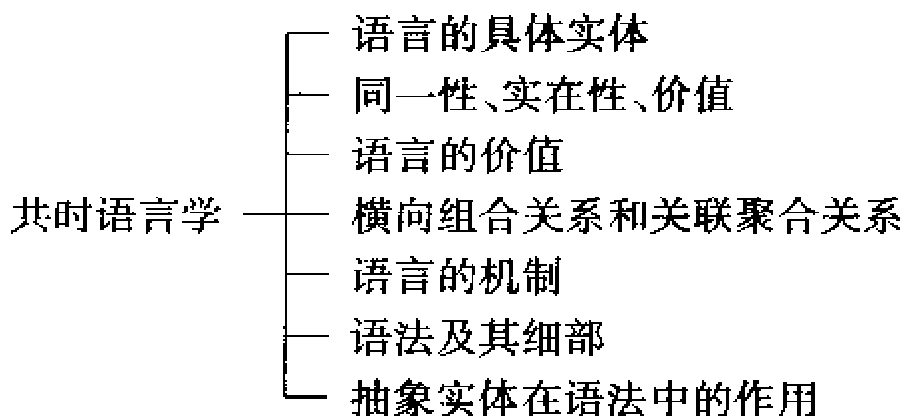
这种动与静的观念更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作为社会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和谐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他从社会有机整体的观点出发，把社会学知识体系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个范畴。前者研究社会的联系和秩序，后者研究社会的变迁和成因。

与孔德、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等等历代学者一样，索绪尔看到了静态研究的价值，同时和保罗一样，他也看到了静态研究的难度，[2] 不同的是，他知难而进，执着地坚持顺应语言事实本身的实在性——共时态和历史态交错并存，倡导以共时观和历时观来对语言进行两种观相的研究。他从一般原则入手，创立了史无前例的共时语言学研究理论体系框架：

---

① 请参阅：Edward Stankiewicz (ed.). *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索绪尔以此构建了完整的语言共时研究体系，形成了与历时语言学相对应的共时语言学的立体理论，进而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进行更为准确、严格的理论界定：

> 共时语言学研究把共存辞项联系在一起并构成系统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这些关系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能体认的。
>
> 历时语言学则相反，它研究把连续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它们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能体认的，它们相互替代，之间不致形成体系。[①]

共时语言学从语言的内部系统入手，通过对共存整体的考察，发现依共时连贯而存在的单位，即语言的状态。一改以原子主义为指导的“先部分后整体”的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如果语言学家只注意历时的背景，那么，他看到的不是语言本身，而只是一系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

共时语言学是语言学史上了不起的贡献。而其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和完备的理论构架对新语法学派狭隘的历史主义观点成功地实施了一种震荡性的反动。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的辩证思想更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指导意义。

比方,借助索绪尔的语言观,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以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为典范的历史比较语法的弊端:它利用一切可能的历史资料,并通过比较来构拟从前的语言,这些历史资料既包括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事实,又包括处于一定静止状态中的事实,也就是说,比较语法所依据的资料是没有加以明确范畴分类的杂糅。比较语法因此而失去了它应有的描述力和解释力,它的历史性成就也没有能够让它改变自己的命运——它的价值遭遇贬抑。

而当我们回溯传统语言学,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它不可否认的瑕疵,比方,传统语言学是规范性的,它的目的是要制定语言的规则,而不是指认语言事实。它对语言没有宏观上的把握,同时也缺乏微观上的体认,但是,它注重共时态的描写,而就语言静态描写和由静态描写推导出的理论而言,现在看来,它无疑造就了语言学辉煌的篇章,其学术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语言学之前人类语言学的最高成就,其中波尔－罗瓦雅尔(Port－Royal)的惟理语法可以被视作典范,它研究的操作对象就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语共时状态。

以充分、必要的理性和逻辑运作为基础,索绪尔由共时与历时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规定了语言学的对象: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系

统内部各项要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时间作用下的语言变化。这同时也是索绪尔缜密、严谨推论的目标性结果的先导:"语言学惟一、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是从语言本身也是为语言本身来考虑的语言。"[①]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共时与历时相对独立的理论基础之上,索绪尔发现语言观两个层面的不同价值:

其一,共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抽象的共时最能反映语言的自然关系;

其二,共时与历时彼此相互依存,强调共时,但不可偏废历时。

这也就是说,当索绪尔提出共时与历时的区分理论以及共时重于历时的时候,他不是要以共时取代历时,而是主张采用两种语言观来实现两种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从而完成对语言的全面把握。

索绪尔提出:"共时的方面显然胜过历时的方面"。[②]

那么,什么是这一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呢?

究其根本,语言具有双重性: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历时态是语言固有的,共时态则是语言的根本状态。共时与历时是彼此独立的,但同时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共时态承载历时态,无数共时态的链接构成历时态,也就是说,历时态辞项的不同形式都是以共时态辞项的同一性为依据的。所以,共时方面的研究是历时方面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即便作历时的描写,也无法完全抛开共时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共时态是历时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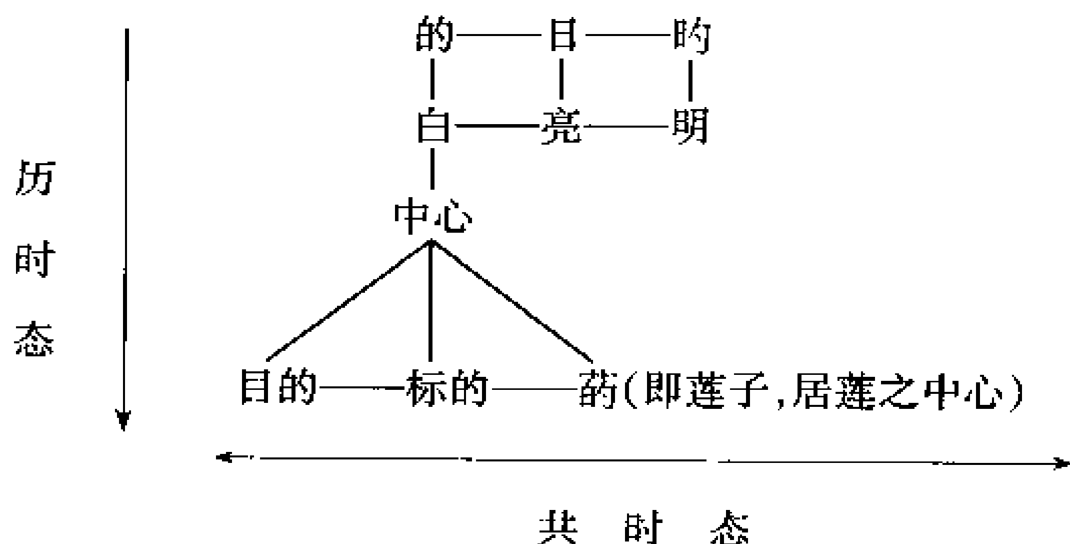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② 同上,第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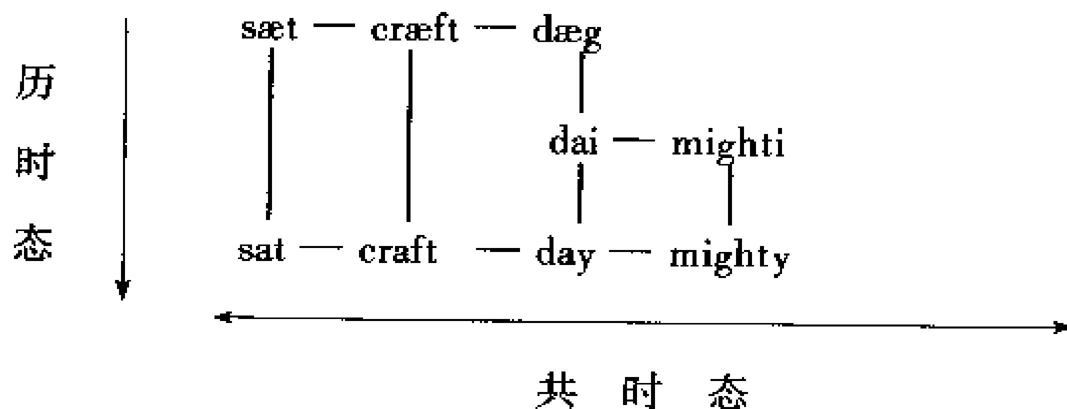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共时语言学是历时语言学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当我们作历时描写时,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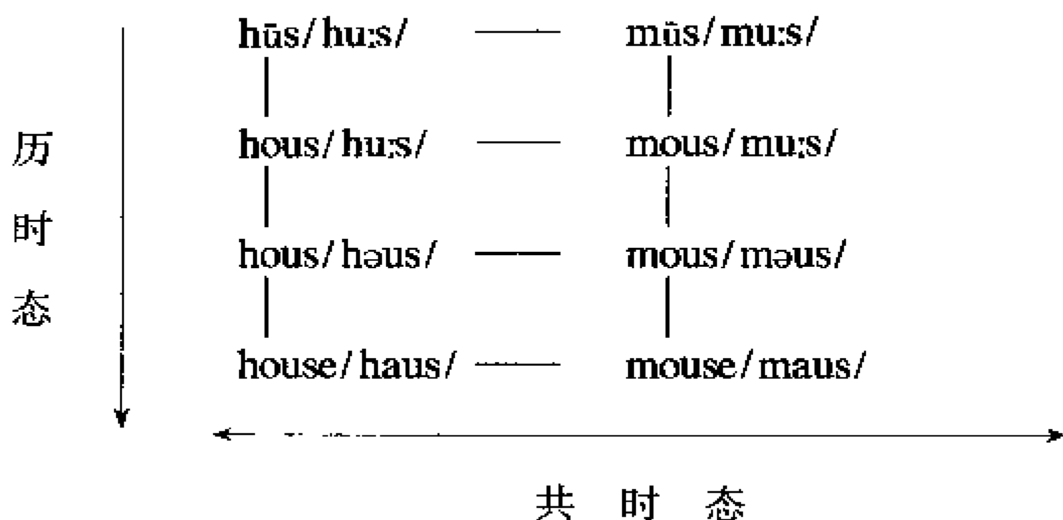
比方,汉语中"的(dì)"一词。它的历时态发展过程如下:



如果我们不是依据"的(dì)"的共时同一性,研究不同时期与"的(dì)"相对而并存的辞项,我们便不足以追溯或回溯时间的流程,解释这一辞项的源流嬗变。

另外,我们分别以 day(日,天)和 house(房子)来做进一步的考证:





索绪尔提出了共时与历时并存的理论,这无疑打破了混沌的研究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思维定式,给习惯于历史研究的语言学界带来了无可避免的阵痛。

舒哈特(Hugo Schuchardt, 1842—1927)最早向《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共时与历时理论提出挑战,他指出:索绪尔只一味研究语言共时态,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对照索绪尔的文本来看,舒哈特的批评显然是庸俗的,是片面的,也是强加于索绪尔文本的,因为索绪尔并没有以共时取代历时,恰恰相反,索绪尔对两者之间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并存事实加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的指认。怎奈舒哈特偏偏是德国、奥地利有相当影响力的语言学家,是"词与物"学派的奠基人。舒哈特一言即出,便驷马难追,拾其牙慧者众。舒哈特的追随者只顾高举他的旗帜,而没有以学者应当具备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去读一读索绪尔的文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舒哈特率先霸道地遮蔽了索绪尔共时与历时的区分理论,才致使索绪尔的共时观没有得到正常的表述和运用,共时观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也因此没有得到公正的研究。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被完全消

除。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 1919—)在《语言学当前水平》[1]一书中总结了语言学的发展现状,谈及索绪尔共时观和历时观,他有一句颇有声望的评述:人们还没有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就将它扫地出门了。

另一位挑战者是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他认为,没有理由要采取索绪尔提出的共时与历时的研究方法,在他的眼里,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语言的共时系统不可能与语言的变化分离开来。同时,共时不能简化为静态,因为共时也是动态的;历时不能简化为动态,因为历时也有静态的。共时与历时原本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有鉴于此,雅柯布逊认为索绪尔不应该割裂共时与历时。雅柯布逊认为索绪尔的理论不能够解释历经数百年或数千年而保持不变的语言要素。

所幸《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二部分"共时语言学"的第一章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针对性的得体的回答。

> 实际上,语言的状态并不是一个点,而是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突如其来的变化总量是微不足道的。那可能是10年,30年,100年,甚至更长一些。一种语言长时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而后,在几年之间遭遇巨大的转变。在同一时期共存的两种语言中,一种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另一种则可能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必然是共

---

① Charles F. Hockett. *The State of Art*. The Hague. 1968.

> 时的,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必然是历时的。绝对的状态被界定为缺乏变化,可是,由于语言无论如何总是在发生转变的,哪怕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研究语言状态,实际上就应该忽略不计那些不太重要的变化,正如数学家们在诸如对数的计算中忽略不计无穷小数一样。①

现在,西方有些语言学研究者仍然坚持认为,语言的共时系统根本不存在,俄国的符号学研究者瓦洛西诺夫(V. N. Volosinov)认为:

> 从真正客观的角度看,即完全忽略语言在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个人所呈现的状况,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在不断流变和发展的图画。如果从上面客观地观察语言,历史中并没有可以建立共时语言系统的正直时刻。②

还有更多的研究学者认为,共时与历时的区分过于绝对,会导致片面的研究方法,面片面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对语言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的,必须超越甚至抛弃这种区分。他们的理由是:

其一,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没有实际意义,任何共时态都包含历时态,反之,任何历时态都包含共时态。索绪尔的区分理论过于简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

② V. N. Volos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6.

单,也过于虚化。应传承雅柯布逊的思想,建立语言的现实主义研究。

其二,语言的共时态与历时态交错存在,语言研究只能采用泛时的观点。

这样看来似乎很有趣:传统语法崇尚共时观,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历时观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然后,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兼收并蓄,主张共时观与历时观相对而并时存在,现在,到了 20 世纪末叶,已经有更多的研究者提出泛时观,认为这是共时观与历时观有机契合的更高层次的产品。共时与历时的辩证划分被他们判定为零价值。表面看来这种线性的发展——共时—→历时—→共时 + 历时—→泛时(共时⇆历时)——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有规律可寻的必然。在索绪尔理论发展的几十年之后,语言研究者应该得以站在历史发展的理性成熟的制高点上,总结语言学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观点。而我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他们缺乏的恰恰是理性的成熟。不过,令人安慰的是,当他们声称泛时观不是共时与历时简单相加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他们的思想基础原本就是共时与历时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至于糊涂到足以把共时和历时真正看作是浑然一体之物的程度。

据说,他们的实际依据是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27—)的分层理论。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拉波夫的思想:语言系统可以分成若干分层系统,每一个分层系统内部都因一组并存规则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分层系统之间则存在着更替的关系,而每一分层内部都存在着

社会因素的变项,这种变项最终引发分层系统之间的更替。[1]

结果,索绪尔的共时观和历时观被弄得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

另一位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马丁内(André Martinet, 1908—)在客观上对泛时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著有《普通语言学原理》、[2]《语音变化的结构》[3]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时地在共时研究的范畴内介入历时因素,又不时地在历时研究的范畴内介入共时因素,对共时因素和历时因素没有加以任何语言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严格而明确的区分。

有的西方学者作出这样的推断:共时与历时具有根本的不可分性。按照他们的逻辑,因为不可分离,所以就只能采取混合为一体的泛时观。这样的结论有点生硬,但也还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至少,泛时观可以对事物作出一般性的原则概述,但是,它的价值极其有限。比方,我们生活的地球。它在不断公转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自转,如果我们因着公转与自转的不可分离性而采用"泛"的观点,那么,自转造成日夜和公转造成季节等事实在理论上就会变得模糊,只剩下"旋转"这个恒定态。当然,旋转是地球的一个运动

---

① 参阅:W. Labov.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另参阅:Harold Hodg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69.

② André Martinet. *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60.

③ André Martinet. *L'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 Berne: Francke, 1955.

规律,这一概述或规律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再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其实是空洞的,没有实际价值可言,因为仅凭这个规律,我们不足以科学地解释日月交替、四季轮回,也不足以充分地解释地球各个部位相对日照时间,而面对地球的倾斜度以及地球的形状等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个规律都会显示出学术诠释上的脆弱与无能为力。那么,在语言学领域,由泛时观总结出的一般性的原则概述能有多大的学术意义或价值,倒是值得我们去认认真真考虑的。

其实,持反对观点的研究者和索绪尔一样看到了共时与历时的不可分性,但是却不具有索绪尔的辩证思想,没有看到共时与历时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发现足以解构共时与历时混合体的有效方法。索绪尔有这样一段举足轻重的陈述:

> 务必记住这些区别,以免轻率地断言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语法,而其实我们是不断地在历时领域中研究语音的变化,在共时的领域中研究语音变化所产生的结果。①

当然,正因为索绪尔目光深邃,思维深刻,他才成为一代大师。话又说回来,不知道主张泛时观的学者有没有花一点点时间认真地阅读索绪尔有关泛时观点的一节。请看索绪尔的论述: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能不能从泛时的观点来对语言进行研究呢?

这是当然的。比方,由于语音变化不断发生,且将永远发生,一般说来,人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视作语言的恒定状态;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规律。语言学的情况和国际象棋对弈一样,在一切事物消失之后仍有规则存在。不过,这里都是些独立于具体事实而存在的一般原则;一旦谈到特别而明确的事实,便没有什么泛时的观点了。比方,每一种语音变化,且不论它的广延度如何,都局限于确定的时间和区域;没有任何变化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发生的;它只是历时地存在着。这恰恰是我们能够藉以辨明何为语言、何为非语言的一个标准。能够加以泛时解释的一个具体的事实是不属于语言的。①

由此可见,共时与历时区分理论的目的在于提供两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在探讨共时与历时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够片面强调共时与历时的彼此依存关系,而忽视它们之间彼此独立的秉性,也不能够一味地将两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而无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因为索绪尔区分了共时与历时就武断地将两者推向两种极端。它们都是相对而并时存在的。

那么,对索绪尔一向推崇备至的雅柯布逊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语言观问题上与索绪尔相背离呢?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06页。

根本性的问题：索绪尔与雅柯布逊的出发点不同。雅柯布逊主张现实主义，他的研究对象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操作对象是言语，而不是语言。可是索绪尔就不同了，他所倡导的是心理主义，《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操作对象是抽象的语言，而不是具象的言语。所以，雅柯布逊与索绪尔很自然地就会推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遗憾的是，出发点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似乎被以后的研究者彻底地、无端地忽略了。

应当说，从言语体系之中，索绪尔不仅仅看到了具象的言语，而且还看到了抽象的语言；从语言观中，索绪尔不仅仅看到了历时的方面，而且还看到了共时的方面。这着实是他超乎常人的了不起的禀赋。现在，我们不妨看一看索绪尔对共时和历时的界定：

> 所有与语言学静态方面相关的都是共时的，所有与演变相关的都是历时的。同样，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称语言的一种状态和演变的一个阶段。①

我们很容易发现，就问题的根本来说，雅柯布逊的思想并不抵触索绪尔的理论。既然雅柯布逊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历时中有静态，共时中有动态，那么，关于这历时中静态的研究就应当是属于共时的，而共时中的动态研究就理应属于历时的，这恰恰符合索绪尔的思想，即共时态与历时态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相互依赖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性"。[1] 此外，既然语言事实是由共时态和历时态交错构成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依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观照它呢？共时观和历时观是语言研究必然的选择。而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雅柯布逊在客观上接受语言共时态与历时态的相互交错与渗透，如果他能够花些时间去认真地读一读索绪尔的文本，从索绪尔的出发点切入索绪尔的语言观，他就应当不会固执地认为索绪尔割裂共时与历时，他就一定不会拒绝接受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的语言观。不尊重文本而作出的任何评述从来都是会贻误后学的。

只遗憾后来的有些学者还没有来得及完全领悟两位学者的理论精神本质便轻率地选择了站在一方的对立面，且惟恐立场不够鲜明！结果，雅柯布逊被视为绝对的静态主义者，索绪尔则被看作是贬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虚无主义者。近来，更有西方研究者指责索绪尔因缺乏历史观而误导语言学，从而使语言学落入封闭的陷阱。这些急功近利的研究者们在学术上的轻浮与无知真正令人瞠目结舌，而拾人牙慧者更令人不齿。

如果说索绪尔会看不到语言的历时态，那真正要令人贻笑大方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出生的索绪尔反复强调语言的演变。《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部分的第一章中指出：

> 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语言的各个部分都会经历变化；有与各个时期相适应的或多或少的演变。演变的

---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速度和强度可能有所不同，而原则本身保持不变；语言之河川流不息，是缓流还是急流，那都是次要的了。[①]

其实，《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历时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单从量上来看，它甚至超过了共时研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以后的有些所谓的知名学者莫名其妙地或猥琐地忽略了。

也有学者认为，索绪尔强调共时观，其实就是回到传统普遍语法，是复旧，而不是创新，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普遍语法的共时研究是以逻辑规约为根本的，而索绪尔则是从语言内部的结构出发，追索语言共时态的一般原理。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读一读索绪尔一段激励人心的预言：

语言学在给予历史过高的地位之后，将转向传统语法的静态观点，但却是以崭新的精神，带着不同的方法回来的。历史方法将对这种更新作出贡献；恰恰是由于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人们才会更好地理解语言的状态。古代语法只看到共时的事实；语言学却展示了一类全新的现象；但这还是不够的；应该让人感受到这两类现象的对立，以便从中得出所有可能的推论。[②]

我认为，正是鉴于对语言共时态与历时态并存这一基本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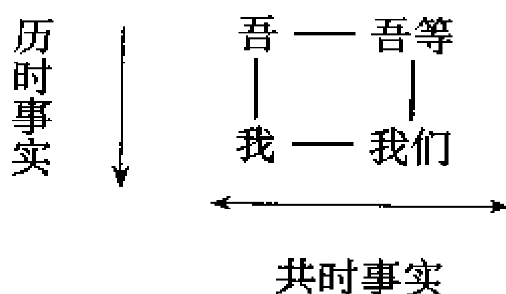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② 同上，第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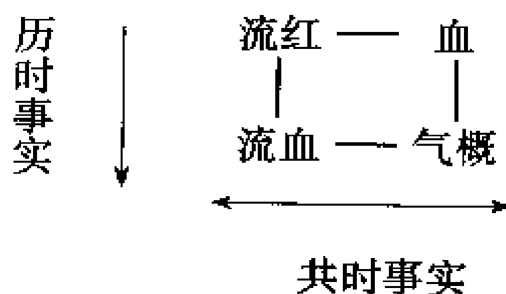
的共识,我们才有了可以讨论的基础。对语言的研究,我们可以采用历时的观点,也可以采用共时的观点,同时还可以大而化之采用泛时的观点,这其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对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问题在于怎样的观点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而我们的认识又最接近语言事实。

因为有了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的关系、两种不同的操作对象和两种不同的本质属性的规律。至少,索绪尔的反对者借助共时与历时的并存对立,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语言的本质。

首先,共时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与历时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不同,如:



再如:



由此可见,共时事实之间是并存、相对的关系,历时事实之间则只是更革、替代的关系。比方,古英语 fast 在现代英语的共时态中分化成了两个不同的辞项:fast(牢固地,副词)和 fast(迅速的,

形容词),两个辞项处于并存而相对的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两者与古英语的 fast 又处于历时态的更替关系之中。再比方,古英语中有发音、拼写都不同的两个辞项:gelik(相似的,形容词)和 gelīce(同等地,副词),发展到现代英语,共时态下的两个辞项已经拥有了共同的发音和拼写,即 alike(相似的,形容词;同等地,副词)。可见,从历时观出发,alike 替代了 gelik 和 gelīce,alike 与 gelik, gelīce 处于历时的替代关系之中;从共时观出发,共时态中的 gelik 和 gelīce 处于相对并存关系之中。

其次,由于共时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与历时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根本不同,共时与历时研究的操作对象就注定不会是相同的。两个范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以被糅为一体的。研究共时态就是关注语言本身,研究历时态则是考察语言的变迁。共时研究的是语言具有一般意义的对立关系特征,历时研究的则是一种由众多共时态链接起来的言语细微的嬗变过程。共时研究的操作对象是语言事实在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体克状态,在时间上不具有一致性,而历时研究的操作对象是语言事实与演变、发展历程的连贯性,它构成时间上的一致性。

以辞项为例,共时研究的操作对象不是"我们"表示复数,而是"我"与"我们"的相对并时存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语言价值。历时研究的操作对象则是"们"对"等"或"辈"的排挤,是一个辞项与另一个辞项的替代事实,或是对新辞项作出分析,或是对旧辞项的来源作出解释。比方,世纪之交,中国新闻媒体出现了不少如下并存言语事实:

加入 WTO — 加入世贸组织
进入 WC — 进入世界杯
IT 行业 — 信息产业

再比方,现代汉语中曾出现了下面三组对立并存事实:

20 世纪 80 年代	漂亮的妹妹——英俊的哥哥
20 世纪 90 年代	靓妹——酷哥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	美眉——靓仔

从共时观出发,我们要对这两组并存事实分别进行研究,追索潜存的关系系统,并从结构上对系统的形式与规则加以描写。这就触及语言系统本身,其操作对象是“漂亮的妹妹”与“英俊的哥哥”的关系,是“靓妹”与“酷哥”的关系,是“美眉”与“靓仔”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语言本身的价值。而从历时观出发,我们就要研究以后年代的辞项对以前年代所拥有的辞项的排挤或替代。比方,“靓”排挤“漂亮”,“酷”排挤“英俊”,这种排挤往往始于偶然或意外,至少,我们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的目的性或任何的理性成分——为什么替代“英俊”的不是“靓”? 为什么不用外来词音译来替代“漂亮的”? 而这种偶然的事实及其发生的过程是历时研究的操作对象。所以,历时研究的操作对象与系统没有必然的联系。

此外,共时研究的操作对象一定是与一种语言(包括方言、次方言)相对应的整个事实,而历时研究的操作对象则未必局限于同一种语言或同一种语族、语系等等。

例如:

现代汉语的“帅”——现代汉语的“酷”

拉丁语的calidu(热)——拉丁语的cald(热)

希腊语的ésti(是)—→法语的est(是)

拉丁语的calidum(热)—→法语的chaud(热)

梵语的trayas(三)—→英语的three(三)

古英语的ciese(奶酪)—→现代英语的cheese(奶酪)

最后,语言研究者对总结语言的规律总是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有索绪尔的共时观和历时观并存作指导,我们便明确地知道:有语言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并存事实,就必然存在着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而这两类规律一定是不同的。共时规律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规则性,共时的规律自然也就是非强制性的;历时规律始发于偶然的、特别性的语言事实,它因为变化而产生的实际更革效果就促使它自身凸现出一定的强制性,从而规定语言。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规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少有例外,而另一些规律则只能说明一部分语言事实,但具有强制性。

研究者们常说,语言规律总是有例外的。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例外原本也是有规律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我想,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是从怎样的出发点来总结规律的?我们总结出的规律是不是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还是针对具体语言事实的规律?是概率的简单结算,还是理论的逻辑归纳?

学界普遍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层理论、转换生成语法对

索绪尔的共时思想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有效的延伸,但是,共时观与历时观并存的理论究竟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指导和启示,恐怕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就我个人的看法,不容乐观。而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索绪尔共时观一直遭遇不公,这其中不乏舒哈特、马丁内、雅柯布逊等等学界名流因错误地以为索绪尔割裂共时与历时而施以的遮挡,同时也不乏后来的研究者还没有读或还没有读懂索绪尔的共时观理论就将它拒之门外的轻浮。

倘若不是索绪尔从共时观入手,提出语言同质的系统,现代语言学历史性的开端将延至何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因为有了索绪尔同质系统的概念,后人才有可能谈论与同质相对立的异质,异质是在与同质对立的关系中才获得了真正的存在价值,历时只有在与共时的相对关系中才无可辩驳地存在着。

第四节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谈及语言符号,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符号?

按照通常的定义,符号是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它是意义的承载,物质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完全由主体来加以指认。同一系统中的符号彼此之间不相混淆。

那么,什么是语言符号呢?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即符号受指与符号施指的结合。符号受指是概念,符号施指是音响形象。两者既彼此分离,又相互对立;既互为条件,又互为依存,共同构成语言符号。语言符号这种不可分割的二元性是语言研究的基

础。此外,符号施指的价值不依赖于它声音的物质属性,而是取决于它在同一系统之中与其他符号施指的关系和差别,也就是它与其他符号施指不相混淆的状态。

索绪尔对音响形象作了学理上的严格界定:

> 音响形象并不是物质声音,即纯物理的事物,而是这一声音的心理印记,是用以证实我们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理念的表现;它是感觉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时会把它称为"物质的",那也只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而且是相对于联想另一要素,即一般更为抽象的概念而言的。……
>
> 语言符号是一个双面的心理实体。①

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本质菁华在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是贯穿索绪尔语言观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索绪尔本人将这一原则视为语言符号的最高原则。

当谈到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时候,我们遭遇的是无可避免的混沌的经验体,所以,首先应该对语言符号任意性加以范畴化,即确定"任意性"作为术语的意义范畴,也就是要给予它严格概念上的界定。只有在达成共识的"任意性"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来讨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的两个方面,即概念与音响形象之间不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因果关联。符号施指的物质形式不取决于符号受指的物质形式,反之亦然。语言符号本身没有固定的价值。

关于任意性,索绪尔有一段界定性言说:

> 还需要注意任意性。不应该让人以为符号施指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下面我们将看到:一个符号一旦在语言群体中得到确立,个人便无权对它加以任何改变);我们想说:它是无理据的,也就是说,相对于符号受指,即在现实中与它没有任何天然联系的符号受指而言,它是任意的。①

我们由此获得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学意义上的"任意性",它与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任意"的概念不可以等同起来。

客观地说,在语言符号观这个方面,索绪尔是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的忠实传承者。每一位严谨的语言学研究者都不会忘记惠特尼在《语言与语言研究》一书中的著名论断:

> 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词与观念之间都不存在任何内在、根本的关联。人的交际手段和其他动物的传达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本能的,而前者则是任意的、约定的。只消举出一个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对象客体而言,世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个名称。甚至在拟声或模仿成分最为明显的情况下,如 cuckoo(布谷鸟)这个词,除了方便之外,其中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说存在着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这种必然性应该同样可以推及到其他的动物和声音,乃至所有的语言。事实上,在其他情况下,人们是用完全不同的名称来表达这些观念的。①

关于符号的任意性质,语言学界一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受业于索绪尔的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指出:

> 只因为语言符号具有完全的任意性质,才有了现在研究所需要的历史比较方法。②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后期的杰出代表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 1919—)在《语言的起源》③一书中将任意性界定为语言的基本属性。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认为语言有十六种基本属性,而惟一位居首要地位的则是任意性。④

法国语言学家本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1—1976)则

① W. D. Whitney. *Language and Language Study*. New York. 1867. P282.

② A. Meillet.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ique*. Oslo. 1925. P2.

③ Charles F. Hockett. *The Origin of Language*. Scientific American. 1960. PP88—96.

④ 参阅:John Lyons.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70.

旗帜鲜明地声称:从共时的观点来看,任何语言集团所使用的语言符号都没有语言符号任意性可言。在他看来,构成"任意性"的应该是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物"之间的关系,比方 arbre(树)的发音与 arbre 这种植物之间的关系,而在索绪尔界定的符号施指(即音响形象)与符号受指(即概念,心理再现)之间丝毫不具有任意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国人可以随意更改它们的结合体,他的例证是:法语中的 fromage(奶酪)和英语中的 cheese(奶酪)都是各自语言不得不采用的,非但决无任意之举,而且是必须的。尽管本弗尼斯特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加以充分的论证或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理据,尽管他指称的任意性与索绪尔所界定的任意性不在同一层面,但是,身为国际符号学协会主席,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理所当然的权威性。德里达同样反对语言符号任意性一说,他的观点是:语言符号存在于一个系统之内,每一个符号都有其在系统内部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符号既与其他符号不同,又与其他符号相关联,系统内部的符号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符号不是任意的,而是规定的。德里达所谓的任意性看似与索绪尔的任意观相抵触,但是他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已经是属于索绪尔涉及的相对任意性的范畴了。波兰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Nikolai Kruszevski, 1851—1887)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推出相似性和相邻性,他的追随者们指责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声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纯属无稽之谈。他们认为在符号施指和符号受指之间只存在一种习惯性的相邻性关系,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取的,它对语言集团的所有成员来说都具有强制性。不过,在他们看来,对于语言符号而言,相似性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它已经被证明是派

生词和词族形成的根本依据,比方,同根词、选择性前缀或后缀结构类型,等等。例如:来自拉丁语 claudere 的英语词根-clud-(关闭);表示"不"、"非"、"无"等意义的英语前缀 in-;表示"学说"、"理论"、"科学"等意义的英语后缀-ology。请看例证:

clud	in-	-ology
conclude (结束)	inactive (不活动的)	aerology (高空气象学)
exclude (逐出)	inadequate (不适当)	algology (藻类学)
include (包括)	inadvertent (不注意的)	axiology (价值论)
occlude (堵塞)	inalienable (不能让与的)	gemology (宝石学)
preclude (排除)	inanimate (无生命的)	theology (神学)

以德国语言学家洪堡为旗帜的语言学研究者认为:一个符号并不直接体现它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它不过是人们理解事物或概念的主观形式,符号的产生来源于人的动机、意愿和想像,绝非任意之结果。他们声称,如果一个符号不能用动机、意愿或想像来加以解释,那也只是因为就目前的研究手段和共时研究资料,人们还没有能力考察或发现语言符号最初产生的动机,所以,暂时将这样的语言符号归人任意性范畴。

对于否定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点,我们很容易找到摧毁性的例证。

首先,当中国官方报纸、电视等传媒豁然出现 WTO,IT,DJ,CEO,CFO 等字样时,我们知道,汉语语言集团舍弃了本应不得不采用的"世贸组织"、"信息产业","音乐节目主持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等等。对诸如此类的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一般语言现象,不知本弗尼斯特的支持者们或追随者们会作何解释呢! 更何况,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现代英语和现代法语同时采用了相同的词语拼写形式,却各自采用了独特的音响形象,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尤其是符号施指一方的任意性在此可见一斑:

法　　语	英　　语	汉　　语
canal/kanal/	canal/kəˈnæl/	运河
cruel/kryɛl/	cruel/ˈkruːəl/	残忍的
empire/ãpiːr/	empire/ˈempaiə(r)/	统治权
final/final/	final/ˈfainəl/	最终的
mental/mãtal/	mental/ˈmentəl/	精神的
prison/prizɔ̃/	prison/ˈprizən/	监狱

其次,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不可替代性指认了语言符号的差别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但这种差别性和强制性是有限的,同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完全遮蔽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同音异义词和异音同义词以及近义词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有效的证实。例如:

同音异义词：

干草(gān cǎo)：晒干的草。
甘草(gān cǎo)：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毛，花紫色，荚果褐色。

Bank: a business that keeps and lends money(银行)
Bank: land along the side of a river or lake(堤岸)

同义、近义词：

砥砺—磨练—摔打—锤炼—锻炼
fight—beat—hit—strike—spank—slap(打)

最后，至于相似性和相邻性，我认为，鉴于大量非派生词以及屈折变化语言的存在，相似性对于语言符号来说是可能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何况，抛开语言符号任意性，派生词或词族便无从构成。比方，英语词根 clud 这一音响形象为什么可以和"关闭"这个概念或心理再现联系在一起，并共同构成一些语言符号的核心部分呢？在英语中与"不"、"非"、"无"等概念相联系的为什么是前缀 in-，而不是 super-，sub-，inter-等等音响形象呢？为什么英语后缀 -ology的音响形象会与"学说"、"理论"、"科学"等等概念融为一体呢？除了"任意性"三个字，我们还能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答案么？而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失语，对派生词或词族的相似性又能从何谈起、又能作何解释呢？

现在，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第一,在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就符号施指和符号受指之间的联系而言,只有任意性。最初的符号施指一经产生便经久不衰,保持了永远的不可论证性,例如:

汉语	英语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天	sky	ciel	Himmel	cielo
日	day	jour	Tag	giorno
夜	night	nuit	Nächt	notte
水	water	eau	Wasser	acqua

即便是通过历史的溯源寻踪,也难以发现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间除了任意性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本质存在的可能性。同时,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有力地解释了世界语言符号多样性的存在理据。

第二,语言符号是以任意成分为基础的,其中不乏偶然因素或突发因素的介入。比方,因为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人造地球卫星 Sputnik 的成功发射,一时间出现不少以-nik 为后缀的词语:

citynik	都市迷	beatnik	颓废的一代
jobnik	工作迷	no-goodnik	饭桶
folknik	民歌迷	boatnik	水上人家
peacenik	和平分子	earthnik	地球人

语言符号肇端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的,即便是拟声,它也不是纯粹的拟声,而是被音响形象和理念解构了的操作对象,是被范畴化了的概念或心理再现。所以,拟声词恰恰也是一种学理上的任意,它不仅没有削弱语言符号任意性这一根本命题,倒是进一步反证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不同语言中存在的不同的拟声词更是一个有力的举证。例如:

英　语	法　语	德　语	汉　语
rattle	craquer	knarrend	格格作响
clink	tenter	klirren	丁当作响
bark	aboi	bellen	犬吠声
quack	coin-coin	schnattern	(鸭子)嘎嘎叫声
cluck	glouglou	gackern	(母鸡)咯咯叫声
jug	gazouillement	zwitschern	(夜莺)唧唧喳喳

更进一步分析,人们习惯性地都以为自己听到的是自然物的声音,而其实听到的都是反映到脑子里的理论性,即概念或心理再现。比方,听到泉水声,我们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是泉水?对语言最早的接触就是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实践纯粹的拟声行为,所以,同样是鸭子,它的叫声在汉语中是/ˈgɑˈgɑ/,在韩语中则是/ˈguaiˈguai/,在日语中是/ˈguæˈguæ/,在泰语中是/ˈkæpˈkæp/,在英语中是/kwæk/,在法语中是/ˈkwɛ̃ˈkwɛ̃/,而就我目前的观察,鸭子并没有因为国度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言"。事实上,一旦我们去实践所谓的拟声行为,它就已经被概念和音响形象解构

了。正因为语言符号是心理实体,所以才出现了同一符号受指应对不同符号施指的现象。

第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双向的。换句话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还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间的关系,它同时还存在于符号施指一方,或符号受指一方。符号施指可以用不同的物质形式来表示某一个符号受指。比方,单数和复数的概念,同义词和近义词,古代语和现代语,等等。例如:

孩子: child——children
电影: film——movie
改变: change——alter
辩论: dispute——debate
孩子: cild(古英语)——child(现代英语)
石头: stān(古英语)——stone(现代英语)

而符号受指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概念来应对某一个符号施指。以汉语为例:

kū	hé
哭:哭天抹泪	涸:涸辙之鲋
枯:枯木逢春	和:和盘托出
刳:刳木成舟	河:河清难俟

我们不仅可以从同一种语言中找到语言符号双向任意的例

证,而且还可以从不同语言中找到具有同样效力的证据。比方,不同语言对同一事物的指称,概念,即符号受指相同,但符号施指不同,其中包括:一一对应的不同,即在不同的语言里,同一个概念有相应的不同的符号施指;例如:

意大利语	法　语	汉　语	英　语	德　语
fiume	fleuve	河流	river	Flüsse
uccello	oiseau	鸟	bird	Vogel
albero	arbre	树	tree	Baum
libro	livre	书本	book	Buch

此外,还有一项与多项对应的不同,即在一种语言里,两个概念有两个符号施指,而在另一种语言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只有一个符号施指。试比较:

法　语	汉　语	英　语
mouton	绵羊	sheep
mouton	羊肉	mutton
mouton	羊皮革	sheep
porc	猪	pig
porc	猪肉	pig/pork
porc	猪皮皮革	pig

再比较:

英 语	汉 语
pretty soon	很快
a pretty girl	一个漂亮的女孩
a pretty day	晴朗的一天
a pretty piece of music	一首优美的乐曲
a pretty example	一个贴切的例子
a pretty hypocrite	一个狡猾的伪君子
a pretty sum of money	相当大的一笔钱
sit pretty	过舒服的日子

第四,概念与音响形象结合而成的词语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最高表现形式。词语是相对独立的语言实体,它的任意性程度最高。此外,概念与音响形象结合而成的词语横向组合排列又同样具有任意性,任意性是约定俗成的基础,约定俗成是任意性的强制性延伸。请看以下两例:

杜鹃$_1$——鸟,身体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条纹。初夏时常昼夜不停地叫。又称杜宇、布谷、子规,等等。

杜鹃$_2$——植物,常绿或落叶灌木,叶子呈椭圆形,花多为红色。供观赏。

——这种植物的花。又称映山红。

又如:

手套(标准汉语)——手袜(广州方言)

盒饭(标准汉语)——饭盒(新加坡语)

冰棍(标准汉语)——棒冰(上海方言)

飞蛾(标准汉语)——扑儿(湖南方言)

第五,构成语言符号施指的材料是任意的。语言构成材料的物理性质对语言符号本身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它不具备语言学的价值,重要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任意性基础之上的约定俗成的抽象。而所谓关系一定是要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差别。

对于符号受指而言,符号施指仅仅是外在的,是一种形式,符号受指本身不会因为外在形式的改变而改变。比方,在英语国家,"老年"又被称作"golden age"(金色年华),而在中国,只有"少年"才会被称作"金色年华"。

再比方:

北戴河(其实是海)

中南海(其实是湖)

什刹海(其实是湖)

北海(其实是湖)

写到这里,我想起"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第二幕中的两句台词: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sweet.

的确,无论我们怎样称呼玫瑰,它都会芬芳依然。

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符号材料和不同的规则约定,而规则约定的根基又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真实存在。

由此可见,任意性是语言符号与生俱来的秉性。

第六,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解释空符号和语言规律的例外事实。事物先于语言符号而存在,语言符号先于规则而存在,所谓语法规则、所谓语言规律、所谓可论证性等等都是人们对语言事实发生概率的滞后总结与归纳,所以,我们才遭遇语言空符号现象和语言规律的例外事实,也就是说,因为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没有天然或必然的联系,语言空符号才有可能合法地存在;又因为语言符号事实在先,语言规律事实在后,例外这才有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倘若没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根本性的命题,语言空符号和语言规律的例外就不可能永远合法地存在。语言空符号的存在和语言规律的例外事实从又另一个角度指认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比方:

空符号:

英语	汉语
a ∅ book	一本书

a ∅ pencil	一支铅笔
a ∅ lamp	一盏灯
a bar of chocalate	一条巧克力
a piece of paper	一张纸
a cake of soap	一块肥皂

再让我们来对英汉语言空符号现象作一番比较:

英语	汉语
∅	豆蔻年华(13岁)
teenage(13—19岁)	青少年
∅	碧玉年华(16岁)
young(49岁以下)	中年
∅	知天命之年(50岁)
∅	花甲之年(60岁)
golden age(65岁)	∅
∅	古稀之年(70岁)
∅	耄耋之年(80岁)
∅	鲐背之年(90岁)
third age	晚年

再如,例外事实:

我在食堂吃饭。──→我吃食堂。

但是:

我在医院吃饭。──→* 我吃医院。
我在宾馆吃饭。──→* 我吃宾馆。
我在单位吃饭。──→* 我吃单位。
我在餐厅吃饭。──→* 我吃餐厅。

语言事实的规律就像人们总结的气象规律,我们不能因为能够总结出气象的规律,就断定它根本上是有理据的。同时,语言规律的例外就像没有被测准的天气,它的可论证性值得讨论。再者,倘若规律在先,那就不可能有例外,一如游戏规则。因此,只要有语言规律的例外存在,我们就有理由拒斥最初先民按照预先制订的规则创造语言符号的任何可能性。

第七,语言符号任意性解释语言的规则和制度。以任意性为基础的语言符号一经产生并为语言集团所接受,那么,它就具有了能产性。比方,众所周知的美国政界丑闻 Watergate(水门事件),事先,没有人想到一系列语言符号会因为它而诞生,例如:

Winegate	法国葡萄酒销售丑闻
Ricegate	韩国通过贿赂美国议员以达到向美国倾销大米的丑闻
Debategate	美国共和党在里根竞选总统辩论之前窃取卡特竞选纲领的丑闻
Zippergate	美国克林顿总统性丑闻

水门(Watergate)原本只是华盛顿离林肯纪念堂不远的豪华大厦建筑群的总称,就因为民主党在此地安装窃听器事件,与政界丑闻的概念毫无自然联系的-gate这一音响形象便意外地成了"丑闻"概念的代名词,变为语言符号的构建要素。

由此可见,规则形式一定是仿照某种任意性模式而打造出来的,是对任意性模式的理性类比。而通过类比获得的一般语言形式又促使学者们总结出语言符号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于语言符号本身来说,具有解释的效力,对于语言集团来说,具有制约、指导的作用,而正是借助这种制约、指导的作用,人们在不断创造新的语言符号之时,遵从一定的规则形式,从而使语言的任意性程度显得越来越低,而可论证性越来越逻辑性地表现出来。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忘记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最初结合的任意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与任意性并存的非任意性,即可论证性。例如:

survey(俯瞰,调查)——sur(在上面)+vey(看)
neolithic(新石器时代的)——neo(新的)+lith(石头)+ic(具有……性质的)
finish(完成)——fin(结束)+ish(使,令)
pacifier(抚慰者)——paci(和平)+fi-fy(使)+er(动作者)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人们不断地在进行类比的同时总结语言的规律,并以语言规律为指导或规约,进行新的语言符号的创立。其二,语言符号发展到今天,可论证性已经成为它的存在属性。但是,这种属性不是语言符号的根本,而是第二性的,说它是

第二性的,因为它还不足以动摇语言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间关系上的根本任意性,比方,我们可以论证 reader(读者)的非任意性,它的构成是:read(读)+er(动作者),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然而,再进一步,我们却不能够解释 read/ri:d/这个符号施指为什么会与 read 这一符号受指的动作行为概念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构成符号 read 整体的两个方面除了任意性又能通过怎样的途径统一起来呢?

此外,不是每一个词都可以通过分解来加以论证的,而每一个可分解词语的可论证程度似乎也不尽相同。可论证性只是相对地存在。

索绪尔在共时语言学部分的第六章中提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区分理论:

> 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理并不妨碍我们在每一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的,即不可论证的与仅仅只是相对任意的区分开来。只有一部分的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在其他的符号中出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让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予以消除,但有程度上的差别:符号是相对可以论证的。[①]

另外,我们常常能发现语言中新质要素是由语言固有要素构成的,而新质要素又不是新质要素所排挤的符号的简单替代形式,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比方,汉语中的"网吧"、"氧吧"、"水吧"、"玩吧"、"话吧"等等,这其中的任意性自现。而有些已经在任意性基础上结合成一体的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再度呈现任意性这一语言最高原则。因为客观世界本身的存在和变化具有相当的偶发性,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混乱,那么,说话主体形成的概念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符号受指往往破坏符号施指所依托的可论证的制度。异族语言要素的侵入便是典型例证,以汉语为例:

每个人各自付钱——AA 制
信息产业——IT
世界贸易组织——WTO
国际奥委会——IOC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初便开始困扰西方语言学研究者及教师的英语字母汤(alphabet soup)到了 20 世纪末叶已常现中文报刊。

第八,语言符号任意性具有广延度,即在符号施指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认符号受指的张力。符号施指一方永远是分级的、范畴化的、制度化的,而客观事物,即符号受指一方总是错综复杂的整体,因此符号受指往往边界不明。以人的一生为例,它是一个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但是,语言符号提供了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等,人的一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这些阶段之间原本是混沌的,没有清晰的界限。又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不确定性,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仅存在于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而且单方面延

伸到符号受指,又反过来影响到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结合体的横向组合或线性语符列。例如:

青年科学家——青年运动员(年龄?)

小毛驴——大白兔(大小?)

高潮——高空(高度?)

小大人——大小子(大小?)

通过推证,我们认识到语言符号受指与符号施指之间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任意性,而这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根本。

1954年,布达格夫指出:语言符号一般只限于在其低级形式(音、部分词素)才是不可论证的,但在其高级表现形式(词)中,语言符号总是趋于可论证性的。1955年,斯米尔尼茨基指出:无可论证性(任意性)适用于简单的、不可分解的或者相当孤立的、溶为一体的凝固性单位。至于在复杂的结构中起作用的则已经是可论证的原则了。当然,它是跟第一个原则同时起作用的,因为复杂的结构中包括简单的单位。[1]

无论用怎样的标签,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地颠覆过。在我看来,他们在强调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的同时客观上充分地肯定了语言符号的绝对任意性,因为无论如何也摆脱

---

① 参见: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1页。

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可论证性,即非任意性是建立在绝对任意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绝对任意性的存在,便无所谓可论证性。更为重要的是,可论证的语言符号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并不等于语言符号的整体。

总结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我得到这样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语言符号在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关系中存在绝对的任意性,在横向组合关系及线性语符列关系中则存在相对的非任意性,即可论证性。

总之,语言符号任意性是普遍存在的,它是语言符号的根本。可论证性则是语言符号的第二性。语言符号的这两种属性存在的层面不同,各有各的范畴。因此,我并不主张以强调任意性来否定可论证性,也反对以可论证性来遮蔽任意性。

只有承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我们才有可能面对事实,从零星、孤立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支撑语言符号的基本结构,在论证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过程中完成对系统内部语言符号的区别性特征的指认。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给后人留下了博大的思维空间,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系统研究的激活点。

文艺批评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踵事增华,率先从非语言学的角度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进行了学理上的梳理,并将索绪尔的符号理念扩展到语言学以外的领域,从而确定了符号学操作对象、原则运用和发展方向。语言符号在于音

响形象和概念之间的任意关系,以任意关系为基础,拓展语言的符号系统。

特鲁别茨柯依(Nikolai Trubetzkoy, 1890—1938)则最先将这一论点用于语音研究,并结合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解决音位和语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则借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观,以典型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指认社会的构成性,阐释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符号施指”,即一整套再现系统。

索绪尔符号观的又一位追随者是法国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　),他深刻领悟索绪尔符号观的精神本质,并完整地将它运用到人类学范畴。另外,列维-施特劳斯还借助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生活中,各种要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都如同语言符号中的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的关系,而每一个要素都有区别于其他要素的特征。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一般性张力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指认。

因开启解构理论而著称于世的德里达(Jacque Derrida, 1930—　)则提出将历来被轻视的书写符号放在语言符号研究的中心地位,提出“书写学”。他的理由是,音响形象是瞬息即逝的,而书写的文字则是看得见的,因此它更值得探讨。不过,依我看来,如果德里达的研究仅仅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么,他的理论就是不堪一击的。的确,音响形象是瞬息即逝的,同样,思想的火花也是,心理的活动也是,言语的交流也是,有什么不是呢?时间、语境、感觉、意念,等等,等等。再者,尽管音响形象与书写文字被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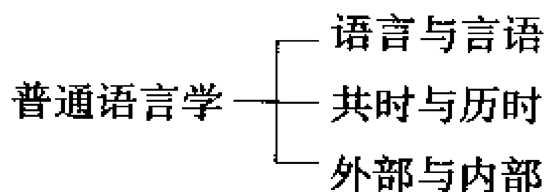
体感知的途径不同,前者通过声波,后者通过光波,前者作用于主体的听觉,后者作用于主体的视觉,但是,从语言符号施指的本质方面来说,它们没有任何颠覆性的差别,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是,德里达从书写符号出发,他的终极目标是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

在索绪尔语言符号观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社会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等等,真如雨后春笋,但因为超出本文的语言学本体研究范围,我将另文加以阐述和解析。

索绪尔的符号观不仅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而且还为整个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树立了方法论的典范,并引起西方近代思想史的震动:学者们研究人对客观事物的利用,就必须对客观事物本身与它们被赋予的社会价值或意义加以有效的区分,即对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区别性系统的指认。

第五节　外部语言学中的时空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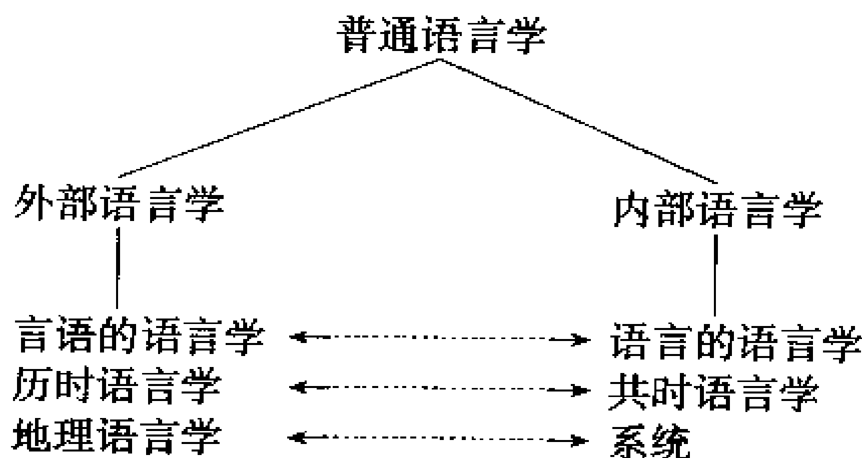
人们通常是这样来认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



这样的认识结构有助于人们清晰地看到二元对立的存在,但它同时又彰显了二元对立与二元对立之间的混沌与交错,从而造

成对索绪尔语言观的理解迷失于细节之中。有研究者指出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索绪尔本人对一些语言问题还没有从思想上真正作出逻辑的梳理,而我个人认为,其症结恰恰在于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整体结构的失语。只有从宏观上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整体结构加以高屋建瓴式的解读,我们才能够俯瞰这一理论的内部结构,从而分清什么是支柱性的,什么是辅佐性的;什么是对立的,什么是统一的;什么是恒定的,什么是暂时的;等等。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整体结构的失语彻底地遮蔽了索绪尔的时空观。

通过对索绪尔文本的研究和考证,我提供如下索绪尔理论体系全景图解:



索绪尔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这两大支柱构建了他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语言学是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辩证统一。内部语言学研究言语体系中语言的组织以及语言的内在系统,比方,横向组合关系和关联聚合关系,等等。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严密的、同质的分类原则。外部语言学则研究言语体系中言语的地

理扩展和方言的分裂语境,不涉及语言的内部系统和规则,比方,交际的力量和乡土观念,等等。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语的历史、地理,普通语音学,词源学,等等,是一种异质的安排与整理。在其直接性上表现为语言组织与言语扩展之间的关系,即理性中抽象化的语言是否表征现实中具象的言语,因此,外部语言学首先引发内部语言学问题,继而成为内部语言学的承载,内部语言学则不失时机地转化为外部语言学的前提。内部语言学涉及言语体系的恒定方面,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语言抽象的部分;外部语言学则观照语言的动态方面,受制于时间或空间,是言语体系的具象的部分。足够的理论背景和哲学思辨可以促使外部语言学的成果积淀并升华,进入内部语言学研究范畴,内部语言学则以外部语言学为参照,对研究对象施以合法调节。

外部语言学不是一个泛化的理论,而是研究基于哲学特性的理论形态与实际中具象的言语之间的关系。没有外部语言学,我们便不可能聚焦内部语言学,便不可能理解那种抽象的"普通"的存在,而没有内部语言学,我们便无从感知理论形态与实际中具象的言语之间的关系,便无从实现理论的升华与转化。

言语是悖论性的存在。言语的任意性与非任意性、精确性与非精确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等等不仅仅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时间性内容和空间性内容,而且总是表现为超然于时间与空间之外的语言的哲学抽象。

语言观的表述和阐述需要一定的理论逻辑和框架,需要一定的体系。

语言学界因为索绪尔的具有爆炸力的理论体系而亢奋无比,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思想活力彰显,成就激增。现在看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大洋州,新生语言学派富有创见的贡献、现代语言学派各个学科卓有成效的拓展,无一不是来自索绪尔哲学思想的垂青。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理论是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 1890—1938)音位学创立的基础,共时与历时的区分理论打破了传统比较语言学混沌的研究方式,给新语法学派狭隘的历史主义观点实施了一种震荡性的反动,更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体系的恩惠不仅仅囿于现代语言学,它随着岁月的推进不断地向周边学科延展,符号系统观则早已成为符号学这门显学的指南针。拉康(Jacques Lacant, 1915—)在精神分析领域得出有益的结论:无意识具有彻底的言语体系结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　)将索绪尔的理论构架导入人类亲属关系、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研究,创立了结构人类学。遗憾的是,索绪尔理论体系中的地理语言学却遭遇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遮蔽,他从空间的视阈阐释语言形式的分布并以此凸显出来的时空观一直处于隐匿性状态。

本节的目的就是要清晰界说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时空观。

语言的多样性是最基本的客观存在,索绪尔从语言多样性入手,他的观点是:自然的事实必须首先就其本身来进行研究[①] 在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追索语言多样性原因的过程中,索绪尔完成了对语言时间和空间交错的思考,形成独特的语言时空观。

他首先指认语言的多样性:

> 在语言研究中,首先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如果说难以捕捉到语言在时间上的不一致,那么,语言在空间上的不一致就是一目了然的了;就是未开化的人,通过与操不同语言的其他部落的交往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正是通过这些对比,一个民族才注意到自己的民族语。[1]

同时,索绪尔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即语言的相似性。多样性与相似性并存,但是,前者是绝对的事实,后者则是相对的事实,因为相似性是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它只可能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内。

参照语言的相似性,索绪尔归纳出语言在三个层面上的多样性:

其一,语言亲属关系中的多样性;

其二,没有明确亲属关系的绝对多样性;

其三,同一语系内部的多样性,即方言。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语言多样性的现象并不具有语言本质意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义,尽管,方言和语言之间存在着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1]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语言的多样性呢?

首先,时间是主要的原因。

在索绪尔看来,空间本身对语言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 人们忘记了时间因素,因为它不像空间那么具体;但是,事实上,语言的分化正缘于时间因素。地理的多样性应该表述为时间的多样性。[2]

一向擅长深入浅出的索绪尔打了个比方:

> 两种民族语的分离是现象的明确形式,但是,它不能解释现象。没有地方的多样性,哪怕是细微的多样性,这个语言事实就不会分化;不过,就其本身而言,地理上的分离不会造成区别。同样,就像我们不能够凭着面积来判定体积,只有借助第三维,即高度,才能判定体积,地理区别图示只有投射到时间上才算是完备的。[3]

我们有例为证。古英语(公元 449—1100)阴性指示代词 shu(她)变化的粗略轨迹如下: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21 页。

② 同上,第 227 页。

③ 同上,第 227 页。

shu ⟶ sīo ⟶ shō(中古英语)⟶ she(近现代英语)

经历时间而发生拼写和发音嬗变的词语不胜枚举，请看中古英语(1150—1500)与现代英语的比较：

中古英语	现代英语
service/ˈservisə/	service/ˈsəːvis/
clene/ˈklæːnə/	clean/kliːn/
tide/ˈtiːdə/	tide/taid/
coppe/ˈkupə/	cup/kʌp/
hoom/hɔːm/	home/həum/
cild/saild/	child/tʃaild/

还有，在五世纪，日耳曼语是现代英语和现代德语的共同始祖语，但是现代英语与现代德语经过若干世纪时间的推移，它们身处异地，按照各自的特点发展，结果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只能是蛛丝马迹了。同是来自拉丁语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进行两组比较：

英语	德语	(汉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mine	abbauen	(开采)	estrarre	extraer
wide	weit	(广阔)	esteso	espacioso
pay	ausgeben	(支付)	pagara	pago
draft	verfassen	(起草)	redigere	redactar

古今汉语的读音变化及结构变化更是不胜枚举,例如: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语音:		
	鸡 /ji/	鸡 /kei/
	滑稽/hua/	滑稽/gu/
	狐狸/hu/	狐狸/hua/
结构: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该担心你是否了解别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①
	孝顺、友爱、勤劳、节俭这四项,是人们立身处世中最为重要的准则。对此,一定要深刻领会,身体力行,从内心深处督促自己。	孝、友、勤、俭四字,最为立身第一义,必真知力行,奉此心为严师。②

索绪尔对语言变化结果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比方,在某一时期,整个一个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过了

① 孔子,《论语·学而》,景元元贞平水本论语注疏解经十卷,卷一,第6页。

② 庞尚鹏,《庞氏家训·务本业》,《从书集成初编》本。

五个或六个世纪之后，相距最远的两个地方的居民大概都听不懂对方的话了；相反，任何一地的居民始终能够理解邻近地区的土语。从一端到另一端横穿这个国家的旅行者只会看到从一地到另一地极其细微的变体；但是，这些差别随着他不断前行而一步步地积累，最终他会遇到让他出发地居民难以理解的一种语言。或者，从一个地点走向四面八方，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方向的分歧都有所增加，尽管方式有所不同。[①]

其次，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

方言的界限问题一直是令语言学家感到棘手的问题。在任何时候，人们面对的都是一种语言的多种方言，而这些方言不断由于相邻地区的言语事实而发生变化，每一个地区又都在按照自己独有的特点发展，并由此产生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突变事实，从而明确地将两个相邻地区的方言分隔开来。

在索绪尔时代，较为流行的做法是把方言界定为完全确定的类型，划定疆界分明、彼此独立的区域，索绪尔认为，不应该排除政治、社会、宗教等等因素对自然方言区域的强制性界定，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忽略自然方言观念与区域不相吻合的事实。对方言的界定，索绪尔提出了两点：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根据一种方言的全部特征来界定方言,这样就得在地图上的某一点上固定下来,还得把握一个地方的土语;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一点,就再也不能确切地找到同样的特点了。要么根据方言的一个单一的特点来界定方言;那么,我们无疑能得出一个面积,即有关事实蔓延区域所覆盖的面积,不过,这显然是一个人为的手段,而如此划定的界限与方言的显示毫不相符。[①]

在我看来,如果要谈及方言的疆界,那么,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方言与方言之间究竟有没有差异的存在?如果有,那么,我们界定差异的依据是什么?

也就是说:

第二,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这些区别性特征是否足以提供方言与方言之间的疆界?

如果可以,那么:

第三,这种疆界是否具有实在性和稳定性?如果方言与方言之间的疆界总是会因为交际而变得模糊,缺乏稳定性,换句话说,如果交际的存在造成疆界游移,稳定性只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存在着,而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异则是绝对地存在着,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得出——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方言——这样的结论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呢？在不同的方言之间总是或多或少地彼此借用,相互拥有的不仅仅是其他方言的残言片语,而且还有其他方言的发音、句法等特征,其频率之高、程度之深,都是我们难以想像的。这就犹如黎明或黄昏时分的天际,因为各色云彩之间的无序过渡与重叠,我们不能够明确划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分界线。

关于方言的界限,法国学者加斯东·帕里斯(Gaston Paris, 1839—1903)有一段精彩的言说:没有真正的界限把北部的法国人和南部的法国人区分开来;我们民族的语言就好像一幅大地毯,从国土的这一端铺到那一端,它缤纷的色彩在每一点上都以极其细微的浓淡差异向前推移。

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1855—1930)在《英语方言词典》的前言中谈及伦敦方圆二十五英里范围内的方言,他指出:这些区域的方言已经混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对于语言研究而言,它们毫无价值。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语言界限的非在性。

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往往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借用外来方言或民族语,比方,源自广东省佛山地区的一个方言表达"无厘头",意即无能,在20世纪80年代被香港接受,到90年代末便逐渐被大陆南部大部分地区所接受。再比方,从20世纪末叶起,在中国大陆随时可以听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交流时总会夹杂着英语词汇,例如:hello, ok, fun, hacker(黑客), . com, AA制,IT行业,等等。更有英语句法结构的直接翻版。

例如:

我有去过那里。

请比较:

I have been there.

而两种方言或两种以上方言一地并存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比方,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省,荷兰语、英语、土语同时并存;在爱尔兰,既通行凯尔特语,又通行英语;在立陶宛,立陶宛语、波兰语和俄语并存;在香港,英语、粤语、汉语普通话并存。

最后,有语言波的存在。

语言的多样性与语言波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语言波就是施密德(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在《印度日耳曼人的亲属关系》(*Die Verwandtschaftsverhäl tnisse der Indogermanen*, 1877)所创立的连续性理论,通过一个中心点的辐射表现语言变化的扩展,即创新波(Wellentheorie)。这个理论是对施莱赫尔(Schleicher, 1821—1868)的普系理论(stammbaumtheorie)的有益补充和校正。索绪尔对此颇为推崇,他指出:

> 人们这才明白原地分割足以解释印欧语言的相互关系,不必假定各个不同民族已经离开它们各自的原方位;在各民族四处分散之前,可能而且肯定发生了方言的分化。因此,创新波的理论不仅仅使我们对印欧语史前史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且,它还向我们阐明了一切分化现象的基本规律,以及支配语言亲属关系的条件。[1]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传承施密德的创新波理论,索绪尔指出:

> 语言的扩展和内聚要归功于交际。交际有两种方式:有时是消极的,当创新在一个地方出现时,它加以遏止,以防止方言分散;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并推广这种创新,以促进语言的统一。正是这第二种交际形式证明应该用波这个词语来表示方言事实的地理界限;等语特征线就像是洪水涨落的最边缘。①

因此,时间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在地理分布上多样性,可以说,语言波推进的速度是语言多样性的显在因素。无论语言波何在,等语特征线何在,都离不开时间因素的介入。时间因素对语言空间上的多样性具有足够的解释力,而当我们触及语言创新原发点的时候,时间因素的解释力便得到充分的彰显。

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在创新的起源地与周边区域,对创新有两种态度,一是接受,二是拒绝。两者之间存在选择关系。而就接受或拒绝本身而言,又存在双向选择问题,一是地域上一致性的选择,二是时间上一致性的选择,也就是说,即便是接受或拒绝,也还有一个再度选择的问题。比方,在法国北部,a 之前的 c 和 g 所发生的语音变化: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36—237 页。

c ⟶ tʃ ⟶ ʃ	cantum ⟶ chant	(歌唱)
g ⟶ dʒ ⟶ ʒ	virga ⟶ verge	(细棒)

在创新起源地,这样的变化只发生在时间的轴线上,是时间因素的作用,而在创新点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先后都接受了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在法国北部地区,不同的语言集团都相继接受了创新点的语言变化,形成了创新波或语言波。这样的事实无疑有时间和空间的同时介入,即选择了与创新点地域上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不一致性。而其中的庇卡底则有不同的选择,它的方言拒绝了与创新点地域上的一致性,从而保持了在时间上与创新点的相对一致性。在 a 之前的 c 和 g 保持语音不变,比如,cat(猫)和 rescapé(死里逃生),等等。

以后,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6—1982)又更加通俗地将创新波进一步解释为平衡运动,是两种相反力量的不断结合:一种力量是保持平衡的倾向,另一种力量则是破坏平衡的倾向。语言系统内部的变化就是在不断破坏平衡而后又在被破坏了的平衡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另一种平衡的过程中发生的。

在索绪尔的时空观视界中,语言现象是有序地交织在一起的,时间与空间的同时作用使方言的存在具有了合法性。或者说,语言的地域特点与时代特点交织在一起,而语言地域的特点是语言多样性的表面现象,语言的时间特点则是语言多样性的本质所在。事实上,对于语言来说,地域只是起到一种承载的作用,所以,语言的多样性往往依托地域来构建时间上的种种特征。

索绪尔的时代盛行语言与自然融为一体，语言学界普遍欢迎来自自然科学界的成果：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进化论，解剖学家迈克尔（F. Meckel）的种系发生学，植物学家施莱登（M. J. Schleiden, 1804—1878）的普通植物学理论，等等。多数学者认为，外部环境影响植物、动物的内部组织，比方，土壤和天气会改变苹果果肉的组织结构，水温和水质会影响鳟鱼的骨组织和肌肉组织，等等。同样，语言的外部环境也会改变语言的内部结构，如词汇和句法，等等。人们通常认为将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截然分开是绝对不可能的。按照他们的观点，不存在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那么，居于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外部语言学核心地位的地理语言学的价值便遭遇贬损，索绪尔由地理语言学而构建的时空观自然难逃被遮蔽的命运。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研究者们就开始关注语言的变体，只是当时研究的范围限于希腊本土，因此没有得出通论性的学术成果。15世纪地理学的发展为语言的变体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尤其是在16世纪德国的阿庇安父子（Peter Apian, 1495—1552, Philip Apian, 1531—1589）解决了精确绘制地图投影技术问题之后，语言变体研究开始尝试用地图表述方言的位置、方言的交错与重叠，以及方言与方言之间的界限。学者们用地图界说方言，建立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异，把空间语境因素的相互关系联系了起来。18世纪的语言变体研究已渐入佳境，而其最高成就应当属于19世纪的学人。吉耶隆（Gilliéron）与爱德蒙（Edmont）合作拟定一份包括2000个词和句子的调查表，并以此为依据对高卢－罗曼斯地区的土话进行深入的调查，爱德蒙走遍法国大约650个方言点，记

录方言特征,并绘制相应的语言地图。他们共同编写的《法国语言地图册》(l'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堪称语言变体研究的典范之作,它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变体研究的奠基性制作。而率先使用方言学(Dialektologie)这一术语的是施达尔德(F. J. Stalder),他的两部著作《瑞士方言语汇试集——瑞士方言学要略》(1806)和《瑞士乡村语言,即瑞士方言学》(1819)为19世纪语言变体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后,施迈勒(J. A. Schmeller)就巴伐利亚方言进行专门的调查,编写了《巴伐利亚方言语法描述——附语样、故事、对话、歌曲、形象表达等等,以及这些方言的地理分布图》(1821)和《巴伐利亚方言词典》(4卷,1827—1837)。1843年,本哈迪(August Ferdinand Bernhardi)绘制出《德国语言地图》(1844),这些地图反应当时德语方言的主要区域,颇有史料价值,其中的不足之处后来得到了以温克尔(A. Wenker)为首的方言调查团的有力弥补,他们的成果是《北部和中部德国语言地图》(1881)。在1898年至1905年间,赖特(Joseph Wright)编辑出版了《英语方言词典》[①]该词典共六卷,收入了10万个词条。

在中国,时间与空间常常是相提并论的。例如:

>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
> (颜之推《音辞》)

---

① Joseph Wright. *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London. H. Frowde. 1896—1905.

古今异语,别国方言。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

(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声音之道,随天地转。岁差自东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之草木移接之变也。历代训诂、歌谣、小说,即具各时之声称。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音义杂论·方言说)

事实上,语言学较早指认了语言在地理上的多样性,并由此确立了语言学研究的最初形式,即比较。时间与空间原本是属于不同的两个范畴,但是,在语言这个问题上,两者表现出尤为密切的关系。尽管前人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客观地说,那些研究几乎都没有明确的体系化的构建,因此,它们难以具备普通理论价值。

索绪尔的时空观能够为语言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提供更为重要的研究观点及方法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时空观将揭开新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新篇章,时空观将成为语言学界的亮点。语言时空研究将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索绪尔的时空观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多大的范围内给我们带来有益的指导和启示,还有待研究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看,前景令人乐观。

首先,时空观是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忽视它的存在,我们便难以客观、完整地理解索绪尔,更不可能将这一可贵的理论体系科学地运用到周边学科领域。

其次,索绪尔时空观在其整个语言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构成外部语言学的基石。没有时空观的语言理论体系是不完备的。

最后,在索绪尔的时空观的引导之下,我们便能够在更为宽广的视阈中俯瞰整个地球上存在着的和曾经存在过的语言,在宏大理论知识结构中获得全新的方法论的启迪,在神奇的语言演变过程之中成就深刻而普遍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模式。

当我们从语系的制约中超拔出来并运用索绪尔的时空观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从历史上来看,英语是一种印欧语,但是英语的发音、语法等与印欧语相去甚远,它与苏丹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句法结构方面。如何解释不同语系之间的差异与同一语系内部之间的差异?是有质的区别,抑或只是概率上的差别?

重大科学模式的建立往往来自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爱因斯坦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中推出相对论,海森堡则从时间与空间关系入手,发现空间中存在的测不准原理,索绪尔则以时间与空间关系为出发点,追索语言多样性成因,揭示空间对时间的承载。

第五章　对曲解的质疑与分析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具有深刻的学术精神、鲜明的时代意识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它凝聚着我们阐释不尽的科学理念，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才因此有了持久的学术价值，历经数十载，它依然熠熠生辉，常读常新。由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无可遮挡的光芒，有些急功近利的研究者便开始经常性地向《普通语言学教程》索取名言、名句，就只言片语，展开随意性发挥。结果，将索绪尔的理论体系撕扯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而被这些研究者把玩过的索绪尔语言理论无可避免地完全地丧失了学术精神，丧失了学术力量，更丧失了它原有的普遍理论意义。最为常见的是：索绪尔关于言语体系中语言与言语的划分被曲解为无益的分裂，索绪尔的共时观与历时观被判定为纯粹的虚构，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被贬损为极端的臆断，索绪尔的时空观被全盘遮蔽，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体系的主导性文本《普通语言学教程》遭遇低俗的支解和肤浅的解读。其学理失衡，其学术失准，其学养失态。

我常常想，被精心研究了 87 年之久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何至于被恶俗败坏得如此不堪入目？索绪尔的理论体系何至于会处在被扭曲、被践踏的状态之中呢？犹如馆中病梅！尤其是对索绪尔理论基本概念的肆意败坏，在语言学界普通语言学研究领域，以讹

传讹何至于如此盛行? 而由此导致的令人极其遗憾的结果是:对索绪尔整个语言哲学思想本质的深度曲解。

依我个人的看法,造成对索绪尔扭曲的根本原因至少有如下数端:

其一,脱离文本,以断章取义替代整个文本的阅读,以高谈阔论替代清晰的界说,以随意的理解替代谨慎的研究;

其二,脱离索绪尔完整的语言哲学思想体系,只以当今学术语境中的若干权势话语为依托来认识索绪尔的语言观,并偏执地将索绪尔辩证统一的语言观念截断式地推向绝对化的极端;

其三,将索绪尔的创新思想囚禁在传统的认识论中,使之失去它本体的维度。

就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既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不堪一击的,既不是不可以修改的《圣经》,也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小学生习作。我以为,任何思想理论都是可以被反对、被批判的,但是,不可以被歪曲。而对自己尚未了解或完整阅读的语言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加以煞有介事的批判,我以为是无比滑稽的,更是非法的。理论的批判不可以没有历史的前提和文本的基础!

本章将对六个具有一定代表性且霸气十足的曲解提出质疑并进行分析。

曲解一: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最后一句话:"语言学的惟一、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是从语言本身也是为语言本身来考虑的语言。"并非出

自索绪尔。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开篇，索绪尔就区分并界定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导论部分明确指出：

> 必要时，人们可以给两门学科中的每一门保留语言学这个名称，而且还可以谈论一门言语的语言学。但是不应该把它与狭义的语言学混为一谈，后者是以语言为惟一对象的。
>
> 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后一种语言学，而且，如果我们在陈述过程中借助言语研究成果，我们将力求保持区分这两个领域的界线。[①]

由此，我们看到教程贯穿一致的思想：

对于《普通语言学教程》而言，真正的和基本的现实不是一种语言的个别事实，而是作为体系的语言。

> 语言学惟一、真正的对象是语言，是从语言本身也是为语言本身来考虑的语言。[②]

这一论点的提出为语言学的生存和发展寻得了一片独立、可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第266页。

靠的领地,它同时为语言学及周边人文学科、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以后,学者们发现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语言学不仅应该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和关系,言语也应该成为语言学的体面的研究对象,索绪尔所设想的言语的语言学已经在语用学、话语分析等等名称之下得到有益的研究和拓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索绪尔这一论点已经成为语言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它为后人提供了思考的起点和理论的依托。

可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研究的是狭义的语言学,即语言语言学,即普通语言学。我们不仅要声称它的最后一句话是出自索绪尔,而且还要证明这句话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灵魂所在,是语言与言语区分理论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对传统比较语言学的批判与扬弃,是现代语言学开创者大无畏的宣言。[①]

曲解二:

索绪尔强调共时语言学,排斥历时语言学,因为他没有看到语言历史的一面。

由于西方权势话语的影响,不少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共时语言学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历时语言学,也就是说,索绪尔提出的纯一、同质的共时语言学其实是不存在的,共时研究成果越高,对语言事实就偏离得越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索绪尔忽视历时语言学,没有看到语言历史的一面。

---

① 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其实，索绪尔的共时观使得以后的学者能够有效地把握言语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同时得以排除同质系统以外的异质事实。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鼎盛时期提出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对立并存，这是索绪尔的哲学勇气，更是索绪尔的创新智慧和大师风范。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是历时语言学的基础与根本，没有扎实的共时语言学，便无所谓历时语言学的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历时语言学需要共时语言学的理论支撑。索绪尔不仅看到了语言历史的一面，而且还看到了它的根本弱点所在，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正因为有了这份深刻、这份智慧，他才能够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提出了深刻的批判。①

我们很难想像一位语言哲学思想家会看不到常人所能看到的语言事实。而有些研究者还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还没有足够的学术理据，就带着某些权威的只言片语，匆忙上阵，对索绪尔这位现代语言学奠基人进行无的放失的批判，这当然只会让这些所谓的批判者捉襟见肘，令人贻笑大方。甚是遗憾！

曲解三：

索绪尔虚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

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关键点在于：概念与音响形象之间的联系。请看索绪尔的陈述：

①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和第四章第三节。

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用符号是想指认从符号施指到符号受指的联合所产生的整体,所以我们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所以“姐妹”(sœur)的概念与用来做它的符号施指的 s-ö-r 这个声音系列没有任何内部关系;也还可以用其他任何声音来表示它:语言之间的差别以及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bœuf)这一符号受指在国界的一边有 b-ö-f 做符号施指,而在国界的另一边则有 o-k-s(Ochs)做符号施指。[①]

有研究者以汉文字举证,反驳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观。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索绪尔所指认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概念与音响形象之间联系上的任意性,而从文字举证反驳,以汉语中汉字书写形式与意义结合的规定性作为基本出发点,这本身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谈问题,失去了探讨问题所应有的相关性原则。面且,我们都知道汉语的说与写曾经是分离的,不像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汉文字有一个以表形字为主体的历史阶段,即使发展到以形声字为主体,也很难找到纯粹的表音文字。与此同时,汉文字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字形构造演进过程。显然,无论是以宋代王圣美的“其类在左,其义在右”,还是以王念孙等人的“引申触类,不限形体”,都无从反驳索绪尔的符号任意理论,毕竟这些都是在文字书写形式与意义结合的层面,与索绪尔的任意理论的出发点实在是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相去甚远了。

另外,针对索绪尔"也还可以用其他任何声音来表示它"这一断言,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索绪尔撇开了法语中现实的具有历史继承性与系统性的音义结合,而代之以玄虚的"也可以",他们主张只要加以溯源,就可以弄清楚"姐妹"和 s－ö－r 这串音节之间的联系,因为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的结合毕竟是历史地形成的,并处于某一系统之中。

事实上,我们汉语中有大量的例证可以说明"也还可以用其他声音来表示它"。比方,"母亲"这一概念与 mǔqīn 这个声音系列的结合。在清朝《冷庐杂识》中有这样的记载:《尔雅》称母亲为"妣"(bǐ),《诗经》称母亲为"母氏"(mǔshì),《北齐书》称母亲为"家家"(jiājiā),《汉书》列侯子称母亲为"太夫人"(tàifūrén),还有,帝王的母亲称"太后"(tàihòu),官员的母亲称"太君"(tàijūn),普通百姓的母亲称"妈妈"(māma)。这些音响形象与"母亲"这一概念没有天然或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一物多名"或"异名同时"只是历史或区域的选择,那么,历史或区域为什么偏偏选择此而非彼呢?再比方,我们中国人可以说"世贸组织",也还可以说"WTO";我们可以说"好",也还可以说"OK";我们可以说"胶片",也还可以说"菲林";我们可以说"电子邮件",也还可以说"伊妹儿";我们可以说"弹簧锁",也还可以说"斯普林锁",等等,等等。

此外,即便是文字符号也有它根本上的绝对任意性。字母 A 与它所表示的声音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汉字"爱"这个书写形式与它所表示的声音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可以被证明的必然的联系,更不消说,在"爱"(ài)的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有任何必然的

联系了。而在网上虚拟空间流行近十年的言语事实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语言符号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所存在的绝对的任意性:

GG = 哥哥
MM = 妹妹
很 HIGH = 很高兴
东东 = 东西
2oo = 动物园
:) = 微笑

尽管如此,我们恐怕还是不可以声称:汉语中有如此的历史继承性与系统性的音义结合。事实上,选择本身归根结底是任意的,这里不存在任何合理的规范,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外部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符号的发展及演变加以客观的描述,而任何从内部语言学的角度对符号任意性的反证都是徒劳无益的。[①]

曲解四: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并非出自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二部分第四章第四节的最后一段指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②]

---

① 参阅:本书第四章第四节。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请看索绪尔的陈述：

语言对思想的独特作用并不是为了观念的表达而创造出一种物质声音手段，而是充当思想和声音之间的媒介。思想和声音的结合必然导致各个单位之间彼此划清界限。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本质混沌的思想在分解后势必变得明确起来。因而，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化，也没有声音的灵化，只关涉到有点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包含着区别，语言在两个无定形之物之间形成时，便制定出它的单位。我们设想空气与一大片平静的水面接触：如果大气的压力发生变化，水面就会分解成一连串的区分，即波浪；正是这些波浪的波动使人产生这种结合的观念，也可以说，思想和声音物质的组合。

还能把语言比作一张纸：正面是思想，反面是声音；我们切开正面的同时就切开了反面。语言就是这样，我们不能使声音脱离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脱离声音。只有经过抽象才能使它们彼此分离，其结果则是创立纯心理学或纯音位学。

那么，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两个范畴的要素彼此结合的交界处；这种结合产生形式，而不产生实体。①

依我个人的看法，"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这一论断是索绪尔极富创见的语言观。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5页。

首先,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俯瞰语言所联结的两个领域——思想与声音——的混沌与无序,而且更能引导我们从本质上指认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实际存在——用什么思想来贴合什么音段?用什么音段来表示什么思想?倘若不是借助语言符号,我们就无从区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观念,思想是游移不定的,声音也是难以捕捉的,两者都是不确定的存在物,恰恰是语言符号链接于其中,使它们彼此贴合,形成明晰的体系。

其次,就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一论断使索绪尔能够从当时流于一般的研究方法中超拔出来。索绪尔不是从单个的辞项入手,不是以辞项的堆砌获得系统,而是与此相反,从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通过分析得出整体所囊括的要素,正是借助整体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各个要素才获得了给定的价值与功能,从而避免了原子主义之谬,因此得以指认语言状态中的横向组合关系和关联聚合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断言改变了语言研究的结构。正是从这个出发点,索绪尔才得以建立语言的关系系统,有效地将语言学引向形式、关系和系统,藉以高屋建瓴,反观本源、实体、主体等传统命题。索绪尔指出:

> 横向组合关系是显在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同等地出现在实际系列中的辞项为基础。相反,关联聚合关系却把潜在的辞项结合在一个虚拟的记忆系列中。[1]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以后的研究者从索绪尔这一论点得出重要的启示：语言形式的物理特征本身不具有语言学意义，重要的是它们在体系之中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

最后，这一论断在方法论上给予传统语法学极大的促进，传统语言学强加给传统语法的形态学、句法学和词汇学界限混沌的状态得到有效的清理，语法研究自索绪尔之后就开始尝试将一切语言事实归入横向组合和关联聚合这两种关系之上，并纳入整体组织系统之中。研究视阈扩展，研究对象得以明确。

总之，"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是索绪尔理论的重要且必要的逻辑基础。

哥本哈根学派对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的理论加以发展，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把抽象形式关系系统加以细致的分类和解析，并提供了一个非常严谨的概念和方法体系，[①]索绪尔的观点在这一领域被发挥到极致。叶尔姆斯列夫注重内容形式与表达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将语言的形式与实体拓展为四个层面：内容实体(content substance)、内容形式(content form)、表达形式(expression form)、表达实体(expression substance)，进而为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的精确描写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曲解五：

索绪尔割裂了语言和言语。

---

① 参阅：Louis Hjelmslev. *Essais Linguistiqu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1.

大约20年前,西方开始出现抨击索绪尔的论文,认为他过于强调语言与言语的区别,以致割裂了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的理论因此而落入极端与矛盾的泥潭。

关于语言和言语,索绪尔有十分精湛的见解,他不仅深刻地阐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蕴关系,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言语和语言对言语体系的契合机制和支撑作用。

索绪尔指出语言和言语是:

> ……彼此紧密相联的,而且还是互为前提的。言语要能让人理解并产生它的所有效果,那语言则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创建语言,言语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上来看,言语的事实总是领先的。倘若人们不是首先在言语行为中意外发现观念和词语形象的结合,人们又怎么能够想到这种结合呢?另外,由于听到了别人说话,我们才学会了自己的本国语;它要在数次的感受之后才能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之中。最后,是言语推进了语言:是听到别人说话时所获得的印象改变了我们的语言习惯。语言和言语因而是彼此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①

索绪尔全面透视了言语体系中的语言和言语,不仅对两者作了严格的学理上的界定,而且还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不可分离的关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系进行了分析：它们相互依存，同时又处在彼此体现的关系中。这样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的普遍性。

可见，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不是为了割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创立言语体系理论的需要来对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分别进行独立、深入的研究。《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在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时，索绪尔承诺以后要专门讲授言语的语言学，然而，他终因疾病而太早地离开了他的学生，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认为索绪尔从来就没有割裂语言与言语。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索绪尔是否留下了言语的语言学著作，而在于他为语言学界乃至思想界留下的体系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①

索绪尔的语言观，尤其是对于真正读懂并在实践中加以有效运用的学者来说，决不仅仅是若干术语、若干二元对立、若干二元互补等套语，它是科学化、体系化之中严整的分类、严格的界定和深入的考证。

曲解六：

《普通语言学教程》已经过时，必须超越索绪尔。

正当语言学界以外的学科日益重视并运用索绪尔理论的时候，语言学界内部却偏偏有研究者提出：《普通语言学教程》已经过时，必须超越索绪尔。其出发点令人难以琢磨，因为对于究竟什么是超越、应当怎样超越、超越的理论依据和资源，以及超越的目的

① 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与前景,在还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学术上的相关阐述之前,口号式的权势话语似乎还不足以产生科学研究所应有的魅力。

在我看来,就目前的学术现状,提出"必须超越索绪尔"应当是慎之又慎的。

其一,"超越"是有内涵的。它首先要求超越者有能力站在索绪尔的理论高度,因为超越索绪尔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索绪尔深层次的肯定,如果否定或彻底地否定索绪尔,就没有超越这一说。"超越"应当是学术理念上的嬗变,是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重新定位和对语言学历史的深刻再认识。它应当是体系化的、理论化的,而不是拘泥于锁碎细节或只言片语的。它还应当是在抽象和思辨的理性视阈中寻得的一种"现实"。我们有理由期望类似于突破传统哲学一样的冲击,诸如胡塞尔的现象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超越索绪尔"应当是在语言学层面上的发现、哲学层面上的创建以及观念层面上的突破。

也就是说:

其二,"超越"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超越"应当受制于超越对象的理论资源。倘若真的要"超越索绪尔",那么,首先应当考虑对索绪尔理论本身的认识和体悟,这里当然包括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定位、哲学的范式、语言学的视野、历史的维度等等方面的理解。缺乏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本身的深人研究,缺乏对索绪尔理论产生的背景资料研究,缺乏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文本研究,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超越"的视野。所以,只有在理论的历史和成就中进

行语境化的学术思辨，才能实现理论本身与时俱进，才能实现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渐进式超越。另一方面，"超越"应当立足于解决语言学的问题，也就是说，"超越"是以发现问题为前提的，只有当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不再能够解释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现的有意义的语言问题的时候，超越才是有实际价值的。如果仍然以索绪尔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哪怕是理论体系中某一细节的分支理论的具体运用，那么，都不能也不应该奢谈"超越"。没有这样的出发点，"超越"的目的就是值得怀疑的，果真如此超越，"超越"只会成为某些华而不实者的标签，这支标签，正面写着"做秀"，反面写着"无知"。

语言学需要在理论资源和理论问题的互动中进行实实在在的超越，这是常识。惟其如此，"超越"才能获得"现实感"。

其三，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索绪尔研究的是普通语言学，即语言的语言学，它表现为体系化和抽象化，它与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形成对照。索绪尔的原创精神在以后的演进过程中导致结构主义理念的兴盛，具有扬弃细节、崇尚体系等等特征，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语言学不再满足于诸如理性的思辨、体系的抽象等定位，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语言在现实中的交往与存在、在现实中创造的价值和实践的意义，这是在向语言符号存在的实际价值的一种理想回归，说它是一种理想的回归，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回归，它是一种进步，它充满个性且丰富多彩，有的人因此而兴奋地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已经过时了，20世纪末的语言学是对索绪尔的绝对超越。殊不知这语言学的发展恰恰是应合了索绪尔所

设想的"言语的语言学"。[1] 这正是索绪尔理论伟大生命力所在。

要穷尽索绪尔这位大师深邃的语言理论恐怕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完成的。

20 世纪中期,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一经抛出,"索绪尔学说行将就木"几乎成为世界,尤其是美国语言学界一致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趣且不能自主的拾人牙慧者对这种言论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形成一种小集体性的癫狂,一时间,学术道德缺失,判断力减弱,反对索绪尔理论和索绪尔学说成了语言学更革、创新的头一个风向标,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趋之若鹜的时尚。结果有的人一味地凌空蹈虚,以东拉西扯的打补丁方式努力将自己学术上的轻浮、无知与恣意的想像加以非法的合理化;有的人提供了极不充分且满目疮痍的批判文稿,学术理念模糊、哲学背景缺乏,希腊神话中普罗克汝斯忒斯一般,不惜对索绪尔的理论进行"截肢",以适应他们的"革新"与"创见",而且很有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作派,我遗憾,竟是这般不具有追索真理、面对事实的清醒,却大有浮躁之后的自得、亵渎之后的欣然、拾人牙慧的快感和歪曲之后的满足。然而,糟糕的是,有的批判者却因此而处于一战即败、被动无比的尴尬境地,借用一句俗话:像吞噬自己尾巴的蛇,最终只能打成一个死结,没有一条活路可走。我以此表示对这种浅薄、时髦赝品的睥睨、对语言学界唐吉·诃德的遗憾。

---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5 版),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0—22 页。

我以为，一个严肃的批判者至少应该是清醒的、锋锐的、执着的、彻底的。

我相信，和其他科学理论学说一样，索绪尔理论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充实、更新，但它永远不会屈服于轻浮与扭曲，更不会向庸俗与无知献媚。

后　记

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版)的翻译到《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的完成,我得益于各位导师、学长的教导。没有与他们的交流,我恐怕写不出这本书。

王希杰先生认为,中国学界对索绪尔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他希望我能传承方光焘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广泛研究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相关资料,写出自己的见地,不辱南京大学"索绪尔研究大本营"之名。他对我一直寄予厚望。

哈佛大学语言学系的久野暲(Susumu Kuno)先生则劝我尽可能不要去研究索绪尔了,他认为,索绪尔热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而凭着我的语言学理论功底和对语言的感受力,我应该是语言学批判阵营中出色的一员。久野暲先生是乔姆斯基最强劲的对手、最具实力的挑战者,尽管他们俩私交不错。因为他,我曾有过短暂的犹豫。

是陆国斌先生与我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他精彩的思辨让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该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当我结稿重读时,我发现这部书稿处处折射出他掷地有声的言说、严肃而善意的批评以及不失时机的鼓励与赞扬,只是不知道从这些看似陌生的字里行间他是否还能指认得出他所给予的指导与赏识。

一直在关注我的师长、学兄、至友、至亲总让我觉得他们一如既往,仍然在期待,期待我还有话要说,还有文章要写、还有书要著。这本书连同我的感激一并奉献给他们。

本书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K3－027)成果。希望本书能配得上各位专家的提携。

裴　文

2003年2月15日

于南京大学

附录一：人名索引

A

阿庇安，比特（Peter Apian，1495—1552） 221

阿庇安，菲立浦（Philip Apian，1531—1589） 221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205

1908— ，当代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和《列宁与哲学》等。

爱德蒙（Edmont） 221

奥尔特拉马雷（Paul Oltramare） 74

奥斯特霍夫（H. Osthoff） 75，114

B

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58，205

1915—1980，结构主义思想家，法国著名作家、批评家、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1967）梳理出源于语言学的符号学基本概念以外，同时揭示了符号学的主要任务及其发展方向。他才华横溢，著有名闻遐尔的《写作的零度》、《神话集》、《S/Z》、《恋人絮语》，等等。

巴依（Charles Bally） 62，156

1865—1947，瑞士语言学家。与薛施蔼合作编写了语言学世界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著有两卷本《法语风格学》（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1909），发表《什么是符号》（Qu'est-ce qu'un signe? 1939）、《共

时态与历时态》(Synchronie et diachronie, 1937)等多篇论文。

保罗(Hermann Paul) 12, 29, 52, 80, 114

1846—1921,德国语言学家。新语法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代表作为《语言史原理》(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1898)。

葆朴(Franz Bopp) 107, 118, 165

1791—1867,德国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典范之作均为多语种语法系统比较。曾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教授。

本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87

1901—1976,法国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派成员。在印欧比较语法和普通语言学两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曾发表《语言符号的性质》(Nature du signe linguistique, 1939)、《普通语言学近期趋势》(Tendances récente en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54)等多篇论文,出版《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66)。

本哈迪(August Ferdinand Bernhardi) 30, 222

德国语言学家。语法学大家。创建性著作为两卷本《语法》(Sprachlehre, 1801, 1803)和《语言学基础》(Anfangsgründ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805)。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14

约公元前580—约前500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是西方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人。倡导神秘主义哲学。其著作已全部散失,其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偶有保留。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an Niecislaw Baudouin de Courtenay) 143, 147, 163

1845—1929,波兰语言学家。长期在俄国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俄国喀山学派的创始人。持客观心理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心理社会现象,认为语言学属于心理社会科学。提出语言的系统性、语言的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的概念建立音位和语音交替学说,为现代音位学先驱之一。著作颇丰,撰写《语言学与语言综述》(Some General Remarks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等大量论文,所有有关普通语言学的重要论文都一并收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普通语言学文集》(1972)。

伯尔盖纳(A. Bergaine) 75

法国语言学家。

柏格森(Henri Bergson) 238

1859—1941,法国语言学家。

柏拉图(Platon) 10, 14, 92

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派的创始人。受业于苏格拉底。在雅典创建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是理念论。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大量著作传世的哲学家。留下《理想国》、《斐多篇》、《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法律篇》等三十余部对话体哲学著作。

波依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94

约480—524或525,古罗马晚期哲学家。折衷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学说。首次提出共相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后成为经院哲学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点。

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 107

1802—1887,德国语言学家,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据印欧语言新属词发音对应关系,创立现代词源学。主要著作有《印度-日耳曼语言领域内的词源研究》(1833-1836)。对南非、爪哇、日本、吉普赛等诸多语言进行过普遍性研究。

布劳纳(W. Braune) 75

布勒阿尔(Michel Bréal) 77

1832—1915,法国语言学家,生于德国,犹太人。历任法兰西学院教授、高等教育总督学、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部主任、法兰西金石学和文学院院士。著有《语义学探索》、《略论法国的教育》,编纂《拉丁语词源词典》。

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87, 157

1887—1949,美国语言学家,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其代表作为《语言》

(Language, 1933)。其主要论文收人《布隆菲尔德文集》(1970)。

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 75, 87, 114

1849—1919,德国语言学家。

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148

1838—1917,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现象学先驱。历任符兹堡大学教授、维也纳大学教授,培养了一批诸如胡塞尔、迈农等学有所成的学生。在哲学上,提倡"回到亚里士多德",认为有非物质的个人灵魂存在。在心理学上,强调精神过程就是动作,并认为动作随情感而发。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世界观》、《从经验角度看心理学》、《心理现象的分类》,等等。

D

达尔文(Robert Charles Darwin) 2, 220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他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在生物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1859 年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接着出版了续篇《动物和植物在驯化下的变异》(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1868)、《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1871)、《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等三部著作,对《物种起源》的理论进行全面而详尽的阐释,为生物学、神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的传授理论奠定了基础。

戴震 47

1723—1777,清思想家、学者。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深人研究,又精通古音学,创立韵类正转旁转之说。他从分析《广韵》系统人手,区别等呼洪纲与韵类异同,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人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有重要贡献。著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其著述辑人《戴氏遗书》。

但丁(Dante Alighieri) 105

1265—1321,意大利诗人。极具天赋,又非常勤奋。他的作品反映中世

纪后期意大利社会生活,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代表作为《神曲》。他的《论俗语》主张意大利须有标准的民族语言,对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德尔布拉克(B. Delbruck) 114

1842—1922。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57, 205

1930— ,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字与语言结构的关系。主要著作有《文字语言学》、《文字与区分》、《绘画中的真实性》等等。

德谟克利特(Dēmocritos) 14

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古希腊哲学家,与留基伯并称为原子论的创始人。写有大量著作,几乎涉及知识的所有领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其著作基本失传。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01, 144

1596—1650,现代理性主义之父。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论世界》,等等。

多罗车斯基(Witold Doroszewski) 156

1899—1976。

E

恩格勒(Rudolf Engler) 69

1930— ,瑞士语言学家。日内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主攻普通语言学。著有《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理论与批评》(Théorie et critique d'un principe saussurien:l'arbitraire du signe)、《再论任意性》(Compléments à l'arbitraire)等多篇重要论文。在索绪尔研究中的重大贡献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 Critique par R. Engler)。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5, 7

1820—1895,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其主要作品为《自然辩证法》(1876)

和《反杜林论》(1878)。

F

伐特(Johann Severin Bater) 127
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és) 26, 153
1875—1960,法国语言学家。其代表作为《语言》(Le Langage,1921)。发表《论静态语言学的任务》(Sur les tâches de la linguistique statique, 1933)、《命名论》(Sur la dénomination, 1952)等多篇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方光焘 117, 153
1898—1964,中国语言学家,中国语法学的革新者。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终生致力于介绍、研究国外语言学,并将国外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言语事实中的广义形态。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基本收入《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1997)。
冯特(Wilhelm Wundt) 38
1832—1920,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构造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心理学体系包括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这两个主要部门。前者运用内省法来分析构成意识的元素及其合成规律,否认独立存在于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后者从语言、神话和风俗中寻找普遍的心理定律,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主要著作有《生理心理学原理》、《心理学大纲》、《民族心理学》,等等。
费尔堡(P. A. Verburg) 62
弗雷格(Gottlob Frege) 133
1848—1925,德国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任耶拿大学教授。《概念演算》一书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
富尔(Léopold Faure) 75
浮士勒(Karl Vossler) 156
1872—1949,德国语言学家。唯心主义新语文学的代表,出版《文明中的语言精神》(The Spirit of Language in civilization, tr. by Oscar Oeser,

1932)等多部著作。

G

戈德尔(Robert Godel) 60、67

1902—1984,日内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继巴依之后主持日内瓦学派的工作。对索绪尔理论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成果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稿本溯源》(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1908—1909,导论》(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8—1909, Introduction)、《索绪尔学派新文献》(Nouveaux documents saussuriens)。

戈蒂耶(Léopold Gautier) 68
格拉蒙(Maurice Grammont) 77, 159

1866—1946,法国语言学家。社会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学术著作为《语音学论》(Traité de phonétique, 1933)。

格里木(Jacob Grimm) 107, 109

1785—1863,德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著有《德语语法》、《德语史》,首创编纂《德语词典》,提出印欧语系语言演变规律,世称"格里木定律"。另与其弟威廉·格里木合作收集民间童话,汇编成书出版,闻名全球。格里木又译格林。

H

哈斯(W. Hass) 74

著有《语言描写中的零》(Zero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 1957)

哈里斯(James Harris) 103

1709—1780,英国思想家。著有《交流技艺之神赫耳墨斯,即关于语言和普遍语法的哲学探究》(Hermes: o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1751)

哈里斯(Roy Harris) 60

英国语言学研究者。索绪尔研究专家。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28

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什么是形而上学》、《林中迷途》,等等。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1, 23

1744—1803,德国批评家、哲学家及路德派神学家,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他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成为德国文学上狂飙突进运动的基础。他的重要著作有《论语言的起源》(U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1770)、《人类教育的又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 1774)、《论人类进展》(Brief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1794—1797),等等。

赫尔伐士(Panduro Lorenzo Hervas) 106

1735—1809,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专心致力于搜集各类语言资料,并为土著语言编写语法。

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07, 145

1770—1831,德国哲学家,辩证法大师,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创立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极大地发展了唯心辩证法。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

亨利(Victor Henry) 144

1850—1907,法国语言学家。著有《语言的悖论》(1896)。

胡塞尔(Edmund Husserl) 238

1859—1938,德国哲学家、数学家。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维也纳大学数学博士。曾任哥廷根大学教授、费赖堡大学教授。他的学说是存在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主要著作有《逻辑研究》、《纯粹现象学观念》、《形式逻辑与超验逻辑》,等等。

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27, 148, 186

1827—1894,美国语言学家、梵语学者。著有《语言的生命与成长》(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1875)、《梵语语法》(A Sanscrit Grammar, 1879)等著作,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洪堡(W. von Humboldt) 24,52,80,107

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之父。著述颇丰。在政治学、美学、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贡献卓越,尤其在语言与思维、普通语言学方面著述最多。影响较大的是三卷本《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其主要论文辑入十七卷本《威廉·冯·洪堡文集》。

胡布斯曼(H. Hübschmann) 75

霍尔(R. A. Hall) 32

霍尔德(W. Holder) 101

英国语言学家。撰写《言语要素》(1669),制定发音的一般理论,认为言语取决于闭合度和开张度的交替。

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 187

1919— ,美国语言学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后期的杰出代表。主要著作有《当前水平》(The State of Art, 1968)和《语言的起源》(The Origin of Language)。

J

吉耶隆(Gilliéron) 221

加德纳(Allen Henderson Gardiner) 82

1879—1963,英国语言学家,著有《话语和语言理论》(The Theor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1932)。发表论文《话语与语言的区别》(The Distinction of Speech and Language, 1935)、《论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分析》(De Saussure's Analysis of the "signe linguistique", 1944),等等。

金敦(R. Kingdon) 45

K

康德(Immanuel Kant) 107,145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历任柯尼斯堡大学编外讲师、王室图书馆副馆长、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校长,柏林科学

院哲学部主任。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这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国哲学界研究的重要科目。主要著作有《宇宙发展史概论》、《纯粹理性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等等。

科恩(Marcel Cohen) 156

1884—1974,法国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受业于梅耶。巴黎大学教授。对法语和闪含语系有深刻研究,并很早就开始致力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所著《言语活动的社会学素材》特别强调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影响。另著有《语言及其结构和发展》、《法语史》、《闪语动词》,等等,并与梅耶一起领导和组织《世界的语言》编写工作。

科尔纳(Konrad Koerner) 117

克鲁舍夫斯基(Nikolai Kruszevski) 188

1851—1887,波兰语言学家。

克律(Francis de Crue) 77

孔德(Auguste Comte) 149,164

1798—1875,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西方社会学创建者。孔德的学术思想主要由五个方面构成:实证主义、三个阶段说、科学的分类法以及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其主要著作有六卷本《实证哲学教程》和四卷本《实证政治体系》。

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3,15

1715—1780,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是百科全书派创立知识体系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论人类知识的起源》(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1746)、《感觉论》(Traité des sensations, 1754)、《体系论》(Traité des systèmes, 1749)、《逻辑学》(La logique, 1780,逝世以后出版)及迄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计算的语言》(1798),此书强调语言在逻辑推理中的重要性。

孔斯唐丹(Emile Constantin) 60,68

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学生,他将完整的课堂笔记奉献给索绪尔研究者,对索绪尔研究作出了贡献。

库尔蒂乌斯(G. Curtius) 74

库珀(David Cooper) 101

英国语言学家。提出从语义切入,重新划分语法范畴。

L

拉波夫(W. Labov) 172

1927— ,美国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创始人之一。

拉康(Jacques Lacan) 157,209

1901— ,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代表之一。主要研究现象学和黑格尔哲学。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研究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结构与语言结构有着相类似的规则。精神分析的方法就是通过患者所讲述的症状,推测和揭示出在无意识结构中被压抑的病因。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其主要著作为《超越现实原则》和《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

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8

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

拉梅(P. Ramée) 99

1515—1572,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哲学家、语法学家、结构主义先驱。

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 107

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著有《冰岛语,即古挪威语导论》(1811)、《古代北欧语,即冰岛语比较研究》(1818)。

莱昂斯(John Lyons) 187

英国语言学家。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2,29,105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广博的才华影响到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神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他的思想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中期的德国知识界占主导地位,其科学思想的影响声震遐迩,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又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笔耕不止,留下大量尚待整理、出版的手稿。

莱斯琴(S. August Leskien) 75,87,114

1841—1916,德国语言学家。

赖特(Joseph Wright) 218

里德林热(Albert Riedlinger) 62

索绪尔第二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学生,协助巴依和薛施蔼完成《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现代语文学的奠基之作。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57,205,209

1908—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刘师培 3,14

1884—1920,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继承家学,精通文字学、训诂学,多有建树。主张以字音推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其著述辑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

卢卡契(György Lukacs)

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曾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纳吉政府文化部长。他用生命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对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历史和阶级意识》、《美学》,等等。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4

1712—1778,对人类生活产生多方面影响的瑞士哲学家和文学家,他将政治思维和伦理思维推向新的方向,他的思想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和浪漫主义的诞生。他的经典著作有《论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 1761),等等,他最盛行于世的小说是《新爱洛绮思》(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0),他的个人自述《忏悔录》(Confessions, 1781—1788)影响遍及全世界。

鲁莱(E. Roulet) 156

罗伊希林(J. Reuchlin) 99

德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古典文化专门研究者。他的著作《基础希伯来语》(De rudimentis Hebraicis, 1506)拓展了整个欧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33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出逻辑原子主义和中立一元论学说。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曾对20世纪的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哲学原理》、《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西方哲学史》、《论教育》,等等。

M

马蒂(Anton Marty)　143

瑞士语言哲学家。

马丁内(André Martinet)　83,157,173

1908—　,法国功能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派成员。著有《语音变化的结构》(L'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 1955)、《普通语言学原理》(Elementi di linguistica generale, 1960),等重要的语言学著作。

马萨瑞克(Tomas G. Masaryk)　133,142

1850—1937,捷克斯洛代克政治家,曾出任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1918—1935)。著有《具体逻辑研究:科学的分类和组织》(Versuch einer concreten Logik: Classification und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en, 1887)。

马泰休斯(Vilém Mathesius)　84

1882—1945,捷克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奠基人,布拉格语言学派领袖。在捷克最早从事共时研究,以语言特征学的理论与实践而著称。其功能句法及功能语言学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迈克尔(F. Mechkel)　220

解剖学家。

毛罗(T. de Mauro)　70,77

意大利语言学家。索绪尔研究专家。

梅耶(Antoine Meillet)　77,153,156,186

1866—1936,法国语言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在印欧语系诸语言研究方面贡献卓越。认为语言发展的原因是心理的和社会的。他是社会学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为《印欧语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1903)。
孟子　37
约前372—前289,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人。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有“亚圣”之称。其学说对历代的儒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著作有《孟子》。
米勒内(Millenet)　74
苗力田　39,135
中国学者、批评家,西方哲学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之一。
莫白迪(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5
1698—1759,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曾为巴黎科学院院士(1731),柏林科学院院士(1741)及院长(1745—1753)。其论文涉及多门学科,其中《论人类表达思想的不同手段》(1754)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
莫里斯(C. W. Morris)　160
美国哲学家。创建语用学理论。

N

诺伦(Aldof Noreen)　143
瑞典语言学家。

P

潘尼尼(Pā ṇini)　27,92
公元前4世纪—去世年代不详,古印度著名语言学家。其代表作为《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公元前600—前300)
帕里斯(Gaston Paris)　216
1839—1903,法国语言学家,对方言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培根(Francis Bacon)　100
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主张用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方法整理感觉材料,对归纳法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因而被认为是归纳逻辑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与发展》、《新工具》、《新大西

岛》,等等。

蓬蒂(M. Ponty)　157

皮克戴特(Adolph Pictet)　73

语言古生物学创始人。

Q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31,83,159

1928—　,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创始人。出版《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 1957)提出了与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转换生成语法,由此掀起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并形成了西方语言学的重要流派。

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43

1874—1965,英国首相(1940—1945,1951—1955)。保守党领袖。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国民族史》,等等。

S

萨特(Jean Paul Sartre)　238

1905—1980,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博士。曾留学德国。1964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接受。主要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主要文学作品有剧本《苍蝇》、《涅克拉索夫》,等等,有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厌恶》,等等。

萨丕尔(Edward Sapir)　21,31

1884—1939,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是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语言》(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1921),另一部重要专著是关于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变迁的《美国土著文化的时间观》(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Method, 1916)。

舍勒(Max Scheler)　238

1874—1928，德国哲学家。哲学人本学创始人之一。在伦理学上倡导价值伦理学。主要著作有《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价值伦理学》、《同情的本质与形式》、《宗教的复兴》，等等。

施达尔德（F. J. Stalder） 221

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 220

1804—1878，德国植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著有《植物学概论》，等等。

施来赫尔（August Schleicher） 28，111，118，218

1821—1868，德国语言学家。比较语言学集大成者。最著名的著作是《德语》（Die Deutsche Sprache，1869）这部通论，其代表作为两卷本著作《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i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1861，1862），这是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中期的代表作。

施勒格尔，阿（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07

1767—1845，德国学者、批评家，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思想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东方学者，诗人。致力于莎士比亚翻译，译成十四个剧本。曾与其弟合作创办的《雅典娜神殿》季刊（1798—1800）一度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喉舌。1820—1830年，在波恩出版《印度文库》三卷。创办梵文印刷厂，在德国建立起梵文研究。

施勒格尔，弗（Friedrich von Schlegel） 107

1772—1829，德国语言学家、作家、文艺批评家。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启蒙者。与其兄合作创办了《雅典娜神殿》季刊（1798—1800），认为希腊哲学、文化对于全面的教育极有必要。1804年以后在巴黎研究梵文。著有《论印度人的语文和智慧》（U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umskunder，1808），为比较印欧语言学的初次偿试，也是研究印度语言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起点。

施迈勒（J. A. Schmeller） 221

施密德（Johannes Schmidt） 218

1843—1901，德国语言学家，创立连续理论，即语言波理论。

施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2

1823—1899,德国语言学家。其代表作为《语法、逻辑和心理学:其原理及相互关系》(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Ihr Prinzipi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einander, 1955)。

舒哈特(Hugo Schuchardt) 169

1842—1927,德国—奥地利语言学家。曾任哈勒大学、柯拉茨大学教授。"词与物"学派的创立者。反对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语音规则绝对性,撰文与之商榷;批评"谱系说",提出"语言融合"的观点。著有《民间拉丁语元音系统》、《罗曼语与凯尔特语》、《斯拉夫德语与斯拉夫意大利语》,等等。

斯卡利格(J. J. Scaliger) 105

斯留萨列娃(Н. А. Слюсарева) 60,71

1918— ,俄罗斯语言学研究者。索绪尔研究专家。

苏斯米希(J. P. Sussmilch) 10

1708—1767,普鲁士科学院院士。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28,52,73,117,136

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历任巴黎高等研究学院讲师(1881—1891),日内瓦大学印欧语言学和梵语教授(1901—1913),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1907—1913)。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被视为20世纪语言学的新起点。

T

塔尔德(Gabriel Tarde) 149

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法学家,心理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司法部刑事统计局局长、法兰西学院教授。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以发明与模仿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现象。主要著作有《比较犯罪论》、《模仿规律》、《社会规律》,等等。

汤姆逊(Wilhelm Ludvig Thomsen) 16

1842—1927,丹麦语言学家。

特拉格(George L. Trager) 31,45

1906— ,英国语言学研究者。

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 92

特鲁别茨柯依(Nikolai Trubetzkoy) 84,157,205

1890—1938,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斯拉夫语言学家,他以《音位学原理》(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1939)奠定语言结构分析,尤其是语音分析的理论基础。他深受索绪尔的影响,又继而影响了雅柯布逊对音位在功能上的重新定义,指出音位是语言结构内部的最小区别单位,把音位进而划分成各种区别性特征。曾任教于莱比锡大学、莫斯科大学、罗斯托夫大学和索菲亚大学。

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47,149

1858—1917,法国社会科学家,当代社会学奠基人。曾留学德国,历任波尔多大学教授、巴黎大学教授。第一个将社会学付诸实践,为创立社会学经验研究奠定了基础。倡导集体表象论,认为集体表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同时还以社会学的观点研究犯罪现象,创立了“无规范理论”。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分工论》、《论自杀》,等等。又译迪尔克姆、杜尔凯姆。

W

瓦恩里希(H. Weinrich) 160

德国语言学家。构建话语语言学理论。

瓦洛西诺夫(V. N. Volosinov) 171

俄国符号学家。

王安石 3

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神宗朝,任宰相,积极推进新政改革。失败后,退居江宁。诗文创作成就卓然,对后世颇有影响。所著《字说》、《钟山日录》等,多已散失。现存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等。

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01

英国语言学家。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分类体系。

威尔斯(Marshall Wales) 157

心理语言学家。

魏尔特海默(Joseph Wertheimer) 79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238

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在其早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提出哲学是一种语言分析或"语言批判"活动。其后期代表作为《哲学研究》,他提出语言的意义只能体现在使用它的"生活形式"中。

温迪希(E. Windisch) 75
温克尔(Wenker) 220

X

希特勒(Adolf Hitler) 43

1889—1945,法西斯德国元首。实行法西期专政。1939 年 3 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同年 9 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著有《我的奋斗》。

西思班努斯(Petrus Hispanus) 94

约 13 世纪—14 世纪。

许国璋 32

1919—1994,现代语言学家、教育家。浙江海宁县人。早年留学英国,专攻英国文学。1949 年以后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在英语教学、文学与文化、语言学等方面成果卓越。其主要论文收入《论语和语言学》(2001 年)。

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 62,68

1870—1946,瑞士语言学家。与巴依合作编写了语言学世界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著有《理论语言学纲要及方法》(Programme et méthodes de la linguistique théorique, 1908),发表《普通语言学日内瓦学派》(L'école genevoise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27)、《索绪尔的三种语言学》(Les trois linguistiques saussuriennes, 1940)等多篇重要论文。

荀子 15

约前 313—前 230,战国末思想家、教育家。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他批判并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他的"正名"学说包含了丰富的逻辑理论,对建立古代名学作出了贡献。著有

《荀子》,共三十二篇,影响甚广。

Y

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 84,157,170,220

1896—1982,俄国出生的美国语言学家、斯拉夫语学者、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莫斯科戏剧学院俄语教授(1920)、捷克马萨里克大学(今捷克布尔诺普基涅大学)俄罗斯语文学及捷克中世纪文学教授(193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3—1949)、哈佛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及普通语言学教授(1949—1967)。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著有《俄语与其他斯拉夫语语音变化比较研究》(Remarques sur l'évolution phonologique du russe comparée à celles des autres langues slaves, 1929)、《欧亚语言同源性的特征》(Kharakteristichke yevrazi-yskogo yazykovogo soyuza, 1931)、《言语分析初阶》(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1952)、《语言原理》(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1956),等等著作,另与哈利(Halle)合编并出版6卷本《选集》(Selected Writings, 1967—1971),论及音位学、语言、诗歌、斯拉夫史诗等等不同的主题,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27,92

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曾受业于柏拉图。在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心理学等多方面贡献卓著。哲学著作有《形而上学》;逻辑学著作有《工具论》;美学著作有《诗学》;等等,等等。

姚纽斯(K. Jaunius) 71

1849—1908,立陶宛学者。

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82,85,157

1899—1965,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布拉格语言学派成员。著有《普通语法原理》(Principe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1928),其代表作为《语言理论纲要》(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aeggelse, 1943)。

叶斯柏森(O. Jesperson) 82

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和英语语法权威,在语音学、语言学理论及英

语史等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曾用拉斯克所编语法研究冰岛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曾出版大量关于英语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英语的发展和结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05)和七卷本《现代英语语法》(Modern English Grammar, 1904—1949)。其经典著作为《语言论》(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

伊壁鸠鲁(Epicurus) 2

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创建单纯快乐、友谊和隐居伦理哲学,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确认情感过剩是语言产生的必要条件。

英辅(Eisuke Komatsu) 60

小松·英辅为日籍语言学研究者,与罗伊·哈里斯合作,于1993年编译出版《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法英对照)。

Z

章炳麟 13

1869—1936,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维新运动。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展成立光复会,后人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晚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授徒为业。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贡献卓著。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文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多有创见。著述刊人《章氏丛书》等。

附录二：引用文献

中 文 类

1. 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2. 戴震，《戴震全集》（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1995 年版。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
4. 方光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
5.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版。
6.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8.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9.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1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裴文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11.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12. 许国璋，《论语言和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13. 张文修（编著），《孟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版。

西 文 类

缩写

C. F. S.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索绪尔研究集刊》)

T. C. L. P.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

1. Arnauld, A. & Lancelot, C. 1660.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Paris: Republications Paulet. repr. Paris. 1969. (《普遍唯理语法》)
2. Barthes, Roland. 1957. *Mythologies*. London: Paladin. (《神话集》)
3. Bloomfield, Leonard. 1962 (lst ed. 1933). *Language*. 8th ed. London: Allen & Unwin. (《语言》)
4. Böhler, M. (Hrsg.). 1973.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威廉·冯·洪堡文集》)
5. Bernhardi, August Ferdinand. 1801. *Sprachlehre. I. Reine Sprachlehre; II Angewandte Sprachlehre*. Berlin. (《语法》; I.《纯语法》; II.《应用语法》)

   1805. *Sprachlehre*. Hildesheim. (《语法》)
6. Chomsky, A.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句法结构》)
7. Cooper, David. 1972. *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 London. (《哲学与普通语言》)
8. Derrida, Jacque. 1967.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声音与现象》)
9. Durkheim, Emile. 1895. *Methodology of Sociology*. London: Allen & Unwin. (《社会学方法论》)
10. Engle, R. 1962. *Théorie et critique d'un principe saussurien: l'arbitraire du signe*. C. F. S. 19. (《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理论与批评》)

    1964. *Compléments à l'Arbitraire*. C. F. S. 21. (《再论任意性》)

    1966. *Remarques sur S., son système et sa terminologie*. C. F. S. 22.

(《索绪尔体系及术语评注》)

1967.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 Critique*. Germany.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

11. Godel, Robert. 1954. *Notes inédites de F. de Saussure*. C. F. S. 12. (《索绪尔未刊札记》)

1957. *Les Sources Manuscrites du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e F. de Saussure*. Genève: Librairie E. Droz.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手稿溯源》)

1958.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08—1909, *Introduction*. C. F. S. 15. (《普通语言学教程,1908—1909,引论》)

1959. *Nouveaux documents saussuriens: les cahiers E. Constantin*. C. F. S. 16. (《索绪尔学派新文献》)

1960.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de F. d. S. remis à la bibliothèque publ. et univ. de Genève*. C. F. S. 17. (《索绪尔手稿汇编》)

1969. *A Geneva School Reader in Linguis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Indiana. (《日内瓦学派语言学读本》)

12. Gardiner, A. H. 1932. *The Theor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London (réimprimé Oxford 1951, 1960). (《话语与语言的理论》)

13. Grimm, J. 1819. *Deutsche Grammatik*. Berlin(reprint 1822) (《德语语法》)

14. Hall, R. A. 1964. *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Philadelphia & New York: Chilton. (《语言学导论》)

15. Harris, James. 1751. *Hermes: or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oncerning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Menston: Scholar Press. repr. 1968. (《交流技艺之神赫耳墨斯,即语言和普遍语法的哲学研究》)

16. Heintel, Erich. (Hrsg.). 1960.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64.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Spra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ambur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集》)

17. Herder, J. G. 1772. *Abhandlung U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β.(《论语言的起源》)

18. Hjelmslev, L. 1928. *Principes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Copenhagen.(《普通语法原理》)

1943. *Omkring sprogteoriens grundlaeggelse*. Festskrift udgivet af Köbenhavns Universitet i anledning af Universitets Arasfest.(《语言理论纲要》)

1971. *Essais Linguistiques*. Paris: Edition de Minuit.(《语言学论集》)

19. Hockett, C. F. 1960. *The Origin of Language*. Scientific American.(《语言的起源》)

1968. *The State of Art*. The Hague.(《语言学当前水平》)

20. Hodges, H. 1969. *Social Stratification*.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论社会分层》)

21. Humboldt, Wilhelm von. 1963. *Werke in Fünf Bänden. Band III,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Herausgegeben von Andeas Flitner und Klaus Gi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语言哲学文集》)

22. Jespersen, Jens Otto Harry. 1954 (lst ed.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0th ed., London: Allen & Unwin.(《语言:本质、发展及其缘起》)

23. Jakobson, R. 1931.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Phonologie*. T. C. L. P. 4.(《历史音位学原理》)

24. Komatsu, Eisuke & Harris, Roy. 1993. *Ferdinand de Saussur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Émile Constantin*. Oxford: Pergamon Press.(《索绪尔第三期普通语言学教程》)

25.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社会语言学模式》)

26. Lacan, J. 1966. Ecrits. Paris.(《文字》)

27. Leibniz, G. W. 1765. *Neue Abhandlungen U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Hamburg: Felix Meiner.(《人类理智新论》)

28. Lévi-Strauss, C. 1968. *Les Structures E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新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29.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语义学》)

30. Martinet, A. 1955. *L'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 Berne: Francke. (《语音变化的结构》)

1960. *Eléments de Li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普通语言学原理》)

31. Meillet, A. 1925.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Oslo. (《语言学的比较方法》)

32. Mauro, Tullio de. 1964. *Introduzione alla semantica*. Bari: Laterza. (《语义学导论》)

1972.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Tullio de Mauro. Paris: Payot.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

1990. *Minisemantica: dei Linguaggi non verbali et delle lingue*. Bari: Laterza. (《微观语义哲学》)

33. Müllenhoff, Karl/Ippel, Eduard (Hrsg.). 1864—1890. *Jacob Grimm. Kleinere Schriften*. Bde. 1—8. Berlin. (《格里木论文简编》)

34. Paul, Hermann. 1880.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Halle: Max Niemeyer. (《语言史原理》)

35. Pictet, Adolph. 1856. *Origine Indo-européennes*. Genève. (《印欧语系的起源》)

1859—1863. *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 2 vols. Genève. (《语言古生物学》)

36. Reuchlin, J. 1956.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Pforzheim. (《基础希伯来语》)

37. Roulet, E. 1976. *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Descrip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Translated by C. N. Candlin. Longman. (《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描写及语言教学》)

38.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语言:话语研究导论》)

39. Saussure, F. d. 1878. *Le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Leipzig (La date du frontispice est 1879; réimpression Paris 1887).(《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Payot.(《普通语言学教程》)

40. Schlegel, F. 1808. *Uber die Sprache und die Weisheit der Indier. 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humskunde*. Heidelberg: Bei Mohr und Zimmer (reprint John Benjamins B. V. 1977).(《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为建立古文化而作》)

41. Schleicher, August. 1869. *Die Deutsche Sprache*. Stuttgart.(《德国的语言》)

1873 (1863). *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Weimar: Hermann Böehlau.(《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

42. Stankiewicz, Edward. (ed.). *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博杜恩·德·库尔特内选集》)

43. Steinthal, Heymann. 1855. *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Ihre Prinzipi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einander. Berlin.(《语法、逻辑和心理学:其原理及相互关系》)

44. Trager, G. L. 1949.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Norman, Okla: Bettenburg Press.(《语言学界》)

45. Trubetzkoy, N. S. 1939.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T. C. L. P.(《音位学原理》)

46. Vendryés, Joseph. 1921. *Le Langu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 Histoire*. Paris: Renaissance du livre.(《语言:历史语言学导论》)

47. Volosinov, V. N. 1989. *Marxism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48. Vater, Johann Severin. 1801. *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lehre*. Halle: Max Niemeyer.(《试论普通语法》)

49. Whitney, William Dwight. 1867. *Language and Language Study*. New

York.(《语言与语言研究》)

50. Wright, J. 1895—1905. *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London: H. Frowde.(《英语方言词典》)

51. Wundt, W. 1894. *Lectures on Human and Animal Psych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Co.(《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稿》)

52. 1971. *The Bible*.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圣经》)

53. 1950. *Lingu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General Linguistics. 2nd Issue*. Amsterdam.(《语言,普通语言学国际评论刊物》)

附录三:主题索引

B

百科全书派　3
悖论性　209
本能说　1
本体语境　41
变调　42
表义方式　96
波尔-罗瓦雅尔　101,166
布拉格语言学派　83,158

C

传统语言学　120
创新波　218
创新起源地　219

D

地理语言学　59,208
动物语言研究　17,18
动态　161,170

E

儿童语言习得研究　17,19

F

泛时　172
泛时观　172
泛时态　172
梵语　27,92
方言　215
方言的界限　215
非在性　199
非强制性　199
非任意性　201
分层理论　172,182
符号　28,40,64,114,127
符号观　206
符号学　126,158
符号施指　132,184,187,205
符号受指　132,184,187
符号说　205
符号体系　46

G

感叹说 1,3
概念 22,38,185,193,204
哥本哈根学派 83
格里木定律 87,109
格士塔心理学 77
个性主义 148
工具说 1
共时 81,161
共时观 172,187
共时分析 85
共时态 91,120,161,176
共时语言学 54,80,162,228
功能符号 40
共同语 92
孤立语 111
关联聚合 34,83,86,208
规范 38,39

H

横向组合 34,39,83,86,208
话语语言学 56

J

计算机语言学 56
计算机心理语言学 57
界定 22,30,33,50
结构 121
结构主义 99
结构主义人类学 158
结构主义社会学 205
结构主义诗学 158
结构主义语言学 116,182
解构主义 157
进化说 1,7
经济语言学 56
静态 161,170
句法结构 97
句法学 97
绝对任意性 201

K

客观性 53
空符号 198
空间 211,219

L

劳动说 1,5
类型语言学 55
理论语言学 55
历时 81,161
历史比较语言学 90,105,117
历时观 172,187
历时态 91,120,161,176
历时语言学 54,80,162,228
临床语言学 56

M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83,87
描写语言学　55,87
摹迪斯泰学派　27,95
摹声说　1,12

N

内部语言学　53,60,207

P

普遍语法　51
朴素唯物主义　15
普通语言学　51
谱系树模式说　112

Q

契约说　1,4
强制性　188
潜在　145
屈折语　111

R

认知语言学　21
人类本源说　1,11
任意性　114,186

S

社会本质　148
社会集团　7,28,37
社会事实　34,36,46,49,149
社会心理学　46
社会语境　33,37,146
社会语言学　56
神经语言学　56
神授说　1,8,10
时间　128,212,219
时空观　207,223
实体　120,232
手势说　1
数理语言学　56
书写学　158
思辨语法　93
斯多葛派　12,27
思想说　1

T

统计语言学　56
同一性　37,59
同质　146
停顿　42

W

外部语言学　53,60,207
完形心理学　77

唯名论 14
文字学 3

X

系统 86,120,188
系统性 38,53,120
现代形态 54
显在 145
线性 60
相邻性 190
相似性 107,190,211
相对任意性 201
心理实体 184
心理形象 40
心理语境 38
心理再现 41
心理语言学 56,76
新语法学派 27,76,114
新语言学派 27
形式 86,118,120,232
形态学 88
序列 86
训诂学 3

Y

言语 36,81,111,139,235
言语的语言学 54
言语体系 23,128,139,146,149,176,235
异质 146
音长 45
音系学 84
音响形象 189,193,204
音位学 84
应用语言学 52
原子主义 120
语调 44
语符学 85
语符列 36
语法学 48
语法规则 34
语法体系 21,95
语境 92,146
语文学 3
语言 11,14,24,33,80,111,122,139,235
语言本质 111,145
语言波 217
语言产生的条件 2
语言的变体 221
语言的多样性 210,218,224
语言的由来 8
语言的语言学 54
语言定义 22
语言符号 120,192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132,184,189,204,229
语言的社会事实 199
语言规范 36

超规范 36
不规范 36
语言机制 7
语言结构 11,107,220
语言历史 160
语言能力 160
语言强制力 34
语言亲属关系 108,211
语言起源 1,7,15,21
语言习得机制 56
语言形式 118
语言学 22,47,51,82,111,121,144,151,178,226
语言学的多学科领域 56
语音 76,114,148
语音系统 76,114
语音制度 34
语系 109
原始生态 142
原始部落的语言研究 17,20,110
约定俗成说 1,14

Z

粘着语 111
哲理语法 101
直接成分分析 83
重音 43
转换生成语法 83,182
嘴势说 10

